

B2211
6

82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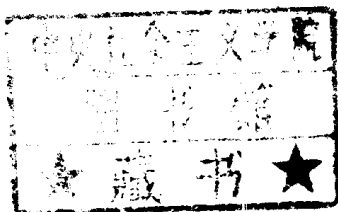
DF99/15



200024936

周易新探

李大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序

《周易》六十四卦古经，文词简约，含义奥晦。《周易大传》所释，已多借题发挥之词。二千年来，注者繁多。汉儒侈谈象数，宋儒专阐义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迨及近世，学者们又以新的目光窥测《易》义，又出新见。史学家由《周易》探索上古历史的遗迹；自然科学家藉“易象”揭示宇宙的奥秘；文学家则以为“卦爻辞”乃上古时代歌谣之一体。各倡新说，旨趣互异，见仁见智，难分轩輊，于古说之外，益增新解矣。

老友李世繁同志以为《周易》古经记录了周初伐商建国的史迹，拟著书证成此说，惜草创未就，遽尔辞世。大用同志继承先志，重加深考，更参照《诗经》、《尚书》、《逸周书》等经籍，抽绎有关资料，对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详加诠释，写成此书。往者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以为《周易》乃上古史录。大用同志此书可谓《周易周史观》，所考较胡朴安氏之书为详，引证丰富，解释明晰，确乎成一家之言。

关于八卦的起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近年古文字学家张政烺提出数字说，认为《易经》上的一、--符号，本是奇数与偶数的代号。此说近年比较流行。大用同志提出不同看法。他详细考察了西周甲骨，发现甲骨的卜兆约有六种排列形态：≡、≡≡、≡≡≡、≡≡≡、≡≡≡≡、≡≡≡≡≡，为探索八卦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认为周初在继承殷人龟卜的过程中发现卜兆的一、--两种基本形式后，从而排列组合而成为八卦，再重迭为六十四卦。此说取材广博，论证明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比较重要

的学术价值，对于解决八卦起源问题有重要贡献。

多年以来，大用同志从事历史教学，熟悉殷周史迹，故能有此成就。大用同志希望我写一篇序文，于是略赘数语，聊以表示此书之特点云尔。

一九九〇年五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张岱年
一、八卦的起源和演变.....	(1)
二、《周易》原非“占筮书”.....	(14)
(一) 周初重史的因果.....	(14)
(二) 周公、召公编写《周易》卦爻辞的目的.....	(20)
三、《周易》卦爻辞是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 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	(28)
(一) 殷周关系的真相.....	(28)
(二) 周文王怎样“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44)
(三) 武王伐纣的实情.....	(72)
(四) 武王克商后统治殷人的策略.....	(100)
(五) 周公东征的因果.....	(114)
(六) 周公是怎样巩固周政权的.....	(135)
四、六十四卦各卦爻辞主题简介.....	(161)
五、《周易》思想新探 ——兼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166)
六、中国文化之源.....	(193)
附录	
一、“数字卦”说志疑.....	(196)
二、“《尚书·康诰》篇首四十八字错简”说考辨 ——兼论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	(203)
后记.....	(216)

一、八卦的起源和演变

现存《周易》这部书包括《周易》和《周易大传》两部分。

《周易》形成于西周前期,《周易大传》则形成于战国后期。从《周易》到《周易大传》的历史发展长达七八百年之久。《周易大传》的解经与《周易》原意往往相去很远,研究《周易》应以《周易》为主,以经解经,不能以传解经、以传代经。

《周易》可分为符号(八卦、六十四卦)与文字(卦辞、爻[音尧 yáo]辞)两部分。卦画和文字不同,本身没有表现出什么确定的意义,我们无从确定它的原始意义是什么,只能通过八卦的起源的探索来解决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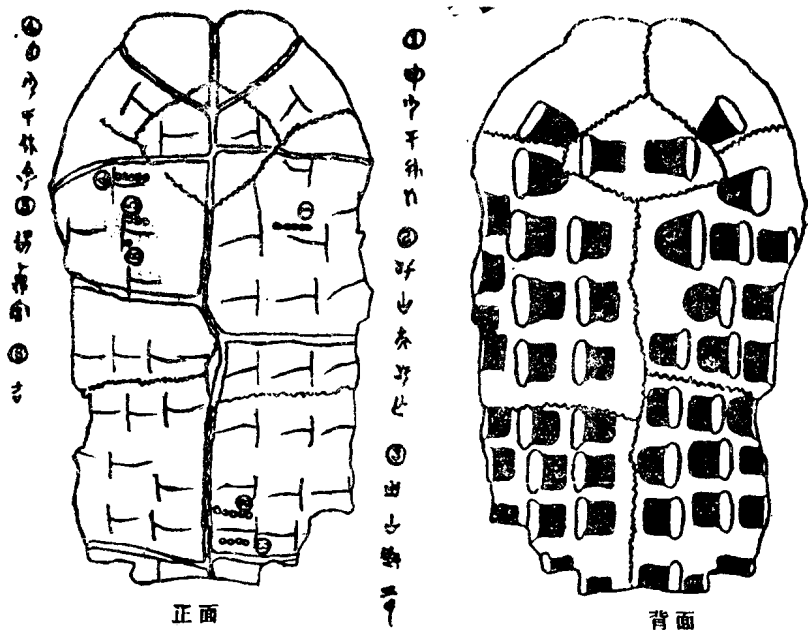
(一)

八卦,就是用一、--两个基本符号,以三个为一组排列组合而成的八个符号:☰、☷、☱、☶、☴、☵、☲、☳。八卦再自迭或互迭而构成六十四卦:䷀、䷁、䷂、䷃、䷄、䷅、䷆、䷇等等。但是,就这么些符号,经过先秦学者、汉儒经师、魏晋玄学家、宋明理学家的相继阐发,却形成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它们到了军事家手里,就演成了八阵图;到了天文、医学、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家手里,就成了天文学的祖宗、中医学的理论源泉、电脑的根本,可以贯通等差级数、二元式(二进制)、二项式定理、逻辑数学以及音响、电磁波、连锁反应等原理。这“神秘的砖块”建造了不可胜数的迷宫。^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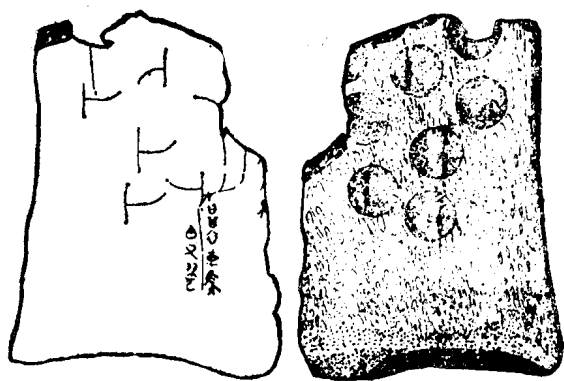
至于一、--两个基本符号和八卦的原始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古往今来,更是异说纷呈:什么一、--代表天地、阴阳、著草长

短、男阳女阴、奇数偶数；什么一、一符号是受象形文字、结绳记事、龟卜兆纹的启发而形成等等，②既莫衷一是，又都是无从确证的揣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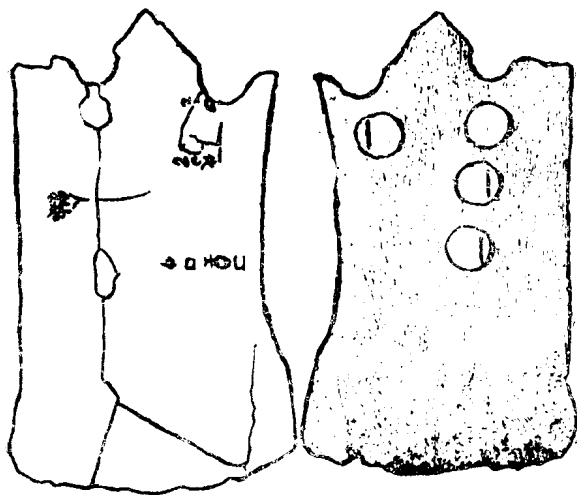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出土的西周甲骨中，竟保存着五块较为完整、有卜兆和甲骨文的龟甲和卜骨。通观这些甲骨，我们便发现其卜兆的一致性：（一）甲骨灼后裂纹，基本上有一、一两种形式。（二）甲骨卜兆多以三条裂纹为一组。（三）卜兆均为一、一两种裂纹的单独重叠、或两者错杂、井然有序。归纳起来，约有六种排列形态：≡、≡、≡、≡、≡、≡。（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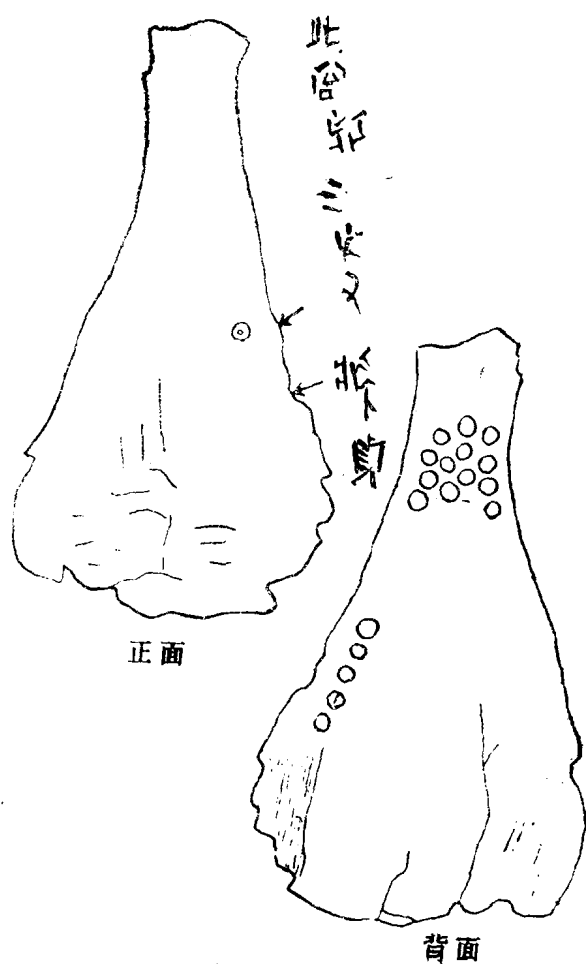
图一 卜甲 H₃[2]:1



图二 (80 FQN采集: 112) 左: 正面 右: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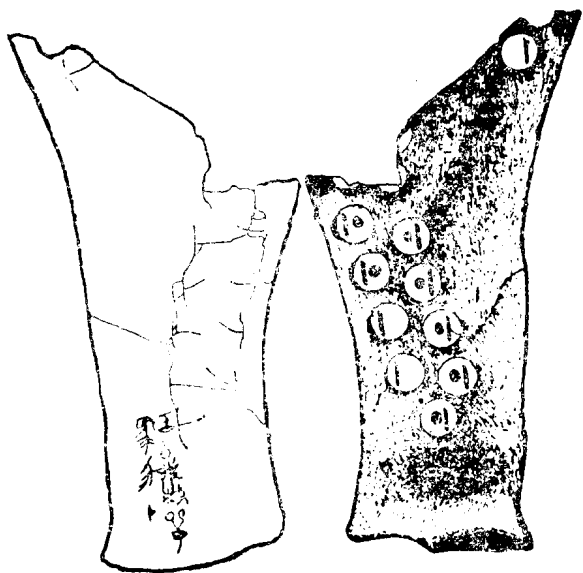


图三 卜骨 (采集: 49) 左: 正面 右: 背面



图四 山西洪赵坊堆村发现的卜骨

西周甲骨的这些特征，不仅为我们探索八卦的起源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实物，还得到先秦两汉典籍的印证。



图五 (NH1[3]: 1) 左: 正面 右: 背面

首先, 我们看周人是使用龟卜还是占筮的记载:

“周原既既, 莛荼如飴, 爰始爰谋, 爰契我龟。曰‘止’、曰‘时’, 筑室于兹。” (《诗·大雅·绵》)

“考卜维宅, 宅是镐京。维龟正之, 武王成之。” (《诗·大雅·文王有声》)

“乃卜三龟, 一习吉。” (《尚书·金縢》)

“宁王惟卜, 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 矧亦惟卜用。……朕今卜并吉, 肆朕诞尔东征。” (《尚书·大诰》)

“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 则经营。” (《尚书·召诰》)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 亦惟洛食。” (《尚书·洛诰》)

根据这些史料，我们知道殷周之际，周人营建周原、镐京、洛邑等地，以及“王有疾”、东征等大事，都是通过龟卜来决定的。而且，岐山凤雏发现的西周甲骨有“其又大乍(作)，其……”(H11:12)和“乍天立(位)”(H11:24)卜辞，根据陈全方考释均为“营筑宫室而卜”，以及“征巢”(H11:10)“伐蜀”(H11:68)等文字，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其次，看有关八卦的论述：

《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孔安国《论语注》均称河图为八卦。)

《山海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引，今本无。)

《周礼·春官宗伯下》：“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郑玄注：“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罍，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

《管子·轻重戊》：“虚戏作六爻，以迎阴阳，……周人主之，循六爻，合阴阳，而天下化之。”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引张佩纶《管子学》，谓“六爻”乃“六爻”或“八卦”之误。

《汉书·艺文志》：“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论衡·对作》：“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

剔除其虚戏、列山氏、阴阳等附会，我们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周人不仅继承了殷人龟卜，而且为了兴周灭商，周文王、周公等统治者还针对殷人迷信龟卜的传统，利用龟卜，制造舆论，以麻痹殷人、统治周人。所以，龟卜到了周人手里，经过统治者和卜人的长期摸索、总结，已经整理出一套“合阴阳”(用一、一两种基本符号)、“掌三兆”(卜用三兆)、“图八卦”、“附六爻”(八

卦重叠)、“自演为六十四”的龟卜方式了。

(二)

至于一一两种基本符号、三兆、八卦、六爻和六十四卦如何形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周人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殷人占卜方式的探索来解决。

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这一迷信活动来源很久，早在商朝以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有用过的卜骨。不过，当时所使用的多是羊、豕、牛等兽骨，只用灼而无钻凿的痕迹。据目前所知，钻凿并用乃从商代开始。钻，是在甲骨的背面钻一个圆形的槽；凿，是在钻槽的一侧凿一椭圆形的凿穴。钻凿做好后的形状成“○”“⊖”形。甲骨经过整治之后均成片叶状，一般厚约五毫米左右，牛肩胛骨有时厚至十毫米。经过钻凿的凿穴，其底部较原来的甲骨变薄。它的作用，一方面在龟卜施灼时，一经灼烤，必然在较薄的槽穴底部发生爆裂；另一方面由于凿在钻的左侧或右侧，按一定位置排列，经施灼爆裂的兆纹必然限制在钻凿范围之内，而且按一定方向显示兆纹。迨卜用时，由贞人将欲贞问的事情祷告鬼神，然后执用烧红的燹炬向甲骨钻凿处烧灼，甲骨遇火，卜然有声地裂开，在甲骨正面就显出一个裂纹，谓之卜兆，据说所求鬼神的意志，从这卜兆中显示出来。今卜字的一竖是循凿槽的裂纹，一横是循凿穴的裂纹，卜字的读音是象甲骨灼裂时的声音；而所占的吉凶，即寓于这一横纹的粗细、长短、曲直、横斜、隐显之中。

殷代敬事鬼神、迷信龟卜，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无事不卜，好象他们是依靠鬼神的指示而行动。不过这种虚幻的反映，终抵不住事实的驳斥。风雨不验，丰歉不时，祸福无灵，吉凶矛盾，卜事常有。这些矛盾人们应早有看破的，到殷代晚期，卜用三骨

就是其显例。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小屯西地发现了二十一片完整的牛胛骨卜骨，其中有刻辞的十片。这些卜骨出土时，分三组堆放，而且三组都以三为公约数（西南一组三枚，东南一组六枚，北面一组十二枚）井然有序地堆放在一起，引起郭沫若的注意。他根据《尚书·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以及甲骨文拓片中有“习一卜”、“习二卜”之辞，认为卜骨或卜甲是以三枚为一组，一次卜用三甲或三骨。一习不吉，则再用三甲或三骨。言“习一卜”、“习二卜”者，疑前后共卜六骨也。（《出土文物二三事·安阳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

后来，考古学者在远离商都的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卜骨，“在 m14、m16、m103 三座墓中，每墓三片，出土的位置都在二层台上，而且骨臼都朝向一个方向，当初可能是用绳捆扎在一起的。……这些证实了郭沫若关于‘卜用三骨’的论述，也反映了商代奴隶主贵族使用卜骨的一般情况。”③

在此基础上，宋镇豪又对《甲骨文合集》中有关龟卜方式的卜辞进行了全面分析、分期比较，证实：“晚殷时代占卜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三卜制’，主要表现为每次占卜往往同时利用三骨反复占卜，谓之‘元卜’、‘右卜’和‘左卜’。”并指出：“殷人的三卜，恐怕一则在于努力使人事符合上帝的意志；二则尽量使事情的可行性能与人王的意愿相结合。因此每卜用三骨，有时还不足最后作决断，又有重复再贞。这样的再贞大概相隔时间不会太长，有可能在同一天作出。”而且，“‘习卜’常利用原来的卜骨进行再贞，原是‘卜用三骨’，因袭占卜时也 用此三骨作三卜。”可见，“三卜制”、“习卜”是“信奉上帝和满足人愿的调和剂，表明殷人已从盲目崇拜鬼神的精神世界中开始摆脱出来，在甲骨占卜程式中施入了奇偶数值观念的新认识，在固有宗教信仰中躋进了人的理念意识。”④

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又以经营农业为主，因而甲骨比较缺乏的周人，继承殷人龟卜后，除了“王有疾”、东征等紧急情况，“卜用三龟”外，很难普遍照搬。通过长期占卜，周族统治者和卜人终于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合国情、简便易行的占卜方式。王宇信结合陕西周原考古队、李学勤等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探索，在《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中指出西周占卜方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一）在钻凿形态方面：卜甲方凿，凿外侧有一较深竖槽，排列整齐有序并十分密集，“从残存卜甲看，大体以三个为一组”；凿孔之间，横距小，纵距大，排列以横为组者多，以纵为组者少。卜骨是圆钻，分布不规整，钻窝底部有一竖槽，有学者称之为“猫眼状”。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的枣核状凿，其旁为圆钻迥然不同。（二）在灼兆方面：甲骨背面凿，钻处施灼，是为了甲骨因厚薄不同，遇火灼炙冷热不均而在正面出现裂纹——卜兆，用以判断吉凶。龟甲灼痕较大，卜兆均朝向龟版中间“千里路”。胛骨灼痕较轻，兆枝相对。而殷墟右胛骨兆枝向右，左胛骨兆枝向左。这在较完整的卜甲，如齐家H3(2):1，背面有方凿三十五个，左右两边的卜兆都向龟版中间的“千里路”，就可以把灼与兆的情形观察清楚。齐家卜骨NH[3]:1、采94、80FON、采:112等胛骨，兆枝相对，这是西周卜骨的独特风格。因而，西周胛骨正面的卜兆往往两两相对，采取相反方向，而且错落有致，非常严整，这与商代卜兆混杂、散乱大不相同。这就使周族统治者和卜人能够逐渐观察、总结出卜兆的两种基本形式一、--。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钻凿分组排列，以三个为一组的钻凿形态固定化，从而把殷人的“卜用三骨”改造成为“卜用三兆”。一旦卜兆的两种基本符号一、--确定，而又卜必三兆，其排列组合必有八种可能：≡、≡、≡、≡、≡、≡、≡、≡，于是八卦形成了。

随着周族与殷族及其他部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思

想方面斗争的日趋尖锐、复杂，八卦已不能满足周族统治者的需要。在殷人一次卜用三骨不成、再用原来三骨“习卜”的启发下，周人又发现完整龟甲头部以下可平分左右为六大方，每方卜一次，刻一辞，正是六兆六辞的神秘现象也可附会；于是把一次“卜三兆”改为重“卜三兆”，这样一来，六爻出现了。齐家卜甲H3[2]:1，甲分六区，区有六凿，将六条辞都分别刻于相关卜枝的一侧，可为其证。当时，九九乘法口诀已经发明^⑤，他们又利用数学规律的神秘性，把八卦重迭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对此，魏人刘徽（音灰huī）说：“昔在伏羲，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九章算草注序》）近人余永梁更明确指出：“八卦的一、--，正是龟甲刻文的标识，周人从文字标识的演进，而有数学的参伍排比，遂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⑥

（三）

占卜符号的逐步规范化、系统化、模式化，却使占卜日益失去原有的神圣性、莫测性、可信性。而且，甲骨裂纹的变化受了钻、凿、灼等物理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完全按照六十四卦的模式出现。特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在春秋时期出现后，夏、商、西周三代的天命鬼神的宗教迷信观念受到冲击。人们对占卜这种迷信巫术已经有了一种比较清醒的理性的看法，不象过去那样极端迷信了。《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子服惠伯说：“《易》不可以占险。”这种对龟卜的看法，固然是起到了怀疑龟卜的作用，给卜人带来困难；同时也从相反的方面推动了占卜的进一步发展。掌管占卜的卜人为了博取人们的信任，使人们消除怀疑，相信占卜的灵验，就不能再简单的凭甲骨卜兆对照六十四卦卦爻辞决断吉凶了；而必须寻求一种既

能保持龟卜的神圣性，又便于卜人利用、群众接受的新卜具、新方法。

根据“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龟能行气导引”、“龟千岁而满尺二寸”（《史记·龟策列传》），因而被奉为神灵卜具的因由，卜人发现通称锯齿草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生如蒿（hāo，草名，即蒿子）作丛，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茎，至多者三十五茎。生条便直，所以异于众蒿也。”（《本草图经》）且全草入药，具有跟龟相似的特点，于是，它的茎被卜人奉为神灵的卜具，并命名为蓍（音师shī）。汉刘向曰：“蓍之言耆（音其，古称六十岁曰耆）；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久也，故能辨吉凶也。”（《礼记·曲礼》注）

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一种新的计算方法——筹算，在春秋时期出现了。算筹是一根直茎一分、长六寸的圆形竹棍，除用竹外，还用木、玉、牙作，计算时把算筹按纵横相间的原则来表示数字。筹算的横式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与八卦在形式上相似。于是卜人便利用数的神秘性，从求神问卜的角度，把卜兆的一、--符号转换成奇数、偶数。这样，就可以不用龟卜来决断吉凶了。卜人只把固定数目的蓍草茎，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反复演算，求得需要的六个数字，并把这些数字按照奇数为一，偶数为--的原则，顺序排列，然后对照卦画，得出六十四卦的某一卦、某一爻；再根据所得某一卦、某一爻的卦爻辞来决断吉凶。这种办法叫做“筮”（音士shì）。

这个由龟卜到占筮的转换过程，很快就被当时人察觉，晋大夫韩简曰：“龟，象也；筮，数也。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杜预注：“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班固更明确指出：“龟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见兆也。筮也者，信也，见其卦也。”（《白虎通义·蓍龟篇》）

关于占筮怎样进行，由于缺乏确凿的文字材料，我们只有借助于民族学的材料来推测。汪宁生在《八卦起源》一文中，曾引用四川凉山彝族的一种名叫“雷夫孜”的占卜方法：“毕摩（彝族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进行三次，即可得三个数字。然后毕摩根据这三个数字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打冤家’（过去彝族奴隶主操纵下的一种械斗）、出行、婚丧等事。”从这段文字介绍使我们看到，“雷夫孜”占卜法最关键处是与“数”分不开的；同时与数的奇偶分不开。另外，也使我们看到，“雷夫孜”占卜法，数分奇偶、占必三次，其排列组合必然有八种可能，亦即可得出八个答案：奇奇奇、偶偶偶、偶奇奇、奇偶偶、偶奇偶、偶偶奇、奇奇偶、奇偶奇。如果我们把“雷夫孜”占卜法的奇偶数转换成八卦的一、--符号，便可依次得出八卦：☰、☷、☱、☶、☲、☴、☵、☴。⑦

这种既利用了著草的神灵性、人们对数的神秘崇拜性，也保持了六十四卦卦画的神圣性，又简单易行的用著草占卦的“占筮”，暂时使人耳目一新，得以流行。《左传》和《国语》中就有十六条把《周易》用于占筮的记载。⑧

综合上述，可见八卦并没有什么神秘，却有着客观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西周前期，由于占卜活动增多，而甲骨材料缺乏，周族统治者和卜人在继承殷人占卜的过程中，发现卜兆的一、--两种基本形式后，改晚殷时代的“卜用三骨”为卜施三灼的“卜用三兆”，从而排列组合而成八卦。以后，又借鉴殷人卜用三骨不合意愿，再用原来三骨进行“习卜”的手法，利用完整龟甲头部以下平分左右为六大方的现象，把一次“卜用三兆”演变成再用原甲骨重“卜三兆”，这样一来，六爻出现了；进而将八卦重迭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形成了《周易》的卦画结构。春秋思想大解放时期，由于人们对龟卜的怀疑，卜人乃利用著草的

神圣性以及人们对数的神秘崇拜,把卜兆的基本符号一、--转换成奇数、偶数;再用固定数目的蓍草茎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反复演算,求得六个奇数或偶数并顺序排列;并将其与卦画对照,得出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卦、某一爻;然后再根据某一卦、某一爻的卦爻辞来决断吉凶。从而将由一、--符号排列组合而成的占卜卦画结构,演变成由奇数、偶数排列组合而成的占筮符号体系。

〔注〕

① 参见曹础基《八卦的秘密》,《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中)。

② 参见于省吾《周易尚氏学序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高亨《周易杂论》;李镜池《周易探源》;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1980年第4期);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6期。

④ 宋镇豪《殷代“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

⑥ 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见《古史辨》第3册。

⑦ 汪宁生《八卦起源》,载《考古》1976年第4期;参见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

⑧ 参见高亨《文史述林·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部分)。

二、《周易》原非“占筮书”

(一) 周初重史的因果

近几十年来，通过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于省吾、李镜池、高亨和胡朴安等学者的研究，已经驱散了笼罩《周易》的神圣迷雾，冲决了“以传解经”传统方法的束缚，以“勾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他们继承了清儒朴学家的传统而又充分运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在文字训诂、卦爻辞的解说上取得较好成绩。可是，由于“《易》本为卜筮而作”（《朱子语类》）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殷周之际和周初的历史又史料不足、了解不多；更缺乏对《周易》卦爻辞的宏观考察、综合分析、多学科研究，以至多数研究者仍认为“《易经》本是筮书”（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是根据旧筮辞编选而成的。而且采用了占筮参考书的形式”（李镜池《周易通义》）；“就《周易》全书情况看，大部分内容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周易》还不是《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占筮用的迷信典籍。”（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周易》卦爻辞的实际，也低估了《周易》在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王国维曾经深刻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土的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我们探索《周易》卦爻辞的编写目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依据，故根据甲骨文、金文所见，参以古代典籍，旁

及诸家解说，略加论述，以资探讨。

八十多年来，先后出土的约十五万片以上的殷代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一种所谓卜辞，也间或有少量与占卜有关以及偶然的记事文字。这种卜辞，虽然并不是什么历史记载，但是因为它的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又因为时代比较早，无疑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字、古代史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的直接史料。^①而类似：“庚寅，卜在□师，贞：王□征秦方，亡灾”的极少量卜辞，所记简单确实，把历史事件的时、地、人三要素以及三者的关系都包含在里面，成为中国古代编年史的直接渊源。^②

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研究，是建国以来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由于我国古文献中有关殷周之际和周初的历史记载较少，因而西周甲骨成了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弥足珍贵的新史料，也为我们探索《周易》卦爻辞的编写目的和主要内容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依据。

当我们将殷代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殷代统治者敬事鬼神，迷信龟卜，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无事不卜，无日不卜。如风雨的有无、年岁的丰歉、出入的吉凶、旬夕的安否、战争的胜负、田渔的猎获、疾病的轻重、妇人的生育，无不求之于龟卜。鬼神好象是专为他们答问龟卜而存在，而他们也好象是依靠鬼神的指示而行动。有许多不应该作的事，因卜兆吉而盲目地去作；有许多应作的事，因卜兆凶而不作了。^③

而历年出土的三〇一片西周甲骨文，虽有卜辞，但为数不多，绝大部分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根据甲骨上所载史迹和文献记载研究，西周甲骨主要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时期的遗物。其中文王时期的遗物较少，多为武王、成王、康王时期遗物，昭王、穆王时期遗物也不多。就文王时期来

讲，有商人甲骨，也有周人甲骨，以周人甲骨为多。而就商人甲骨来说，帝乙时期的较多，而帝辛时期的极少。西周甲骨对商末周初不少重大事件，如周文王为报杀父之仇在帝乙二年伐商、周文王渭滨遇姜尚、周文王伐密、灭崇；周武王观兵孟津、箕子率众降周；周公东征及营建洛邑等均有记载，可以说是周初历史活动的“大事记”。④西周甲骨文已被赋予了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比殷代甲骨文前进了一大步。

同时，当我们对近年来不断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加以研究后，发现西周时代，青铜器祭器的作用大大地加强了。灭商之后，几乎在很短的时期内，突然涌现出来了一大批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例如《何尊》一二二字，《宜侯矢簋（音轨guǐ）》一二六字，《虡盘》二八四字。而殷代青铜器铭文则比较简单，著名的八七五公斤大方鼎只铸有“司母戊”三字，殷末的《小臣觶犀尊》也仅有二八字。周初统治者则利用青铜器上的铭文宣扬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的德治和天命，歌颂他们军事上的胜利。例如《利簋》铭文记载了“甲子朝”周武王克商夺鼎；《保卣（音有yǒu）》铭文记载了周公东征；《何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对其宗子训诰，其中谈到武王、周公和成王相继经营洛邑的情况；《虡盘》铭文前半部歌颂了文、武、成、康、昭、穆五王的功德。⑤

不仅如此，西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记载与《尚书》、《诗经》和《逸周书》等文献所记完全相同或接近。《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据顾颉刚、陈梦家、刘起钎等专家研究，其中最珍贵的《周书》“八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梓材》、《多士》和《多方》）以及《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等十三篇都是西周早期文献。它们虽然和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一样也记载了殷末周初的重大事件，但主要内容却是周公旦、召公

爽为巩固西周王朝对成王、康叔等谆谆告诫的讲话记录。而形成于周初的《诗·大雅·周颂·豳风》中的一些诗篇，则是“史巫”以历史文献、民间传说为素材，经过修饰加工而成的周族史诗和文、武、周、成的颂赞诗。^⑥

周代殷后，所以风气转变，重视历史记载，保存历史文献，总结殷亡教训，宣扬文、武德治和天命，出于巩固西周王朝的政治需要。因为，根据古老的传说和近年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的资料，居住在渭水中游黄土高原的周王朝的始祖弃，虽曾跟商王朝的始祖契一起，帮助夏王朝的始祖禹治水，而且在耕稼方面名声很大，成为农神后稷，却一直到商后期的古公亶父，才因遭受西北戎狄部落的威胁，被迫率领族人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建国称周。他利用了周原这肥沃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为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他的下一代是季历，又称王季。为了联合大国并吸收其先进的文化，他打破姬姜两姓相互通婚的传统，娶商女太任为妻；还亲往朝歌觐见武乙，得到殷王大量赏赐，被“命为殷牧师”（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在殷王朝的支持下，王季征伐西北戎狄部落，凡七用师，而六大胜，解除了威胁，扩大了疆域，获得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使周之国势大为兴盛，于是引起殷王的疑忌。为了遏制周的势力，“文丁杀季历”（同上）；从此，周人与殷王朝结下了世仇。

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为了报杀父之仇，不顾国力，在帝乙二年，急急忙忙出兵伐商，结果失败；而帝乙却未乘机大事杀伐。原来，这时狄方和旨方正联合起义；被武丁征服了的江淮之间的夷人又强大起来，威胁着商的后方。为了集中兵力对付东夷，帝乙对周就不得不采取安抚手段，以改善两国关系，达到稳定边疆，全力征东夷的目的。所以，对姬昌不仅未加惩处，还导演了一出“帝乙归妹”的政治剧（《周易·归妹》、《诗·大雅·大明》）。

面对殷大(《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而周小(《孟子·公孙丑上》:“文王以百里。”)的现实,姬昌认识到必须隐忍待时、蓄积力量,因而顺从地主演了这出政治剧,与殷王朝恢复了臣服关系。同时,抓紧时机,在国内积极蓄积力量,并针对“纣为天下逋逃主”,倡议“有亡荒阅”公约(《左传·昭公七年》)。规定:“有亡人,当大蒐其众”不得“隐匿亡人。”(杜预注)姬昌“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姜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史记·周本纪》)“西伯之脱姜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齐太公世家》)他表面上臣服于商,实际上自行称王,与纣对峙;并对一些敌对的国家 and 部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耿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尚书大传》);接着文王把都城迁到了丰邑(今陕西省沔水西岸),以便继续向东发展。这一带水道纵横、土地肥沃,对于农业也很有利。文王晚年,周的势力发展到今山西省西南部和河南省西部,对商都朝歌形成了进逼的压力,为武王伐纣打下了基础。

周武王姬发继位后,把国都迁到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武王九年,趁着殷王朝社会矛盾激化,对东夷战争十分疲乏的时候,他“观兵孟津”,有八百诸侯前来会合,因时机不成熟,没有继续前进。过了两年,殷纣王众叛亲离,武王率领兵车三百辆、冲锋兵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联合西南方各族的武装,大举伐纣。在牧野誓师后,周军跟纣军十七万在牧野会战。由于纣兵倒戈,周军很快攻进了朝歌。纣王自焚而死,武王轻易克商。

“小邦”周猝胜“大国”殷后,武王、周公针对周人既没有充足的力量把殷贵族和其他部族的贵族完全消灭,又必须防止他们反叛的严峻形势,对殷贵族采取怀柔利用、分化瓦解、以殷治殷的策略,封纣子禄父于殷,并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

叔就近监视。对殷人则采取不杀俘虏、安定民生的措施，使形势有所缓和。

不料，因劳神焦思，“自夜不寐”，“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封禅书》），年幼的儿子成王诵继位，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贵族不满，禄父乘机串通管叔、蔡叔，联合东方的一些部落和小国，一同起兵叛周。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周公领兵东征，经过三年的时间，才把叛乱平定。周的势力达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周公东征后，因镐京距离东方较远，便营建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为东都，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把被称为顽民的殷贵族迁到这里，派重兵驻守、监视他们。周的王业，是在周公东征和营建东都以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同时，周公、成王大封同姓和异姓诸侯，使许多同姓和姻亲的贵族得到发展，也使不反对周王朝的异姓贵族保持了既得的权力，使周王朝取得贵族们的普遍拥护。然后，反政成王，建立了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世袭诸侯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利用血缘纽带跟封国制度相配合，来团结同姓贵族。同时，王室又跟异姓封国结为婚姻，使王室跟异姓贵族都成为亲家。这种宗法关系和姻亲关系加强了周王朝和封国间的联系，从而在王的领导下，形成王族和其他贵族（同姓的和异姓的）的联盟政权。^⑦

商灭周兴的巨大历史变革，使周公、召公等看到专恃天命、虐用人民的殷王朝终于覆亡，深感“天命不易”（《君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因而提出“德治”来济“天命”之穷；感到“天命”能否保住取决于民意，因而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郑语》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作民明辟”（《洛诰》言作人民的好君主）；感到“德治”的能否施行，取决于成王和诸侯的修身，因而提出“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陈子展译为：于

是进修你们的品德，长久修德而配合天命，自己就会得到多福。）所以，《尚书·周书》和《诗·大雅·周颂》等周初文献的共同特点就是：除前面的《牧誓》、《金縢》、《大诰》、《文王》、《大明》、《皇矣》等篇，仍象商代一样讲到天命、刑戮、卜祀及祖先神灵之外，一般都突出“德治”的思想，处处炫耀祖宗德业，时时教诲成王和诸侯不要忘记文、武创业的艰难、殷亡的教训，告诫他们要：“命之不易，无遏尔躬！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文王》陈子展译为：知道保持天命的不容易，就不要遏止在你们的身上！好好效法文王，万国诸侯就都起来相信、服从！）

（二）周公、召公编写《周易》卦爻辞的目的

通过对殷代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的对比研究，以及周初青铜器铭文、《尚书·周书》和《诗·大雅·周颂》主要内容的考察，从宏观上了解了周初重史的因果，就为我们探索《周易》卦爻辞的编写目的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周人起于渭水中游黄土高原，龟甲、兽骨出产较少，其始不以龟卜，使用龟卜是从殷人那里学来的。所以，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出陶器、石器、骨器较多，并征集到青铜器五件，而卜骨却只有一件；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遗物则未发现卜骨。^⑧在周人自叙开国的《生民》、《公刘》、《绵》、《文王》、《大明》史诗中，直到叙述古公亶父迁岐建周的《绵》篇，才出现“爰契我龟”的诗句。而《大明》在叙述姬昌在“帝乙归妹”时，“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郑玄笺：问名之后，卜而得吉，则文王以礼定其吉祥。）接着是“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文王有声》）这种情况，跟西周甲骨主要为文王时期、武王康王时期的遗物的事实一致。

由此可见，周人本不用龟卜，古公亶父后，之所以学习殷

人，一方面是利用“宝龟”的神秘性，统一周人意志、坚定信心，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天意”依据；一方面是因殷人迷信，乃假手占卜，玩弄玄虚，麻痹殷人，为兴周灭商制造舆论。对此清顾炎武已有察觉，故在《日知录》曰：“古人皆先人后龟。《诗·大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易·系辞》：‘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皆先人后鬼。”惟未说明因由。其实，《周易》卦爻辞已自作说明，请看《巽·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1) 巽：音逊 xùn，顺从。巽古借为逊。《说文》：“逊，顺也。”(2) 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古礼，尊者在床，卑者拜于床下。文王小心翼翼似之。”(3) 唐史征《周易口诀义》：“史谓祝史，巫谓巫覡，皆是接事鬼神之人。”(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纷，变；若，顺也。”爻辞意为：自己拜服床下，史巫龟卜配合，大造臣服舆论，事必吉而无咎。再看《颐·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1) 舍：古通捨。(2) 史征曰：“灵龟，谓神灵明兆之物。”(3)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朵，动也。郑玄同。”(4) 颐：面颊。“朵颐，谓动颐，指动颐以谈话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意为：捨尔之灵龟而不卜，只观我动颐之谈话，事必凶矣。

西周甲骨中有“周人祭祀文武帝乙(即帝乙)、成汤”，“周文王求佑于大甲”等附属国祭祀宗主国祖宗的卜辞，例如风雏所出 H11:1 甲骨文就是说“文王在帝乙宗祠祀成汤及其两个配偶，在殷王祖先神明临下与周大臣吃肉酒，共效忠诚。”^⑩ 更是有力的物证。班固《汉书·艺文志》曰：“殷周之际，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而作上下篇。”可见两汉经师对此尚很明确。

因而，当文王、武王决定干某事时，卜兆吉则依卜去作；卜

兆凶时，则不管凶否，照样去干，跟殷人一切依卜行事不同。《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盖尝贫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虵，非虎非黑，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载与俱归，立为师。”虽然此处记事颇有迷信色彩，但西周甲骨H11:48“王其（乎）兹用既吉渭渔”的记载，却证明了文王卜吉、渭滨遇姜尚是可信的。而汉王充《论衡·卜筮》则记载：“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齐太公世家》也记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武王克商后，执行“事神保民”政策（《国语·周语》），继续使用占卜，以迎合殷人信天信卜的传统统治殷人；利用鬼神权威，统一周人意志，坚定行动信心。所以，武王访箕子，问治国、占卜的常道（《尚书·洪范》）；武王有疾，当年“推蓍蹈龟”的姜尚，如今也主张“为王穆卜”；周公也“乃卜三龟，一习吉。”（《金縢》）

武王死，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蔡助殷叛。这种“授殷天下，其德安施”（屈原《天问》；闻一多《天问疏证》：“此言三叔助武庚叛周，将以天下还授诸殷，其德意安所施用乎？”）的事实，对周王朝一贯宣扬的文、武“克明德慎罚”而受天命、有天下的说法是一次致命的冲击，引起周人的思想混乱，导致自家的邦君庶士竟以艰大为由劝周公违卜，停止东征的艰难局面。为了破其艰大违卜之说，劝其东征，周公既不能象当年武王伐纣时那样扬文王之德，数武庚之罪，大悬赏罚；又不能一意孤行、硬下命令；只能在六十几句的《大诰》中连用九次龟卜语，以统一东征意志，坚定参战信心。如：“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命）”（言我用文王遗留之大宝龟，卜问天命）；“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言天嘉美文王，兴我周邦，文王惟卜是用，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今天其相助我民，况我亦惟卜是

用乎)；“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此言天亦思降嘉美于前文人，予何为放弃吉卜乎？我敢不前往重循文人之美好疆土乎？况今卜并吉乎？故我大命尔等东征，天命无有差错，卜之所陈惟顺从哉！)⑩

东土既定后，周公迁殷顽民于洛邑时，先把殷顽民带到黎水旁，殷人未出畿内，自少阻力。但继此又要渡河迁洛，就不能不利用龟卜的手段来推动他们。《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乃卜河朔黎水(孔传：不吉。)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即王城所在，周师驻此)，惟洛食(吉兆)。我又卜瀍水东(即成周所在，殷顽民迁此)，亦惟洛食。”这前后三卜，黎水不吉，王城、成周吉，完全合乎周公调虎离山、就近监视的意图。这是以龟卜手段施用于迁殷顽民政策的妙用；也是坚定成王和周人营建东都信心的手法。所以，周公使成王来洛以谋建都之事，且献卜兆，从而使成王下定“我二人共贞”(马融曰：“贞，当也。”)的决心。

由此可见，周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营建洛邑，迁殷顽民等客观情况都促使周统治者不仅利用殷人龟卜的老办法，同时还采用相应的新方法，这就是所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根据西周甲骨和古文献记载的推测，周人对殷人龟卜的“损益”有三：首先，由于周地龟甲、兽骨的缺乏，以及殷周之际和周初周人占卜活动的增多，周人在占卜过程中发现卜兆的一、一两种基本形式后，改“卜用三骨”为“卜用三兆”，从而排列组合成八卦；再变用原三骨“习卜”为用原龟重卜三兆，因之出现六爻，进而形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面结构。

其次，为了更便于利用，在殷代卜辞中少量记事刻辞的启发下，演变为事先拟好告所以卜问之事的命龟之辞；然后问疑视兆、

判断吉凶，并记录结果于命龟之辞后。例如，周公在禄父申通管、蔡，联合东夷叛周后，即命龟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周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曰，民猷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言今有大难，西周民心亦不安静，于今动矣。殷武庚竟敢组织其残余。知武王丧、成王幼而周公见疑，武庚竟扬言恢复殷国，反鄙视我周国，今发动今驱驰矣。近日，四国贤者有十夫来翼佐我周，予与之往终文、武所图之事也。我有戎事，休否？）龟卜结果：“朕卜并吉。”（郑玄曰：谓三龟皆从也。）（《尚书·大诰》）成王卜居成周，命龟之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吕氏春秋·长利》引）

再次，将命龟之辞及其结果存于“金縢之匮”，以备他日查阅。如成王时，会有风雷之变，“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以察灾变之故。”（《尚书·金縢》）这些情况，跟西周甲骨有卜辞，但为数不多，绝大部分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对殷末周初不少重大事件都有记载；以及绝大多数西周甲骨（一万六千七百多片）均出于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西周甲组宫殿遗址的西厢二号房内窖穴 H11 及 H31 内，其中有字甲骨即达二一九片之事实基本一致。

东土既定，大封同姓和异姓诸侯，特别是致政成王后，周王朝面临的成王和诸侯能否敬天保民、尚德慎刑“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言惟谓欲至于万年，与王之子子子孙孙长久保安殷民也）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然而，除周公、召公外，周贵族对这种形势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因为，东土既定，殷顽民已迁后，周贵族产生自满，执命之说遂行，以至召公痛感“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君奭》言察我后嗣子孙，大不能重视上天和下民，遏止前人光美于家，不知

天命之难得与上天之难信，乃将失去天命，不能长久。）怎样使他们清醒地看到：“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康诰》）言今民不安，其心未定，屡导之犹未和同；而成王“乃初服”（《召诰》），康侯等“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康诰》），言汝之职事为宽大王所授保之殷民，亦是助王图度天命，作新殷民；却不知文、武尚德慎刑而受天命、有天下的艰难历程，更不懂德治和悦殷民的法则；因而周王朝尚存在“惟命不于常”（《康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的危险局面；从而警醒起来，“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君奭》，江声曰：继嗣前人，恭承其明德，正在于今也。）

为此，周公、召公不仅在《康诰》以下九篇总结出“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通过《大雅》、《周颂》、《豳风》的诗篇启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福如彼；若违而不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郑玄《诗谱序》）而且，为了教诲成王、诸侯及其后嗣子孙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意识，还特别指导史巫将历年存于“金縢之匮”中的命龟之辞及其结果的册书和其他历史文献，整理、编写成《周易》卦爻辞的始稿，使周贵族了解文、武、周、成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从而坚定其执行敬天保民、尚德慎罚基本方针的决心和自觉性。以上论述还得到下列古籍的佐证：

《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五四〇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易象》与《鲁春秋》并举，已暗示二者同归一人所掌之意味；且《易象》与《鲁春秋》亦有十分相似之点，即“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

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高亨曰：辞，卦爻辞也。危，自危也。易，平易也。倾，倾覆也。《易经》旨趣：自以为危险者，使之平安；自以为平安者，使之倾覆。即知惧则平安，不知惧则覆亡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以犹于也。要，概要也。此言人警惕于事之终始，其概要是无咎），此谓《易》之道也。”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集解》引韦昭曰：“《易》本隐微妙，出为人事乃显著也。”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

《集解》引晋干宝曰：“凡《易》既分为六十四卦以为上下经，天人之事各有始终。夫子又为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义。然则文王、周公所遭遇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短长之期，备于此矣！”

两汉经师马融、陆绩、王肃、姚信，西晋史学家干宝，唐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宋儒程颐、朱熹，明易学家来知德等均认为卦爻辞为文王、周公作。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易·系辞上》）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

以此看法为立足点，根据古代典籍，旁及诸家解说，参以甲骨文、金文，对六十四卦卦爻辞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发现，除《大过》（卦二十八）、《咸》（卦三十一）和《渐》（卦五十二）三卦卦爻辞所指不明外，《周易》卦爻辞是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不是“筮辞的堆砌”，更非“迷

信的典籍。”

〔注〕

- ①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与商史研究工作》，《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
- ② 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 ③ 参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
- ④ 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的发现、研究及其学术价值》，《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⑤ 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
- ⑥ 参见陈子展《诗经直解》，高亨《诗经今注》，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 ⑦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 ⑧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 ⑨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
- ⑩ 句读和解说均从周秉钧《尚书易解》，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周易》卦爻辞是周文王、武王、 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 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

(一) 殷周关系的真相

殷周关系是研究殷周之际商史和周史的重要问题，但至今众说分歧，尚未一致。现将《周易》有关卦爻辞加以考释，并结合古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和诸家解说，对此问题略加论述，以资探讨。

1. 从《既济·九三》、《未济·九四》爻辞， 看殷周两国建立臣服关系的时间

关于殷周两国建立臣服关系的时间，大体有三种说法：

武丁时期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令周侯’和‘璞（伐）周’的记载。《易经》中载武丁伐鬼方，周人也参加，并因战功得到商的赏赐。这些史料说明了周至晚在武丁时期已接受了商王朝边侯的封号。”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武丁时的卜辞里，常见‘周’或‘周侯’的文字。武丁伐鬼方，周曾参加，并且‘有赏于大国’”（《易·既济》）。孟世凯更明确提出：“从甲骨文来看，这一百七十年中（武丁至文丁时），周是臣服于商的，且关系比较融洽，未见相侵犯或征伐。”^①

古公亶父时期说。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古公亶父开始

臣服于商，共同对付鬼方等戎狄部落，保障周族的生存和发展。”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古公亶父的时候，周与商已发生了关系。”张光直也提出：“太王自豳迁都到岐下的周原，开始与东面的殷商发生较密切的直接接触关系，这是史料中所公认的。”②

季历时期说。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季历时周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徐中舒也认为：“王季历时代，殷周关系才有文献可征。……《易·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鬼方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所以王季初伐鬼方时还有震恐之心，经过三年艰苦奋斗，最后取得胜利，因而受到大国殷王的赏赐，命为牧师。”③

从上引可见，多数学者都以《周易》之《既济·六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和《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作为立论的史料依据，但对两条爻辞作了不同的解说，提出了三种看法。

我认为主张殷周两国建立臣服关系于武丁时期者，主要失误是将“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做为同一时期、同一事件的史料来立论。其实，这两条爻辞所记述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的两件事。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鬼方是活动在今陕西、甘肃、内蒙及其以北辽阔地区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自殷之武丁，迄周之成王，鬼方国大民众，常为西北患。”（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灵、獬狁考》）近年，罗琨通过对《甲骨文合集》的研究，认为“在武丁卜辞中没有伐鬼方的记载，只有对舌方、土方、羌方等一个个具体敌方的征伐。这因为《周易》爻辞中的‘鬼方’是对西北游牧族的通称。从《古本竹书纪年》有关记载看，至少在武乙时鬼姓之国已崛起于岐周之西，但没有材料证明武丁时它已出现，并和商发生过战争。从卜辞可知商人曾将西北游牧诸族统称为羌人，

却不曾将鬼方作为多方的通称，后者是周人在西周以后的习惯用法。‘高宗伐鬼方’虽是商代的故事，但《易经》在语汇的使用上被打上它产生时代的印记。所以，它所谓的‘鬼方’，与甲骨文中的舌方、土方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在叙述商代历史时，把它们并列起来是不恰当的。所以，《后汉书·西羌传》在‘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下注：‘《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汉音义》：‘鬼方，远方也。’当时学者就认为武丁所伐之‘鬼方’，并非王季所伐之‘鬼戎’，而泛指与‘中国’相对而言的远方之外族。《诗·大雅·荡》‘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以‘中国’和‘鬼方’对举可以为证。西汉扬雄《赵充国颂》‘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仍沿袭将西戎称之为鬼方的说法。至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断：《周易》爻辞的‘高宗伐鬼方’不是记述武丁对某个鬼姓之国的征伐，而是指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对周人泛称为‘鬼方’的西北游牧诸族之‘多方’的战争。”^④故而徐中舒指出：“此两伐鬼方当非一时之事。”

同时，陈梦家据《古本竹书纪年》、《尚书·无逸》和殷墟卜辞推测，殷王武丁时期为公元前1238—1180年（《殷墟卜辞综述》）。而据《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以及《古本竹书纪年》：“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匹”等记载，古公亶父居岐建周约在殷王廪辛、康丁时期（公元前1139—1130年）。而且，考古学家根据近年在陕西宝鸡、长武、岐山、扶风、乾县、长安等地的发现，特别是1981年宝鸡考古工作队对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的发掘，以及陕西周原考古队对扶风刘家姜戎墓葬的发掘探索先周文化，得出了：“先周文化第一时期相当于廪辛至文丁之时；先周文化分布的地域，主要是陕西、甘肃的泾渭地区。第一期偏在西方，而以宝鸡、岐山地区为中心地点。在先周文化形成之初，除了姬姜联盟以外，其他

处于各自为政、互不相属的局面。先周文化的社会大概正处于国家产生的这个历史发展阶段。”^⑤“传说周族的始祖后稷的母亲叫姜嫄，是姜姓的女子。周人的先公不窋曾‘奔戎狄之间’。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后，娶太姜为妃，并让太姜所生的少子季历继承王位，从而与姜戎结成政治、军事的同盟关系，并世代通婚。由于姬姜联盟，而且姬姓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姜戎文化逐渐融合到周文化里面了。《史记·周本纪》说：‘邠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墓地和扶风刘家六期墓葬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姬周化，都可以看出‘贬戎狄之俗’的痕迹。西周时期，尽管姜戎文化在西周文化中尚有孑遗，但是可以说在宝鸡地区基本上被周文化融合了。”^⑥也验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正确。

另外，周人在《国语·周语》自述其先世时亦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此周本为独立之部落而非商臣之证。《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陈子展译为：老实忠厚的公刘！在豳地要营造他的宫室。渡过渭水是横渡去的，采取矿石、采取锻石。宅居的基础就理好了，于是啥也多了，于是啥也有了。）《诗·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陈子展译为：后稷的裔孙，这就是大王。他住在岐山的南方，这就开始了看齐于商。）可知，周人本兴于殷代，故自后稷至文王传说世系仅十五代，其始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同化于戎狄等族；公刘居豳时，尚普遍营穴居生活；古公亶父迁居周原之后，与姜姓婚嫁杂居，“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因太王所居周原，国号曰周。”（《史记·周本纪》、《史记正义》）

由此可见，武丁时期与周国建立，时间相距百年左右，岂能

两国同伐鬼方，建立臣服关系！从不窋到古公亶父，周人一直是独立的部落，从未臣服于商。古公亶父迁岐建周之初，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征伐鬼方。因此，“古公亶父对殷王朝有无朝贡往来，没有文献可供参考。”^③季历时期，殷周关系才有文献可证。请看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鼓，马八匹。”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可见，《未济·九四》爻辞是指周王季历对西落鬼戎为代表的诸戎之战争。对此，汉代学者还很明确，故《后汉书·西羌传》在季历“伐西落鬼戎”下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据此，可对《既济·九三》和《未济·九四》爻辞考释如下：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1)《集解》引虞翻：“高宗，殷王武丁。”(2)《前汉音义》：“鬼方，远方也。”(3)清汪中《述学·释三九》：“古人之措辞，凡一二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象》传：“三年克之，惫也。”《集解》引侯果：“伐鬼方者，兴衰除闇之征也。兴役动众，圣犹疲惫，则非小人能为，故曰：小人勿用。”爻辞意为：圣王武丁，征伐远方，兴役动众，多年方胜，尔等小子，岂敢轻征。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1)《诗·鲁颂·閟宫》：“不震不腾”，孔疏：“震、腾皆以川喻，故皆谓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犹水之乘陵也。”(2)杨树达《词诠》：“用，介词，由也，因也。”(3)大国：“指殷人而言，盖周由小邦而骤兴，其初与殷国力悬殊，故有此称。此言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⑦爻辞意为：鬼方侵犯，周人反攻，历时多年，终获全胜，报捷于殷，殷王赏赐。

可见，王季历时，殷周两国才建立臣服关系。

2. 从《讼》卦爻辞看殷周关系之恶化

《中国史纲要》在论及殷周关系时说：“商为了结好于周人，把挚君之女太任嫁给季历，后来又把莘君之女太姒嫁给文王。由于商周关系愈来愈密切，周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受商文化。”

如何认识殷周关系的实际和性质，我认为应当从分析殷周之际殷、周、鬼方三方面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军事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入手来进行考察。

我们知道，武丁征服了从商王朝西北直到南方的广大地区，达到了商王朝的鼎盛时期。武丁以后，祖庚和祖甲先后继位。祖甲以后的几个王多沉溺在享乐里，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商朝西部的方国群起反抗，廪辛、康丁时期，就对韦方、豳方、系方等方国进行了长时期的征伐，并征调卫、虎、受等十几族“王众”出戍，但始终没有把西部方国部落的反抗完全镇压下去。⑧

与此同时，被武丁征服过的鬼方，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重新强大，开始西侵，地处泾渭之间的周人首当其冲，古公亶父被迫从邠迁岐，建立周国。从当时殷、周、鬼方三方面的国力比较，殷最强大，鬼方次之，周最弱小。周只有争取强大的殷王朝之支持，才能征伐鬼方，保卫边境。为了联合大国并吸收其先进文化，王季历打破姬姜两姓互相通婚的传统，娶商女太任为妻。《诗·大

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陈子展译为：挚国任姓仲女，从那殷商近畿，来嫁于周邦，就是做新妇于周京。她跟她的丈夫王季，只做有德的事情。这太任她有妊，生下了这个文王。）即指此事。这次殷周联姻，“周人以联姻殷商为光荣，而殷人亦欲倚任周人安抚西疆，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③为了争取殷王朝的支持，王季历还亲往朝歌觐见武乙，得到殷王大量赏赐。从此，在殷王朝的支持下，王季历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凡七用师，而六大胜。可见，武乙和文丁时期，殷周关系是良好的。

王季历通过一系列战争，解除了鬼方的威胁，扩大了疆域，获得了大量财物和人力，使周之国势大为兴盛，于是引起殷人的疑忌。为了遏制周的势力，就在文丁十一年“文丁杀季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从此，周与殷王朝结下了世仇。

季历的儿子昌继位，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为了报杀父之仇，姬昌不顾国力，在帝乙二年曾急急忙忙出兵伐商。对此，不仅《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在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而且为近年在凤雏出土之有商王庙祭和祭先王的甲骨中，做了重要补充和证明。据帝乙时的庙祭甲骨 H11:82、H11:84、H11:112 和商人甲骨 H11:237、H11:174 和 H11:168 + 286 等片记载可知，帝乙二年，周文王伐商，商王帝乙闻讯后，连忙在‘文武丁’（即文丁）的宗庙里龟卜，祭祀了战争胜利之神先王大甲，也祭祀了曾杀死周季历的商王文丁，祈求这些先王在天之灵镇慑周文王。……商王帝乙亲自出兵，建立天子之旗——‘太常’以致军众。与此同时，商王还向参与此役的将领赐甲冑，以示勉励和关怀……。此役结局如何？请看《讼》卦爻辞：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1) 讼：征讨。《集解》引郑玄：“讼犹争也。”《吕氏春秋·顺民》高诱注：“争，决也，战斗以求胜也。”《集解》引干宝：

“此天气将刑杀，圣人将用师之卦也。”(2)《集解》引虞翻：

“窒，塞止也。惕，惧也。终止不变，则入于渊，故终凶也。”

(3) 大人：周时指王、公、诸侯、卿大夫。《论语·季氏》郑玄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4)《集解》引何妥：“大川，大难也。”卦辞意为：信用塞止，心存忧惧，仓促征讨，中止得吉，不停则凶；宜见大人，不宜冒险。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永，长也。不可长久斗讼之事，以讼不可终也。”爻辞意为：战事未久而中止，虽受大人之谴责，终无灾祸而吉利。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1) 克：犹言胜。《礼记·礼器》郑注：“克，胜也。”(2) 逋：音补平声 bù，逃亡。《说文》：“逋，亡也。”(3) 眚：音 shēng，王夫之《周易内传》：“灾自外至曰‘眚’。”明来知德《周易集注》：“曰归者，识时势也。”爻辞意为：征讨未取胜，逃亡回家乡，三百户邑人，却未遭灾殃。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1)《来注》：“德与秽德彰闻、闺门 慝 德之德同，乃恶德也。德乃行有所得，往日之事也，故以旧字言之。凡人與人争讼，必旧日有怀恨不平之事，有此怀恨其人之恶德，藏蓄乎胸中，必欲报复，所以讼也。食者、吞声不言之意。王事者，王家敌国忿争之事，如宋之与金是也。无成者，不能成功也。……食其旧日刚猛侵陵之恶德，相从乎彼，与之相好，则吉矣。”故《象》曰：

“食旧德，从上吉也。”(2)《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卢辨注：

“干事曰贞。”爻辞意为：暂且饮恨吞声，危险化为吉祥，只因我弱敌强，征讨难以成功。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1)《说卦》传：“复，反也。”即：即时。《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2)《集解》引虞翻：“渝，变也。”(3)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金滕》：‘即命于元龟’；《洛诰》：‘今王即命曰：立宗功’；立文正相似。”《集解》引侯果：“讼既不克，当反就前理，变其诏命，则安静贞吉而不失初也。”爻辞意为：征讨既难取胜，即时变更命令，安心干事则吉。

“上九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1)《词诠》：“或，虚指指示代名词。”此指卦辞之大人。

(2)鞶带：鞶音pán，《说文》：“鞶，大带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男子带革，妇人带丝。”(3)锡：古通赐。(4)终朝：“正月至四月为岁之朝；上旬为月之朝；自旦至食时为日之朝。”(《经解》)(5)褫，音齿chǐ，《说文》：“褫，夺衣也。”爻辞意为：大人所赐大带，终朝三令退还。

从《讼》卦卦爻辞可知，文王在帝乙初年，虽曾伐商，但未取胜；而帝乙也未乘机对文王大事杀伐。因为，这时紂方和旨方正联合起义；被武丁征伐过的江淮之间的夷人又强盛起来，威胁着殷王朝的后方；帝乙不得不两次征伐东夷，虽然以夷人的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却消耗了殷王朝的大量财力和人力，“殷益衰。”(《殷本纪》)帝乙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夷人；对于姬昌，就不得不采取安抚手段，改善殷周关系，进而使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商”，达到稳住西疆、全力征夷的目的。所以，帝乙不仅不加以惩罚，还把王室少女嫁给文王，《周易·归妹》、《诗·大雅·大明》。可见，“商把挚国之女太任嫁给季历”和“又把莘君之女太姒嫁给文王”，是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目的的两件事；“帝乙归妹”并非“商周关系愈来愈密切”的表现，而是在殷周已成为世仇的情况下，帝乙导演的一出特殊的、复杂的政治剧。

3. 从《泰·六五》、《归妹》卦爻辞， 看殷周关系中“臣服”的真相

心怀杀父之仇、又遭丧师之辱的姬昌对“帝乙归妹”的态度如何？

《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1)《集解》引虞翻：“归，嫁也。”(2)魏王弼《周易注》：“妹，少女之称也。”(3)以祉：有福。《说文》：“祉，福也。”爻辞意为：帝乙归妹，西伯姬昌有福于周，乃大吉祥。

西伯昌为何这样顺从地主演了这出政治剧？殷大而周小，殷之国力强于周远甚。周建国自古公亶父；王季历继之，力未充足，为殷文丁所杀；姬昌力征报仇，又失败而归。周人只有隐忍待时、蓄积力量。请看《归妹》卦爻辞：

“归妹 征凶，无攸利。”

《尔雅·释言》：“攸，所也。”（攸音由，yóu）卦辞意为：帝乙归妹，对我有利，伐商已败，征无所益。

“初六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1)《尔雅·释言》：“以，与也。”(2)娣，音弟dì，古代以妹陪姊同嫁一夫，称妹曰“娣”，犹侧室。《公羊传》：“诸侯娶一女，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3)跛（音播bō），瘸了一条腿。爻辞意为：殷周联姻，改善关系，跛足康复，再征则吉。

“六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1)《释文》：“眇，字书云：盲也。”(2)幽人：隐伏之人。《说文》：“幽，隐也。”《象》传：“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爻辞意为：殷周联姻，关系正常，由晦返明，利于隐伏。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1)《词詮》：“以，介词，因也，表动作之所因。”(2)《说

文》：“须，面毛也。”(3)反归：被休弃回娘家。《春秋谷梁传》：“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集解》：“反，谓为夫家所遣。”爻辞意为：帝乙归妹，与娣同嫁，因面有须，妹娣同休。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1) 愆（音千qiān），超过。《释文》：“愆，马融曰：过也。”

(2) 时：《释文》：“时，一本作‘待’。”清王念孙《经义述闻》亦读待。爻辞意为：有所等待，迟迟未嫁，待到嫁时，年龄已大。

“九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1) 高亨：“君，谓嫁为邦君夫人者也。《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是其义也。”(2) 袂（音妹mèi），“疑借为袂，同声系，古通用。《说文》：‘袂，鼻目间貌。’此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鼻目间之容态之美也。”(同上)爻辞意为：帝乙归妹，妹娣同嫁，其君之貌，不如其娣。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往。”

(1)《说文》：“承，奉也。”(2) 刲（音亏kuī），《说文》：“刲，刺也。”《仪礼》：“妇人三月，然后祭行。妇人三月，始奠菜。”《礼记·曾子问》：“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这是说过了三个月，拜见祖宗，才正式取得媳妇的资格。对于为什么要这一条类似试用期的规定，前人都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据我想，这是为维护家庭和睦和繁衍后代考虑的。如果三个月内新妇不顺，或试明不能生育，都在“七出”之内，以其未成妇而分手，于双方都好。⑩宋程颐《周易程氏传》：“士当承筐而筐无实，无实则无以祭，谓不能奉祭祀也。夫妇共承宗庙，妇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奉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奉祭祀也，谓不可承祭祀也。妇不能奉祭，则当离绝矣，是夫妇之无终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从《归妹》卦爻辞可知，周文王因“征凶，无攸利”；而“帝乙归妹”却“跛能履”、“眇能视”、“利幽人之贞”，才与殷联

姻。同时，又造出“归妹愆期”、“归妹以须”、“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良”等舆论；“三月而庙见”后，终以“女承筐无实”为借口，“反归以娣”。这些情况不仅从《诗·大雅·大明》之四、五、六章得到证实，而且《归妹》卦爻辞还为解决诗中长期争论未决的两个问题提供了解决线索。请看《大明》之四、五、六章：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缡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毛传》、《郑笺》以来，对于诗中“天作之合”和“倪天之妹”的“天”均解释为：“天监视善恶于下，其命将有所依就，则豫福助之。于文王生适有所识，则为之生配于气势之处，使必有贤才，谓生太姒。”“又知太姒之贤，尊之如天之有娣。”即上帝。而于诗中“大邦有子”和“缡女维莘”则认为指太姒一人。惟明邹忠胤意太姒为文王继妃，以解“缡女维莘”句，以文王即位后取太姒。（《诗传闡》）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从之，近人高亨、陈子展亦采此说，但“大邦之子”究指何人，却均未交待清楚。

《归妹》卦爻辞解通，则《大明》之疑问迎刃而解。因为据《归妹》卦爻辞所叙“帝乙归妹”之事，则“天作之合”和“倪天之妹”之“天”指殷帝乙（《尔雅·释诂》：“天，君也。”）；“大邦有子”之“子”为“帝乙归妹”之“妹”（王弼：“妹者，少女之称也。”）后因“故”反归，文王继娶莘国君之长女太姒为继妃，即“缡女维莘，长子维行”也。所以，顾颉刚曰：“至帝乙归妹，《诗》称‘倪天之妹’，当是王族之女子。后来继娶莘国之女。”⑩高亨也认为：“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文王次妃即太姒，武王之母也。……帝乙所归之妹，疑因故大归，故文王又娶太姒乃生武王也。”据此，则《大明》之四、五、六章可直解如下：

文王即位的初年，帝乙作成他的配偶：在洽水的北方，在渭水的边头。

文王的嘉礼到了，殷国有一个女子，好比帝乙的少女。决定了聘礼的吉祥，前往亲迎到了渭水。聚合多船作了浮桥，不是显出了他的荣耀？

这命令是从天来，命令文王：改号为周、改邑为京。这继妃是莘国女子，莘国君的长女出嫁文王，天特生了武王。

这就是“帝乙归妹”的真相。可见，那种以殷王“把莘君之女嫁给文王”为据，断言“商周关系愈来愈密切”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4. 从《坎》、《剝》卦爻辞，看殷周关系中 “咎周”与“戡商”的斗争

历史发展是充满着矛盾的运动，因此，在殷周关系中周对殷“臣服”的同时，“咎周”（《殷本纪》）与“戡商”（《坤·六三》）的斗争也贯穿始终。“帝乙归妹”后，姬昌在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的指引下，“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音有yōu）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周本纪》）“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齐太公世家》）这是殷周之间利害冲突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现行中国古代史著作中，对此却叙述简略、脉络不清。一般只据《古本竹书纪年》之“文丁杀季历”记载一笔带过；而对《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战国策·赵策》、《吕氏春秋·首时》、《韩非子·难二》、《淮南子·道应训》和《帝王世纪集校第五》等篇均有记载，《史记·殷本纪·周本纪·齐太公世家》等篇反复叙述的“西伯囚羑里”的史实，除《中国史稿》和《西周史话》加以采用外，多以“民间传说不足信”为理由而弃之不用，未免失当。

其实，除上述先秦两汉古籍所载史料，以及吕思勉在其所著《先秦史》中对此史实的考证外，《周易》的《坎》、《剥》等卦爻辞也是“西伯囚羑里”的可信史料。现将《坎》、《剥》卦爻辞考释于下，以资证明。

《坎·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1) 习坎：水牢。《释文》引刘表：“水流行不休，故曰习。”《说文》：“坎，陷也。”(2)《释文》引《说文》：“坎中更有坎。”爻辞意为：身陷水牢，又关密室，凶多吉少。再看《剥》卦：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1)《杂卦》传：“剥，烂也。”《说文》：“剥，裂也。”(2)《集解》引虞翻：“以，及也。”(3)《集解》引马融：“蔑，无也。”《象》传：“剥床以足，以天下也。”爻辞意为：长年水泡，床足已烂，其事凶矣。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床板。《集解》引崔憬：“今以床言之，则辨当在第足之间，是床榫也。”《象》传：“剥床以辨，无有与也。”《玉篇》：“与，用也。”爻辞意为：床板泡烂，难以安身，其事更凶。

“六四 剥床以肤，凶。”

《说文》：“肤，皮也。”《象》传：“剥床以肤，切近灾也。”《集解》引王肃：“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者，人也。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剥床以肤，凶。”爻辞意为：床板泡烂，水浸及身，肌肤遭灾，前途凶险。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1) 贯：古通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杜预注：“贯通惯。”(2) 高亨：“鱼当读为御，古文通用。《小尔雅·方言》：‘御，侍也。’贯御谓左右近习侍使之

人。”(3)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以，语词之‘用’也。”(4) 程颐：“宫人，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5) 《说文》：“宠，尊居也。”《象》传：“以宫人宠，终无尤也。”《尔雅·释言》：“尤，过也。”爻辞意为：亲信大臣，献紂美人，美人得宠，事无不利。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1) 《尔雅》：“硕，大也。”(2) 舆：众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吾侯听舆人之诵。”杜预注。(3) 庐：茅舍。《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毛传。爻辞意为：硕果未被吃，君子反得众，小人国将亡，无处可容身。

《坎》、《剥》卦爻辞所叙与下列文献记载相合：

《战国策·赵策》：“紂囚文王，而欲舍之死。”

《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于紂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四驹，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紂。紂大说（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他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明年，伐崇侯虎。”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①通过对有关殷周关系卦爻辞的考释、历史文献的核实，以及考古资料的验证，我们可以得出：殷周之际的殷周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敌对”或“臣服”两字便可以包括完全的。它们时而“和好”，时而交恶，不过是根据当时客观形势的变化，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不同斗争手段罢了。

〔注〕

① 孟世凯《甲骨文中所见商周关系再探讨》，《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

达刊第二辑，1984年4月。

-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殷周关系的再检讨》。
- ③ 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 ④ 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
- ⑤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论先周文化》。
- ⑥ 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 ⑦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史语所集刊》第7本2分册。
- ⑧ 参见王宇信《西周史话》。
- ⑨ 许嘉璐《先秦婚姻说略》，《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
- ⑩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3册。
-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923页。

（二）周文王怎样“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自孔子定下了周文王行善积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的基调；虽然司马迁据实直书：“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齐太公世家》）刘知几也据理批判：“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理，理不如斯。……盖姬之事殷，当比马（司马昭）之臣魏（曹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史通·疑古》）却经不住历代封建皇朝统治者及其儒臣的围攻和封锁。他们或者隐瞒事实，索性删掉《史记》中有关周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记载，例如唐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和宋司马光主编的《稽古录》就是这样作的。或者侈谈天命、仁义，隐晦其辞，以掩真相，例如宋朱熹在《读王隐之尊孟辨》和《古史余论》中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尔。使其历数在躬天命之人归之，文王虽欲尽臣节，予知其不能为焉。”“所论史迁之失，以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亦中其病。”明王阳明在《语录·传习录》中亦云：“文王在时，天下三分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纣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是善处纣，使不能纵恶而已。”以至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还大肆宣扬什么：“案殷、周两《纪》及《齐世家》皆言西伯、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夫德非倾人之事，亦非阴谋所能为。若果如是，又何以文王、太公？古史削去阴行，止称修德，是明圣人心，其见卓矣。《伪孔传》于《戡黎》云：‘文王事纣，内秉王心’；孔疏虽有：‘貌虽事纣，心有将王’之语。《困学记闻》卷二

析之曰：‘文王之事之纯，岂心与貌异乎？盖见迂《史》说文、武志在倾商，累年伺间，虚言成实，遂发此谬谈耳。’”

影响所及，以往史籍大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周初文、武、周公为楷模，而不提“阴谋修德”之事。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者，冲破了传统观念和方法的束缚，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研究西周史，揭示了文、武“一方面是利用宗教以统治愚民，一方面是努力不懈以操政柄”的史实；提出了：“所谓积德行义之说，真不值一辩的看法。”^①此后，《中国通史》、《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纲要》等通史著作都论述了“周怎样灭商”的史实。但因受文献记载不足、考古资料有限的局限，除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和王宇信《西周史话》对“周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史实有所叙述外，其他各书均语焉不详或略而不谈。

值得庆幸的是，在“占筮书”的掩护下，《周易》卦爻辞却保存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现择其要者，考释于下，并结合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对此问题略加论述，以资探讨。

1. 从《坤》、《乾》、《遯》卦爻辞看周文王 如何确定隐忍待时、蓄积力量的方针

“文丁杀季历”、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失败后，周文王心怀父仇、国耻，岂能不报！无奈，殷大而周小殷之国力大于周远甚，周人只能隐忍待时、蓄积力量。请看《坤》卦爻辞：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1)《集解》引侯果：“马之所以行地远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焉，顺之至也。”《程传》：“牝马柔顺而健行，故其象曰牝马之贞。”(2)《尔雅·释言》：“攸，所也。”(3)《韩非子·解

老》：“凡失其欲行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4）《国语·周语》韦昭注：“主，正也。”（5）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者，言文王之友邦在西南，商之都城在东北。《尚书·牧誓》所载随武王出师伐纣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皆西南方部族或小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武王率西南诸州伐纣也。”卦辞意为：要想干事大亨通，当如母马之柔顺而健行。君子有所出行，先迷途而后知正道：前往西南得盟友，征伐东北却丧众，安心干事则吉祥。

“初六 履霜，坚冰至。”

（1）履：踏、踩。（2）《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集解》引干宝：“言阴气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待时，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霜也。”爻辞意为：虽然脚才踏秋霜，要防严冬踩坚冰。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1）直：古通“值”。王力《同源字典》：“按，在当值的意义上，‘直、值’实同一词。字本作‘直’。《史记·匈奴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索隐》引姚氏：‘古字例以直为值。值者，当也。’”（2）方：邦、国。不仅在卜辞、青铜器铭文中经常看到很多方国的名称，如“羌方”、“土方”等；而且在《周易·比》卦辞“不宁方来”，《观·象》传“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复·象》传“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中之“方”均为邦国义。

（3）习：古通“袭”。《尚书·大禹谟》“不习吉。”孔疏：“习与袭同。”《谷梁传·襄公三十三年》范宁注：“轻行掩其不备曰袭。”于省吾《双剑謠易经新证》：“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应读作：值方大，不袭无不利，方大二字连读。言当方国盛大时，不侵袭之，固无所不利也。”爻辞意为：值此敌邦强大时，我不袭击无不利。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1) 含章：应读为戕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含疑借为戕。含、戕皆从今声，古通用。《说文》：‘戕，杀也。’引《书》曰：‘西伯既戕黎。’今《尚书·西伯戡黎》戕作戡，古通用。《尔雅·释诂》：‘戡，克也。’章疑读为殷商之商。章商古通用。《吕氏春秋·勿躬》：‘弦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作弦商。《荀子·王制》‘审诗章、禁淫声。’《贾子·辅佐》：‘审诗商，命禁邪音，息淫声。’诗商即诗章。（此王念孙《读书杂志》说）。含章即戕商，谓武王克商也。《姤·九五》云：‘含章，有陨自天。’含章亦即戕商。有陨自天言商之陨灭，乃由天命也。《丰·六五》云：‘来章有庆誉，吉。’章亦即商，言来商有赏有誉也。《易》中仅此三章字，皆用为殷商之商也。”后在《周易大传今注》又补充曰：“《兑·九四》：‘商兑’，汉帛书《周易》商作章，可证二字古通用。”(2) 王事：征伐之事。清顾炎武《日知录》：“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其国之事，谓之政事。”爻辞意为：灭商之事可进行，只有报仇征伐事，前已无成应终止。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1) 《集解》引虞翻：“括，结也。”(2) 《广雅》：“咎，过也，恶也。”唐史征《周易口决义》：“戒慎自守，故曰无咎也。德既不修，无声誉之美，故无誉也。”清李埏《周易传注》：“不得摘以过，不得加以誉，以咎誉皆害之招也。”《象》传：“括囊，慎不害也。”《集解》引干宝：“天地将闭，贤人必隐，怀智苟容，以观时变。”爻辞意为：要如袋结口，莫把真情露，既不去伤敌，也不求声誉。

“六五 黄裳，元吉。”

(1) 《礼记·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愚谓党正祭蜡，

属民饮酒，而一国之人皆若狂。黄衣黄冠而祭，谓农夫与于蜡祭之礼者。既祭，则使之饮酒宴乐，以休息之也。野夫黄冠者，言野夫既贱，故蜡祭之时，不得皮弁素服，而其服如此也。黄冠草服者，黄冠乃臺笠之属，而其色黄也。”（2）周人身上穿的衣服统称为衣裳。衣是上衣，裳是下裳。裳并不是裤子，而是如今我们说的裙。衣服的材料主要有丝织品和麻织品。古人所谓布是麻织品。所以“布衣”成为平民百姓的代称。②《周易注》：“黄，中之色。裳，下之饰也。垂黄裳以获元吉，非用武者也。”《集解》引干宝：“当总己之任，处疑僭之间，而能终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爻辞意为：身穿麻黄裳，一如农夫样，民亲敌不疑，我则得大吉。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1）龙：根据古老的传说和考古资料，龙是由我国原始部落图腾演变而成的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我国古代用来象征王和皇帝。汉贾谊《新书·容经》：“龙也者，人主之辟（譬）也。”（2）《说文》：“战，斗也。”（3）野：原野。《说文》：“野，郊外也。”（4）《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乾·文言》传：“阴疑于阳必战。”《象》传：“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周易注》：“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来知德：“血者龙之血也。坚冰至者，所以防龙战之祸于其始；龙战于野者，所以著坚冰之至于其终。”爻辞意为：如若逞强好胜，必招敌人进攻，二国交战于野，血染泥土青黄，难免两败俱伤。

《坤》卦卦爻辞何以充满如此强烈的如履薄冰、防微杜渐、慎经于始的情调？因为心怀杀父之仇，又遭丧师之辱的姬昌，虽然不得不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其实“戡商”之志更坚定了。只因殷大周小，敌强我弱，周人必须夙夜不懈以服事殷，以便隐忍待时、蓄积力量。为此，他决定及时退避，以退为进，请看《遯》

卦爻辞：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1)《广雅》：“遯（音盾dùn），避也。”(2)《战国策·秦策》高诱注：“尾，后也。”《集解》引陆绩：“避难当在前，而在后则厉；往则与灾难会，故勿用有攸往。”爻辞意为：及时退避，退迟则危，若有所往，则有灾难。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脱。”

(1)《荀子·尧问》“执一无失”杨倞注：“执，专也。”(2)兽皮去毛曰革，黄牛之革，用黄牛之革制成之绳，坚韧而难断。(3)《集解》引虞翻：“莫，无也。”“胜，能。”(4)说：古借为脱。《释文》：“说，徐吐活反，解说也。”《象》传：“执用黄牛，固志也。”爻辞意为：坚定退避志，有如牛革固，行此退避策，专心莫动摇。

“六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1)系：拘系。《说文》：“系，絜束也。”(2)《集解》引虞翻：“厉，危也。”(3)畜：豢养。(4)臣妾：古时男人、女子之贱称。《周礼·大宰》郑玄注：“臣妾，男女贫贱之称。”《象》传：“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集解》引王肃：“三下系于二而获遯，故曰系遯。病此系遯而获危惧，故曰有疾惫也。”爻辞意为：受拘系于殷王，虽退避而危惧，只能养育臣妾，不可暴露意图。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好遯者，外不与小人绝，当祸患未形之时，从容而遯也。”

“九五 嘉遯，贞吉。”

尚秉和：“乃能识微虑远，及此嘉时而遯焉，故曰贞吉。”

“上九 肥遯，无不利。”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子夏传》曰：‘肥，饶裕也。’……遯而能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

《遯》卦爻辞记载姬昌抓住嘉时良机，及时退避，但仍受殷王之拘系而时有祸患，故必施行“畜臣妾吉”、遯而得肥，以退为进之策略。为此，《乾》卦爻辞叙述了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之要点，请看：

“初九 潜龙勿用。”

勿用：不可施行。《说文》：“用，可施行也。”宋陆佃《埤雅》引贾谊《新书·容经》：“龙也者，人主之辟（譬）也。潜龙入而不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并曰：“观谊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为潜龙也。盖止使人勿为谓之勿，所谓‘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类，皆戒使勿为也。”爻辞意为：别学那潜伏渊中，无所作为的龙。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1）见：即今“现”字，意为出现、示范。《释文》：“见，贤遍反，示也。”《玉篇》：“示，语也，以事告人曰示也。”（2）田：耕种的土地。《释名》：“已耕者曰田地。”爻辞意为：龙要亲临田间，与民同耕，为大人示范。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1）君子：周时指王、公、诸侯、卿大夫。《礼记·丧服》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2）终日：整天。《正义》：“终日，终竟此日。”（3）乾乾：勤勉不息。《释名》：“乾，健也，健行不息也。”《吕氏春秋·士容》高注：“乾乾，进不倦也。”（4）夕：从天黑到天亮。《说文》：“夕，莫（暮）也。”《诗·大雅·蒸民》郑笺：“夜，莫也。”孔疏：“夜者，自昏至旦之总名。”（5）惕若：警惕貌。《释文》引郑玄：“惕，惧也。”若，助词，犹“然”。（6）无咎：转危为安。《集解》引干宝：“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爻辞意为：君子整天勤勉不息，夜间也提高警惕，即使面临危险，也能转危为安。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1) 或：古通“有”。《周易正义》：“凡言或者，或之言‘有’也。”《词詮》：“或，外动词，有也。”《经传释词》：“盖‘或’字古读若‘域’，‘有’字古通若‘以’（说见《唐韵正》），二声相近，故曰：‘或’之言‘有’也。”(2) 跃：跃进。《尔雅·释詁》：“跃，上也。”(3) 渊：国中、邑内。《程传》：“渊，龙之所安也。”《象》传：“或跃在渊，进无咎也。”爻辞意为：只有在渊中跃进，才能免遭咎害。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1)《释名》：“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现代汉语尚有远在天边的用法。(2) 大人：古代部落首领名。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后汉书·东夷传》、《乌桓传》俱称部落的首领为大人，似乎沿袭周初的旧名。”《象》传：“飞龙在天，大人造（一作聚）也。”爻辞意为：龙要远飞高原诸邦，会见他们的首领。

“上九 亢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1) 亢(音抗kàng)，亢进。《集解》引王肃：“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2)《周易正义》：“悔者，其事已过，有所追悔之也。”(3)《说文》：“头，首也。”《象》传：“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程传》：“见群龙，勿为首则吉也。”按：筮人为了神化占筮，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周易本义》)故一改卦必六爻之通例，把原《上九》：

“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分为《上九》、《用九》两条爻辞。对此，宋王安石亦有察觉，明来知德《易经集注》采纳其说：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乃“因上九亢龙有悔而言之。用九者，犹言处此上九之位也。到此何以处之哉？惟见群龙，无首则吉。……昔王介甫常欲系用九于亢龙有悔之下，得其旨矣。”今采此说，合而译之。爻辞意为：轻敌冒进，龙已追悔；会见群龙，不做头领。

对此，古人已有察觉，故晋史学家干宝曰：“此盖文王反国，大釐其政之日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难，增修柔顺，以怀多福，故曰无咎。”崔憬也说：“君子喻文王，言文王进德修业，所以貽厥武王，至于九五（灭商建周）。”（《集解》）孔颖达更明确指出：“若周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事纣也。”（《周易正义》）

2. 从《复》、《巽》、《颐》卦爻辞，看姬昌与殷

恢复关系以及利用龟卜的阴谋

为了执行隐忍待时、蓄积力量的方针，周人不得不表面上臣服于殷。为此，姬昌决定与殷王朝恢复臣服关系，并亲到朝歌去觐见殷王，表示诚意，请看《复》卦爻辞：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1）复：恢复。《史记·平原君传》：“三去相，三复位。”（2）疾：古通嫉、妒忌。见《尚书·泰誓》孔传。《尚书·酒诰》：“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卦辞意为：恢复臣服关系，对我干事有利，出入不招妒忌，朋来无有灾害；往返朝歌路程，七日可以来回，利于前往复交。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正义》：“韩氏云：‘祇（音支 zhī），大也。’既能速复，是无大悔，所以大吉。”

“六二 休复，吉。”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承天之休”，杜注：“休，美也。”爻辞意为：完满地恢复关系，对我自然大吉。

“六三 频复厉，无咎。”

频：古借为颦，皱眉头。《集解》引侯果：“惧其将危，频蹙而复，履危之道，义亦无咎也。”爻辞意为：惧其将危，皱眉而复，转危为安，对我无咎。

“六四 中行独复。”

《礼记·檀弓》：“文子其中退然。”郑玄注：“中，身也。”《象》传：“中行独复，以从道也。”爻辞意为：亲自朝殷，恢复邦交。

“六五 敦复，无悔。”

《后汉书·卢植传》颜师古注：“敦，勉力。”《象》传：“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爻辞意为：勉力恢复邦交，对我有利无悔。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1)《周易程氏传》：“迷而不复，其凶可知。有灾眚：灾，天灾，自外来；眚，己过，由自作。”(2)以：因为。《词詮》：“介词，因也，表动作之所因。”(3)《周易尚氏学》：“不克征，言不能兴起也。”《象》传：“迷复之凶，反君道也。”爻辞意为：不顾国力，伐商失误，因其王凶，终于失败，自我致灾，十年难兴。

《复》卦爻辞记载了姬昌与吕尚等确定跟殷王朝恢复臣服关系的原因、目的以及姬昌亲往朝歌恢复邦交的态度和行动。

为了进一步迷惑殷王，姬昌及其亲信还利用龟卜，制造舆论。请看《巽·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爻辞意为：自身拜服床下，史巫龟卜配合，大造臣服舆论，事必吉而无咎。再看《颐·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爻辞意为：舍尔之灵龟而不卜，只观我动颐之谈话，事必凶矣。

我们知道，殷商时代，殷王集神权、王权于一身，引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他们敬事鬼神，残民事神，迷信占卜，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无事不卜，无日不卜。鬼神好像是专为他们答问贞卜而存在，而他们也好像是依靠着鬼神的指示而行动。”③而“周人尊礼尚

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表記》），周文王采取“事神保民”的方针（《国语·周语》）；但因殷人迷信龟卜，乃假手龟卜，玩弄玄虚，大造臣服舆论，以麻痹殷王。

上引卦爻辞不仅与《古本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帝乙“二年，周人伐商”，以及《尚书·大诰》：“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言天嘉美文王、兴我周国，文王惟卜是用，能安受此命）等记载相合，而且被周原出土的帝乙时庙祭甲骨和商人卜甲记载周文王伐商后，帝乙在“文武丁”的宗庙龟卜，祭祀了战争胜利之神先王太甲，祈求这些先王在天之灵保佑征战胜利，并借文丁之灵镇慑姬昌的卜辞；以及“周人祭祀文武帝乙、成汤”、“周文王求佑于太甲”等附属国祭祀宗主国的卜辞所证实。

3. 从《屯》、《同人》、《家人》卦爻辞， 看周文王在国内蓄积力量的措施

由于殷王倾全国兵力与东夷进行长期战争，对已经成为西方方国中心的西伯昌，就不得不采取安抚手段，改善殷周关系，以达到稳定西疆，全力征东夷的目的。同时，姬昌又主动与殷王朝恢复臣服关系，并利用龟卜，大造臣服舆论，减轻了殷王对周人的疑虑，从而使周人得到较长的和平时期。姬昌抓紧这难得的时机，努力发展人力、物力和军力，作好报仇“戡商”的准备。请看《屯》卦爻辞：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1）《易经集注》：“磐，大石也。‘鸿渐于磐’（《易·渐六二》）之磐也。桓（音环 huán），大柱也。《檀弓》所谓桓楹也。震阳木，桓之象也。张横渠以磐桓犹柱石是也。”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报导：始建于三千多年前的一处殷代大型宫殿建筑的基址，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发掘

面世。这是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掘的一处最大的宫殿建筑基址。在房基中间有夯土柱基，多有础石。北排房基有三排柱洞，间距2.6~3.1米，中间一排柱洞，均有础石，柱坑较深，排列整齐有序。基址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周因于殷礼”

（《论语·为政》），西周建筑有不少方面与殷代建筑是一脉相传的。(2)《乾·文言》：“贞固足以干事。”爻辞意为：础石木柱，屋室牢固，建立诸侯，王室永固。

“六二 屯如，邳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1)《说文》：“屯，难也。”《经传释词》：“如，语助也。《易·屯》六二：‘屯如邳如’，《子夏传》曰：‘如，辞也。’”(2)邳(音詹zhān)，《释文》引马融：“难行不进之貌。”《玉篇》：“转也，移也。”(3)《程传》：“乘马，欲行也。班，分布之义。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故欲进而复止，乘马班如也。”(4)匪：古通“非”。《集解》引虞翻：“匪，非也。”《词论》：“匪，否定副词，不也。”(5)《周礼·大宗伯》郑玄注：“兵作于外为寇。”(6)婚媾：结婚。《释文》：“媾，郑云：‘犹会也。’”(7)《说文》：“贞，卜问也。”(8)《集解》引虞翻：“字，妊娠也。”爻辞意为：处境真艰难，彷徨而难行，既不能征伐，只得结婚姻，虽知龟卜告，此女难怀孕。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1)宋蔡渊《周易经传训解》：“即鹿，逐鹿也。”(2)虞是古代管理山泽的官名。《尚书·舜典》孔传：“虞，掌山泽之官。”(3)几：危险。《说文》：“几，殆也。殆，危也。”(4)舍：古通“捨”。《释文》：“舍，徐音捨。”(5)吝：行难。《周易尚氏学》：“《说文》‘口’部引作‘吝’云：‘恨惜也。’‘辵’部引又作‘遯’，云：‘行难’。……凡言‘往吝’者，宜从‘行难’义。”《三国志·魏志·陈琳传》：“《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爻辞意为：逐鹿却无

虞人从，盲目深入密林中，君子身陷危险境，一意孤行路难通。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婚媾：亲戚。《经解》：“侯有同姓异姓庶姓。异姓者，婚媾甥舅。重婚曰媾，如齐太公（姜尚）周之元舅，世为婚姻也。”故闻一多曰：“古言婚媾犹今言亲戚。”《来注》：“非真婚媾也，求贤以济难，有此象也。”《象》传：“求而往，明也。”明何楷《古周易订诂》解此“明”字“兼自知、知人二义。”爻辞意为：欲进而复止，求贤以相辅，亲中良臣聚，举事无不利。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1）屯：古通囤、囤积。《释文》：“沈徒尊反；聚也。”（2）膏：膏粱。《国语·周语》：“夫膏粱之性难正也。”韦注：“膏，肉之肥者。”（3）大：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对方或超过一般。跟“小”相对。爻辞意为：囤积膏粱，小干吉祥，大干招灾。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1）王夫之：“陨泪无声曰‘泣血’。”（2）涟如：形容泪流汪汪之状。《周易程氏传》：“乘马往，复班如不进，穷厄之甚，至于泣血涟如，屯之极也。”《象》传：“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引杨简：“何可长也，言何可长如此也，非惟深悯之，亦觐其变也，变则庶乎通矣。”爻辞意为：欲进而复止，伤心泪涟涟。再看《同人》卦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1）同人：聚众。《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缁武功。”高亨：“武功，武事。农奴打猎也是为了继续练习武事。”陈子展译为：十二月里大家忙的聚拢，就继续练习些打猎武功。（2）大川：似指黄河。卦辞意为：聚众于野，练习武事，以利渡河，成君子事。

结合前引《遯·九三》“畜臣妾吉”，《遯·上九》“肥遯，无

不利”，可以看出：伐商失败后，姬昌虽与殷联姻，继续臣服，但父仇未报，反招致疑忌。为了摆脱“欲进而复止，伤心泪涟涟”的进退两难处境，必须重新蓄积力量，为此，文王采取如下措施：

（1）建立诸侯，强固宗室。请看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

《诗·大雅·板》：“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为宁，宗子维城。”陈子展译为：大邦诸侯就是屏障，同姓子弟就是栋梁。以德团结就是安宁，王的嫡子就是一座大城。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旦者，武王弟也。”谯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

《燕召公世家》：“召公奭，周同姓，姓姬氏。”《索隐》：“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者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

《周易·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卫康叔世家》：“卫康叔，周武王同母少弟也。”《索隐》引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

《沫司徒噩簋》：“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唐兰意译为：“王来征伐商邑，命康侯在卫地防守边境。”（《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2）崇尚宗臣，礼下贤者。

《诗·周颂·烈文》：“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陈子展译为：莫强的是得到贤人，四方诸侯都要受教导的。

《尚书·君奭》：“惟文王惟克修和我有夏，有若虢叔，有若闾天，有若太颠，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宫括。”

《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士以此多归之。……”

《尚书大传》：“文王以闾天、太公望、南 宫 括、散宜生为四友。”

姜尚不仅在武王时战功累累，早在文王时就已成为周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这一点在《齐太公世家》等书中有所记载。为大家熟知的文王遇姜尚的故事，虽然颇有迷信色彩，但西周甲骨H 11:48“王其(乎) 兹用 既吉 渭渔”记载，却证明了文王“受命”前渭滨遇姜尚是可信的。

(3) 养教多士，囤积膏粱。

《诗·大雅·思齐》：“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陈子展译为：太姒继承了她们的美名，像有百把个男儿出生。

《诗·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 王 国。王国克生，维国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陈子展译为：愿这 皇 天生下多士，生在这个王国。王国能够生了他们，这都是国家的骨干之臣。有了威仪济济的多士，文王的国家就此安宁。

《尚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维正之供。”章太炎曰：“康功者，谓平易道路之事。田功者，谓服田力穡之事。文王皆亲蒞之，故曰 卑 服。”言文王不敢游乐田猎，不敢使庶邦惟正税是进也。

为了推动全国臣民积极施行这些措施，文王还身体力行，严治其家以作示范。请看《家人》卦爻辞：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1) 嗃嗃：音鹤 hè，苦热之意。《释文》：“郑云：苦热之意。刘作焯焯。”(2) 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悔厉吉者，有恨于心，其事虽危而吉。”(3)《释文》引郑玄：“嘻嘻，骄佚喜笑之貌。”胡朴安：“妇不妇、子不子，嘻嘻不事职业，终至家败而吝也。”

《象》传：“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节，即各守其职业之谓。)爻辞意为：家人劳务重，苦热心 怨 恨，事虽危

而吉；妇不从妇事，子不尽子职，终归有憾惜。

“六四 富家，大吉。”

胡朴安：“不言家富，而言富家，各努力于职业以富之也。”

《象》传：“富家大吉，顺在位也。”爻辞意为：全家之人，人尽其职，努力做事，家庭必富。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1)《释文》引马融、《集解》引陆绩并曰：“假，大也。”(2)

《说文》：“恤，忧也。”王夫之：“陆以假为大，是也。家，谓门内之事，非得天下也。‘王假有家’者，王宽大其家也，是假有宽大之意。”所谓宽大其家，即是说家庭人口繁衍，多多益善，人口多、家庭兴旺标志着治家有道，此即《思齐》：“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之意。爻辞意为：王治其家，人口繁衍，家庭兴旺，勿忧而吉。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1)《周易尚氏学》：“为全家所翊戴，故曰有孚。”(2)胡朴安：“威，仪也。治家之道，以身作则，《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一家之长，当以身作则也，故《象》曰：‘反身之谓也。’”爻辞意为：王治其家，以身作则，全家信从，终归吉庆。

4. 从《比》、《随》、《蹇》、《需》卦爻辞，

看周文王怎样争取同盟国

为了从长计议、蓄积力量，作好“戡商”的准备，周文王和吕尚等还充分利用殷王朝与各方国的矛盾，积极争取同盟国，并“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四十余国”（《左传·襄公四年》），悄悄地动摇着商王朝的统治基础，请看《比》卦卦爻辞：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1)比：亲比。《左传·昭公三年》杜预注：“比，相亲比。”

(2)《周易程氏传》：“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著龟也。推原筮决相比之道，得元永贞而后可以无咎。”(3)不宁方：方犹邦也。不宁方，不安宁的邦国，即不愿意臣服于殷的邦国。《诗·大雅·韩奕》：“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林义光《诗经通解》：“庭，定也。”《毛公鼎》铭文：“(率怀)不廷方。”(4)后夫：后至之人。《周易口诀义》：“比，是亲比之义，与人亲比，自然获吉，故曰比吉也。与人亲比，必须寻其根源，审其情原，方得元永贞。是贞正之人，与之亲比，乃得无咎；若遇奸邪之人，则不能保其亲比之道。”卦辞意为：争取同盟国对我大有利，调查情况后，知为正派人，再与其结盟，才保无危害；不服殷纣国，定能纷纷来，迟迟不来者，必是我之敌。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1)孚：诚信。《释文》：“孚，信也。”(2)《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3)它：古通“他”，异族。《国语·晋语》：“不出有他矣”韦昭注：“他，异族也。”《程传》：有孚盈缶，言“诚信充实于内，若物之盛满于缶中也。诚信中实，虽他外皆当感而来从。”爻辞意为：为比之首，若无诚信，必有危害；诚信中实，异族自来，我必得吉。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象》传：“比之自内，不自失也。”《集解》引崔憬：“自内而比，不失己亲也。”爻辞意为：国内团结和睦，令人心悦诚服，自然竟来亲比，对我方为大吉。

“六三 比之匪人，凶。”

《释文》：“马云：‘匪，非也。’王肃本作‘匪人凶’。”高亨：“句末有凶字意较备。”“汉帛书《周易》匪作‘非’。”爻辞意为：亲比非人，凶多吉少。

“六四 外比之，贞吉。”

《新书·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爻辞意为：我与外邦亲比，言行一致则吉。

“上六 比之无首，凶。”

《集解》引虞翻：“首，始也。”《象》传：“比之无首，无所终也。”爻辞意为：亲比之道，善始善终，始为不善，终必成凶。

姬昌等不仅在《比》卦卦爻辞中明确了争取同盟国的目的、原则和步骤，还根据“商王纣因诱降一些部落和国家的奴隶而为贵族们所怨恨，倡议了一条公约，规定奴隶逃亡要大搜查，原来是谁的奴隶还要归谁，不准藏匿。这条公约得到贵族的拥护，提高了周在有关部落和国家的威信。”④这从《随》卦爻辞可以看出来：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1) 官：古通“馆”，馆舍。《释文》：“蜀本作馆有。”(2)

《集解》引虞翻：“渝，变也。”(3)《楚辞·湘君》王注：“交，友也。”《象》传：“出门交有功，不失也。”爻辞意为：馆舍被毁坏，臣妾有逃亡，友邻齐相帮，并无大损失。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1) 系：以绳拴之。《说文》：“系，絜束也。”(2) 小子：未成年的男子。(3) 丈夫：已成年的男子。《象》传：“系小子，弗兼与也。”(与犹有也。)爻辞意为：拴住小子，跑了大人。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1) 随：追逐。《尔雅·释诂》：“随，逐也。”(2) 贞：牢固。《象》传：“系丈夫，志舍下也。”爻辞意为：绑住大人，跑了小子，追上捉住，馆舍加固。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1) 孚：借为俘，俘虏。(2)《说文》：“获，猎所得也。”(3) 明：古通“盟”。《诗·小雅·黄鸟》：“此邦之人，不可与明。”郑玄笺：“明当作盟。”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明、

盟古通用。”于省吾、高亨、李镜池均采此说。爻辞意为：追逐虽有获，仍有俘在逃，因有公约在，早晚能捉住。

“九五 孚于嘉，吉。”

(1) 孚：古通俘，擒获。(2) 嘉：应为地名。爻辞意为：俘虏获于嘉地，公约对我大吉。

《随》卦爻辞表明周文王倡议的“有亡，荒阅”(《左传·昭公七年》)公约的执行，扩大和巩固了周与邻邦的同盟关系。据《吕氏春秋·疑似》记载，周文王还把这条公约扩大到军事防御方面：“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为高堡于大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即犹若也），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

周文王及其大臣们还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时机，积极争取西北、西南地区诸部落和小邦，使庸、蜀、羌、髳、微、卢、濮等部落和散国、矢国等都纷纷归顺周，使周的国力和声威大大加强了。这种情况，在《周易》卦爻辞中得到明确的说明，请看：

《坤》卦卦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解》卦卦辞：“利西南。”

(1) 为什么三卦卦辞均“利西南”呢？因为周人西南多友邦，跟周武王伐纣的就有庸、蜀、羌、髳、微、卢、濮八国(《尚书·牧誓》)，多在西南。而东北却有殷和强敌鬼方。近年来，西周矢国史迹和散国青铜器的陆续发现，都说明了周初矢国和散国与西周王室的臣属、友好、同盟的关系。⑥(2) 大人：古代部落首领、酋长。《乾》、《蹇》、《解》卦卦辞意均为：为了争取友盟，前往西南地区，会见部落大人，对我事业大吉。再看《蹇》卦爻辞：

“初六 往蹇，来誉。”

(1) 蹇：音简 jiǎn，行走艰难。《说文》训跛。蹇从足，跛足则难行，故《彖》、《象》、《序卦》诸传并曰：“蹇，难也。”

(2) 《说文》：“誉，称也。”爻辞意为：历险而往，载誉而归。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1) 躬：自身。(2) 《广雅·释诂》：“故，事也。”《集解》引侯果：“险而又险，志在辅弼，匪惜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爻辞意为：王臣往来虽艰险，舍己为国意志坚。

“六三 往蹇，来反。”

《列子·仲尼》“回能仁而不能反”晋张湛注：“反，变也。”爻辞意为：去时历经艰险，回来适得其反。

“六四 往蹇，来连。”

《说文》：“联，连也。”段玉裁注：“周人用联字，汉人用连字，古今字也。”《集解》引荀爽：“来还承五，则与至尊相连，故曰来连也。”爻辞意为：前往虽艰险，结成联盟还。

“九五 大蹇，朋来。”

爻辞意为：经历大艰险，终得众朋来。

“上九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尔雅·释诂》：“硕，大也。”爻辞意为：前往虽险难，却喜见大人，大有收获还。

《蹇》卦爻辞叙述了周文王王臣蹇蹇、往见西南西北部落大人，终得“来连”、“朋来”硕果的情形；而《需》卦爻辞则记载了王臣蹇蹇，前往西南、西北的艰险历程。请看：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1) 需：古通“须”、等待。《彖》传：“需，须也，险在前也。”《庄子·大宗师》向注：“需，待也。凡相待而成曰需。”

(2) 《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周礼·肆师》郑注：“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3)《周易·恒》卦《彖》传：“恒，久也。”爻辞意为：来到郊外，耐心等待，待机而行，才无灾害。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1) 沙：沙滩。《集解》引虞翻：“水中之阳称沙。”(2) 言：责问、盘问。《尔雅·释诂》：“言，间也。间，訾议也。”爻辞意为：来到沙滩，遇其邑人，略加责问，终无阻拦。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1) 泥：河边。《正义》：“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处，逼近于难。”(2) 致：古通“至”，导致、招致。《广雅·释诂》：“致，至也。”《玉篇》：“至，来也。”(3) 寇：应作“戎”，兵也。

《释文》：“郑，王肃本作戎。”《集解》引虞翻：“离为戎。”爻辞意为：来到河边，急于渡川，行动不慎，被兵发现。

“九四 需于血，出自穴。”

(1) 《本义》：“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2) 穴：地穴。根据《诗·大雅·緜》、《公刘》的记载及考古资料可知，殷周之际的房屋建筑技术已有相当水平了，当时贵族居住在前有堂、后有室、中间有过廊，室的左右为房的房屋。但绝大多数平民和奴隶仍住在半地穴的房屋；而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人民则住在窑洞里。爻辞意为：藏入地穴，只身应战，血流于面，乘机退却。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爻辞意为：躲过追赶，又饥又渴，酒食过后，再想对策。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1) 《尔雅·释言》：“速，召也。”《集解》引荀爽：“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2) 《本义》：“敬而待之，则得‘终吉’也。”爻辞意为：待到深夜，重返地穴，出人意外，三人来访，恭敬相待，终获吉祥。

以上卦爻辞所述周文王争取同盟国事，跟下列文献记载相合：

《尚书·牧誓》：“王曰……及庸、蜀、羌、髳、微、卢、彭、

濮人。”《说文》：“羌者，西戎牧羊人也。”《诗·小雅·角弓》郑笺：“鬻，西夷别名。武王伐纣，其等八国从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清黄生《义府》：“按：春秋将卑人少称人，此诸国或君不自至，故称人以别之。”

《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1）夏，中夏，指今山西南部陕西南与河南西部。（2）西土，指今陕西西部岐山等广大地区。言因此始开创我区域于中夏，与我一二友邦以治我西土。

《诗·周颂·酌》：“躋躋大之造（曹，士兵），戴用有司（有司：文武官吏），实维尔公允师。”言武王伐纣，统帅周兵的将帅是周公、召公，周和庸、羌、蜀、羌、鬻、卢、彭、濮的联军统帅是吕尚（姜尚）（高亨《诗经今注》）。

并为下述考古资料、西周甲骨文和周初青铜器铭文所证实。

近年来，武功郑家坡遗址和扶风刘家墓葬的发掘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武功郑家坡先周文化从年代、地望、文化性质，以及它与刘家姜姓族文化的关系都可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说明周族起源于武功境内的漆水下游，姜姓族起源于宝鸡、周原一带。姬姜两姓居地毗邻，文化上很早就互相影响。后稷的母亲就是姜姓的女儿姜嫄（《诗·大雅·生民》）。古公亶父迁岐后，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改变戎狄之俗，与姜姓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关系，他的妻子就是“姜女”（《诗·大雅·緜》），姜姓文化逐渐地融合到周族文化里面去了，形成了西周文化。所以，传说宝鸡县磻溪为姜太公垂钓处，宝鸡市有姜城堡等。^⑥这些情况不仅与《齐太公世家》等篇所记文王渭滨遇姜尚的传说相符，也与西周甲骨文一致。

同时，考古学者、古文字学者依据对斗鸡台矢国墓地的发掘资料、青铜器铭文，特别是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述了矢国重要贵族何曾与成王迁居洛邑的重要史实，对何的父亲公氏曾辅

弼文王，“有勋于天”也作了褒扬。斗鸡台墓出土的《虘方鼎》铭文记载了矢国贵族虘跟随周公参加平定叛乱的东征，胜利后在周庙受赐贝百朋的史实，表明矢国曾是周人同西土方国联系的桥梁。《何尊》和《虘方鼎》从一个侧面表述了周文王争取西部同盟国和经略西土的情况，再现了周初矢国与周王朝的臣服、友好、同盟的关系。

另外，《散国簋》等青铜器铭文和《周本纪》：“太颠、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归之”的记载，也表明散国可能为姜姓。文王向外扩张、武王伐商时，散国也与周人结成同盟，甚得周王信用。⑦

5. 从《离》、《同人》卦爻辞，看周文王对敌对部落和国家发动战争、步步进逼商都朝歌

在隐忍待时、蓄积力量的过程中，周文王一面争取同盟国，一面对一些敌对的部落和国家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并征服了他们。请看《离》卦爻辞：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1) 履：步履。(2) 错然：错杂貌。《尚书·禹贡》孔传：“错，杂也。”(3) 敬：古通警。《说文》：“警，戒也。”《象》传：“履错之敬，以辟（避）咎也。”爻辞意为：步履错杂，敌人偷袭，戒备森严，敌人胆怯。

“六二 黄离，元吉。”

(1) 黄：黄昏，日落而天色尚未黑的时候。(2) 《释文》引郑玄：“离，犹去也。”爻辞意为：日落黄昏，黑夜将临，敌人撤离，太平大吉。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1) 日昃：音仄zè，指太阳偏西。(2) 鼓缶：击缶。缶是盛酒瓦器，又是陕西一带的乐器。《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3) 《词詮》：“则，承接连词，表因果之

关系。‘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易·豫象》）”（4）蜚（音迭 dié），老人。《释文》：“马云：七十曰蜚。”《象》传：“日昃之离，何可久也。”爻辞意为：敌人暂撤离，岂可失警惕，高歌庆太平，却忘击缶戒，老人多见识，忧叹凶祸至。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1）突如：突然。（2）焚如者，禾谷房屋被烧也。（3）死如者，防御之人被敌人杀死也。（4）弃如者，一切物件被敌人抢劫、抛弃也。《象》传：“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爻辞意为：高歌轻防御，突遭敌袭击，室屋被烧毁，亲人被杀死，物件被抛弃，无所容身矣。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1）沱若：泪多貌。《诗·陈风·泽陂》毛传。（2）《国语·吴语》韦昭注：“戚，忧惕也。”《象》传：“六五之吉，离王公也。”《释文》：“离，音丽。郑玄、王肃作丽。”丽王公者，附丽于王公，得王公之庇护、救助也。爻辞意为：悔恨悲泣，泪下如雨，痛定思痛，提高警惕，紧跟王公，再战必吉。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1）《词诠》：“用，介词，因也。《史记·李广传》：‘广，用善射虏多为郎骑常侍。’”（2）有嘉：国名。古代对于国家的名称，多加有字，如“有夏”、“有殷”等。（3）折首：砍头。《魏季子白盘》铭文：“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意为砍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了五十个俘虏。（4）《周易尚氏学》：“匪与分古通。《周礼·地官》：廛人以待国之匪颁。注：匪读为分。获匪其丑者，谓匪颁所获丑虏于有功，以为奴隶也。”《象》传：“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获匪其丑，大有功也。”爻辞意为：征伐有嘉，大获全胜，国王斩首，俘虏分掉。

《离》卦爻辞具体而形象地叙述了周人开始加强戒备、敌人胆怯撤离；中间放松警戒，遭敌突然袭击，惨遭烧杀抢劫，以至

无所容身；最后王用出征，征服有嘉的全过程。且为《诗经》和西周甲骨文所证实。请看：

《诗·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阻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陈子展译为：密须人不肯恭顺，敢于抗拒大邦，侵略阮国到了共。文王赫然的愤怒，于是整齐他的师旅，就是遏制密人往营。以此增厚了周的国运，以此回答了天下向周之心。

西周甲骨上出现的“伐蜀”(H11:68)、“征巢”(H11:110)、“其于伐𤑔”(H11:232)的记事刻辞，就是周文王对一系列国家和部落发动了战争的历史记录。

二十多年的经营，成就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在国力与周文王之前相比，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而且在同殷王朝的关系上，也酝酿着根本的转变。崇侯虎是殷人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他早已看出了周文王“戡商”的企图，“以告纣，纣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殷本纪》）

周文王“脱美里囚”后，积极进行推翻殷王朝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实际准备工作。他首先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北）、芮（今陕西大荔东）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两国作为自己的同盟。继后，他率兵西征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当时，周在岐下，犬戎在他的北方，密须在它的西方。文王用武力征服了这两个小国，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可以放心地向东方前进了。

接着伐耆（亦作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伐于（亦作邶，今河南沁阳西北），都在周的东方，距殷较近。伐耆、伐于，实际上是对殷的正面进攻，构成了对殷都朝歌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当耆和于被周灭掉后，殷统治者大为惊慌，祖伊向纣王报告这个消息时竟然大声惊呼：“天既讫我殷命！”（《尚书·西伯戡黎》言上天已结束我们殷朝的命运啦！）

耆和于毕竟还是地处王畿的郊野之外的小小属国；而伐崇，

则等于把战争推进到殷的心腹地帶了。这个崇国在今河南崇山附近，是殷属下的一个大国，是周人向殷进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诗·大雅·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足见崇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因此，周文王伐崇打的是一场硬仗。对于《诗·大雅·皇矣》曾重点加以讴歌的这一重大事件，《同人》卦爻辞也作了详细的记载：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1) 同人：聚众。(2) 门：王门。《周礼·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郑玄注：“大故，谓王崩及寇兵也。”爻辞意为：聚众于王门，宣战谕军民，发布戒严令，岐邑保安宁。

“六二 同人于宗，吝。”

宗：宗庙。《说文》：“宗，尊祖庙也。”《左传·庄公八年》：“治兵于庙，礼也。”爻辞意为：聚众于宗庙，战前祀祖先，卜告前途吝。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1) 伏：埋伏。《尚书·大禹谟》孔传：“伏，藏匿也。”(2) 戎：军队。《说文》：“戎，兵也。”(3) 莽：丛林。《释文》：“郑云：丛木也。”(4) 高陵：高地。《释名》：“陵，隆也，体隆高也。”(5) 《说文》：“兴，起也。”《象》传：“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朱子语类》：“问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岁不敢出。”爻辞意为：伏兵丛林，升高而望，城高兵众，按兵未动，等待三年，待机而行。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1) 号咷（音逃 táo）：呼号。《释文》：“号咷，啼呼也。”(2) 大师：主力军。爻辞意为：先头部队，遭敌围攻，又哭又叫，主力军到，击溃敌军，彼此会师，破涕为笑。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诗·大雅·皇矣》：“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陈子展译为：临阵冲车（攻城的车）闲闲的移动，崇国的城墙言言的高大。拿问俘虏连连的不忙，所获耳安安然割下。于是祭天叫类，于是祭旗叫禡，于是把财物送还，于是把人民安抚，四方诸侯之国因而莫敢斯侮！由此可知爻辞是班师致祭，欢庆胜利。爻辞意为：凯旋而归，班师致祭，天神保佑，何国敢侮！

以上卦爻辞所言不仅与《皇矣》先曰：“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岸”（高亨曰：以上三句是写上帝劝文王力求发展，不要盘桓不进，不要羡慕别国，应先开拓疆土，占据有利地位。）下文接写文王伐密、灭崇；以及《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壘而降。”（杜预注：“崇，崇侯虎。”）一致。而且为西周甲骨上的“今秋王斯克往密”（H11:136）、“密斯郭（城）”（H11:5）“于密”（H11:31）和“虫伯”（H11:22）等记事刻辞所证实。

周文王在相继灭耆、灭于、灭崇，完成了对殷都朝歌的包围之后，把国都迁到丰（今陕西户县东北），为灭殷作好了最后一项准备工作。但就在这时，文王去世。^⑥周文王由于他的卓越业绩，在周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崇高的地位。他不仅做到了“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且具备了灭殷的力量，也为后来武王伐纣时长驱直入扫清了障碍。^⑦

〔注〕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先秦天道观之发展》，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

② 参见高达云《周人的衣、裳、冠、履》，《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

③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

④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左传·昭公七年》：“周文王之法曰：在亡、荒罔。”

⑤ 卢连成《西周矢国史迹考略及相关问题》，《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⑥ 参见尹盛平《从先周文化看周族的起源》，《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⑦ 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

⑧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提出“文王是否善终，实古代史上一大疑问。”

⑨ 本节多采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说，文中不具注。

(三) 武王伐纣的实情

武王伐纣，对商王朝的覆灭和周王朝的建立有着决定意义，因此，对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不少古籍都有记载。特别是《尚书·牧誓》不仅记录了武王伐纣的誓辞，甚至连开战的具体时间都记载得一清二楚；《逸周书》的《克殷》、《世俘》篇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克商、遣将伐商属国、灭国、俘人、俘玉总数以及归周后之祭祀情况；《荀子·儒效》则保存了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和行军情况的资料。历史学者理应据此对这一重要史实作出详细的、如实的叙述。可是，由于孔孟为了奉周初文、武、周公时期为理想政治的楷模，遵循“为尊者讳”的守则，采用“笔则笔、削则削”的曲笔，按照主观需要裁剪武王伐纣的史实，借以宣扬什么“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圣王仁政”，因而编造了歪曲史实的商、周易代“兵不血刃”的传说，造成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错觉。以至司马迁受这种传说影响写成的《史记·殷本纪·周本纪》的记载成为两千余年来人们所公认的史实。虽然，“伤伪书俗文多不诚实”的王充在《论衡·语增》中大胆指出：“周之取殷，与秦、汉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以后，刘知几、王夫之和梁启超等对这一传说也不断加以批判，提出：“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他们都没有对武王伐纣的史实进行考辨、论述，因而经不住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的封锁、围攻，没能对商、周易代的传说起多大的冲击作用。所以，至今对武王伐纣的史实尚未作出详细的、如实的论述。

值得庆幸的是，在“占筮书”的掩护下，没有遭到严重删改的《周易》卦爻辞，却保存着武王伐纣的史料；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又证实了古籍有关武王伐纣记载的可信性。现根据文字训诂典籍，参考古籍记载、前人论述，求证考古资料，对《周易》的《师》、《震》、《革》和《鼎》卦卦爻辞进行考释，并据此对武王伐纣的真相作些探索，以资参考。

1. 从《师》卦卦爻辞，看武王观兵孟津的目的和作用

关于武王伐纣，自古就有“一戎衣（殷）而有天下”（《礼记·中庸》）和“武始而北出，再而灭商”（《礼记·乐记》）的两种说法。^①在现行的历史著作中，除《中国通史》认为周武王牧野之战一举灭商外；《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中国上古史纲》和《西周史话》等都主张周武王观兵孟津、伐纣预演；牧野之战、商朝灭亡。但对武王观兵孟津的目的和作用或略而不提，或只简述为“通过他对商王朝军事力量的观察，觉得周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把商王朝一举消灭”（《西周史话》）；“深恐一击不中，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威信，所以即命班师。”（《中国上古史纲》）因为古代史籍对此事件的记载史料不多，论述空泛，很难利用、借鉴。

例如，在《史记·周本纪·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虽指出武王观兵孟津的目的是“东伐以观诸侯集否”，以及“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的史实；最后却归结为：“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班固《汉书》、范曄《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均号称良史，但在武王观兵孟津的记载上却都亦步亦趋，没有突破。例如，范曄在明确指出武王“以为纣未可伐，斯时有未至者也”（《刘元传》）的同时，却更肯定地认为：“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郑兴传》）均未指出武王观兵孟津的目的和作用。我们再看《师》卦卦爻辞：

“师贞，丈人吉，无咎。”

(1) 师：军队。《集解》引何晏：“师者，军旅之名，故《周礼》云：‘二千五百人为师也’。”(2) 《象》传：“贞，正也。”(3) 丈人：军队总指挥。《释文》：“丈人，严庄之称。郑玄云：能以法度长于人。”宋张载《横渠易说》：“丈人，刚过，太公近之。”(4) 《释名》：“吉，实也，有善实也。”(5) 《说文》：“咎，过也。”卦辞意为：出师正当，指挥正确，没有失误。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1) 律：纪律。(2) 王引之：“以，语词之‘用’也。”(3) 否臧：否，不也；臧（音脏zàng），善也。《本义》：“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4) 凶：指打败仗。《象》传：“师出以律，失律凶也。”爻辞意为：出师之道，严明纪律，军纪不善，必有凶险。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1) 在师中：意为王在师中。《集解》引《九家易》：“虽当为王，尚在师中，为天所宠，事克功成，故吉无咎。”清于鬯《香草校书》：“在师者，谓王在师也，故《象》云：‘在师中吉，承天宠也。’其不言王在师，以王字出于下句也，此即俞荫甫太史《古书疑义举例》所谓文没于前而见于后例。”(2) 锡：古通赐。《释文》：“郑本作赐。”(3) 命：命令。于鬯曰：“三锡命者，盖赐诸侯命也。”胡朴安：“王之命赐于其他未加入争战之团体，使之来归。故《象》曰：‘怀万邦也’。”爻辞意为：君王率师亲征，吉祥而无灾殃，君王多次号令，招来众邦相从。

“六三 师或舆尸，凶。”

(1) 或：“犹有也。”（《经传释词》）(2) 舆：以车载之也。《广雅·释诂》：“舆，载也。”(3) 尸：木主。《楚辞·天问》王注：“尸，主也。”爻辞意为：出师车载木主，不料招来凶险。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左次：犹言撤退。《程传》：“左次，退舍也。”《尚氏学》：“古

人尚右，左次则退也。”爻辞意为：审时度势，大军撤退，没有过失。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1)《集解》引荀爽：“田，猎也。盖由（犹）殷纣而被武王禽于鹿台之类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猎。”(2)《程传》：“执言，奉辞也，明其罪而讨之。”(3)弟子：次子。《释名》：“弟，第也，相次而生也。”(4)舆尸：众主。朱骏声：“舆，车也。一车七十人，故舆有众多义。尸，主也。”《程传》：“师旅之事，任当专一。必专其事，乃有功；若更使众人主之，凶之道也。”爻辞意为：假言田猎伐君，利于师出有名，数其重大罪行，才能获取同情。长子帅师，任当专一，若众主之，则事必凶。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1)大君：国君。(2)《集解》引干宝：“武王亲征，与师人同处于野也。开国，封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也。”(3)小人：指贵族下层和庶人。《象》传：“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爻辞意为：大君下命令，按功来行赏，功大封诸侯，其次立都邑；庶民赐土地，不令为官吏。

《师》卦卦爻辞所叙不仅与《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敬慎战惧貌），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是时，诸侯不期（约定日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记载一致，交相为证。更为风雏甲骨文“大出河”（H11:9）和帝辛甲骨H11:1所证实。这就为我们探索武王观兵孟津的目的和作用，提供了直接史料。

根据《师》卦卦爻辞和《周本纪》、《齐太公世家》的记载，武王观兵孟津的目的是：既“东伐以观诸侯集否”，也观己之兵力如何和殷王的反应怎样。结果，“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国，说明周在政治上取得了对殷的优势；而“斯时有未至者也”，以及“当是时，比干、箕子、微子尚在”（《越绝书》），又表明人心尚未完全向周，殷纣尚未陷于孤立。同时，观兵实践也暴露出周方的不足之处：

第一，诸侯会孟津者，虽有八百之多，但乃“王三锡命”后，“不期而会”的；且不顾时机成熟与否，皆曰：“纣可伐矣”，说明诸侯只可作为伐纣的同盟军，主力仍需周师，故曰：“师出以律，否臧凶。”

第二，武王“师或舆尸”，原为“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以争取同情；不料却违犯了旧传统，招来“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伯夷列传》）的谴责，陷于被动局面，故曰：“师或舆尸，凶。”

第三，“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周本纪》）“群众咸曰：‘休哉！’”（《尔雅·释诂》：休，美也。）周公曰：‘虽休勿休’”后又得赤乌（乌鸦），“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尔雅·释诂》云：勉也。）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尔雅·释诂》：恐，惧也。河上公《老子章句》：恃，待也。言天之见此，正以为劝勉我君臣，当恐惧以待天命。）使上附（清洪颐煊以为四邻之疏附，周初官名也。）以周公书报诰于王。王动色变。”（《尚书今古文注疏·泰誓》）可见，周公在是否伐纣的问题上跟武王意见不一致，故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凶。”

第四，武王假言田猎，以臣伐君，兵至孟津后，只告之司马、司徒、司空、诸节曰：“齐栗！允哉！予无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赏罚，以定厥功，明于

先祖之遗。”并未历数殷纣之罪行，以至师出无名，故曰：“田有禽，利执言，无咎。”

另外，历史自然地理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确定：殷周之际的黄河由陕县东流，就到了三门峡，出峡后，自孟津向东南经武陟、荥阳进入华北大平原；因此，孟津一带水流湍急、侧蚀严重，灾害频仍，孟津古城一再迁移，早已埋入河底。^② 据此陈昌远认为：“九年，武王曾观兵于孟津，诸侯皆曰可伐，而武王没有出兵。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孟津渡口河身较窄，水流湍急，风大没有渡过，并不是什么‘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③ 所以，司马迁只言“东观兵，至于盟津”（《周本纪》）、“至盟津”（《殷本纪》）。清崔东壁明确指出：“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

可见，武王观兵孟津，其实是一次军事大演习、大检阅，也是一次外交盟会，它给武王牧野之战、一举克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2. 从《震》卦爻辞，看武王伐纣的 进军路线和行军情况

关于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和行军情况，“师毕渡孟津”、顺利进军说（《周本纪》）一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所公认的史实；而师渡汜（音四sì）水、雷雨难行说（《荀子·儒效》）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至今，除《中国上古史纲》和《中国奴隶社会史》主张“他们从汜水边上（成皋）渡过黄河”，但也认为“一气走到商都效外的牧野”外；《中国史稿》和《西周史话》等著作都主张“武王率领的大军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渡过盟津，进抵牧野。”或者对从何处渡过的问题避而不提，只记述为“武王的

军队顺利地渡过黄河，没有遇到抵抗。不久即进据商都朝歌郊外牧野。”（《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史纲要》）其实，根据《震》卦爻辞、古籍记载和历史自然地理情况的研究，师渡汜水、雷雨难行说却更符合历史实际。请看《震》卦爻辞：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1）震：指雷。《诗·小雅·十月之交》毛传：“震，雷也。”

（2）虩虩（音隙xì），恐惧貌。朱骏声：“虩，蝇虎也，始在穴中，跳跃而出，象人心之恐动。”（3）哑哑：笑语之声。《释文》：“马云：笑声。郑云：乐也。”爻辞意为：巨雷初来，恐惧不安，坚持行军，并无灾殃，转惧为喜，笑语开颜，出师吉祥。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1）《程传》：“厉，猛也，危也。彼来既猛，则己处危也。”

（2）亿：大。《释文》引郑玄：“十万曰亿。”（3）贝：辎重。《王注》：“贝，资货粮用之属也。”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车载衣物谓之辎重。”（4）《说文》：“跻，登也。”（5）九陵：《释名》：“大阜曰陵。”（6）逐：追寻。《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疏：“言牛马臣妾有逋逃者，勿逾次追也，以致失律。”爻辞意为：巨雷凶猛，大丧辎重，师处险境，人登九陵，切勿追寻，以防失律；七八日后，失物必得。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1）苏苏：畏惧不安貌。《释文》引郑玄：“苏苏，不安也。”

（2）《释文》引郑玄：“异自内生曰眚。”爻辞意为：巨雷令人畏惧不安，雨中行军却不混乱。

“六四 震遂泥。”

（1）遂：古通坠。《释文》：“荀本遂作坠。”《说文》：“坠，从高陨也。”（2）《集解》引虞翻：“土得雨为泥。”爻辞意为：巨雷凶猛，山石崩塌，人心惶恐，摔倒泥中。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1) 亿：安定。《说文》、《左传》杜注、《周语》韦注并曰：“亿，安也。”《说文解字》段注：“亿之训安，乃亿之本义。”《尔雅·释诂》：“安，定也。”(2) 高亨：“有犹‘于’也。有与于古音是双声，均可训于。”爻辞意为：巨雷往来，其势凶险，人心安定，无损于事。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1)《释文》：“索索，马云：内不安貌。郑玄：犹缩缩，足不正。”(2) 矍矍（音决 jué）：双眉旁顾不安之状。《释文》：“马云：中未得之貌。郑云：目不正。”(3) 邻：似指殷王武乙。《殷本纪》：“帝武乙无道，……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4) 婚媾：亲戚。爻辞意为：暴雷使人惊恐，双足畏缩难行，双目旁顾不安，军心动摇不定，此时亲戚发言：“雷虽震死武乙，不会伤及我们，我军有备无患，奋勇行军无灾。”再看古籍记载：

“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齐太公世家》）

“武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汎，及怀而坏，至共头而山墜（坠）。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撰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荀子·儒效》）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吕氏春秋·贵因》）

“武王伐纣，到于刑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

休。”（《韩诗外传》）

“武王伐纣，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震而死。”（《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六韬》）

“武王伐纣，乘舟济河，兵车出，坏船于河中。太公曰：‘太子为父报仇，令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太平御览》卷四八二引《六韬》）

另外，考古资料和历史自然地理学者根据甲骨文有关猎象、驯象、贡象和象被用于祭祀的卜辞；古籍中有关“商人训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纣有谀臣……教为象廊，象箸而羹”的传说（《史记·龟策列传》）；以及殷墟出土的不少象形雕刻器，特别是1935年秋和1978年先后发现埋有大象、象奴的象坑指出：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温暖气候广泛分布在从东北北部直到长江以南的广大东部地区，内蒙和青藏高原也有同样的证据。这一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在仰韶到西周之间为最温暖的一段，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5^{\circ}\text{C}$ 。与温暖的同时，为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北京平原为一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殷代终年可以降雨，雨量远较今日为丰。所以，黄河下游洪水暴涨暴落的特点相当突出。^④因此，武王率领大军，从一月底到三月初五甲子日，攻入朝歌克商，^⑤正是“仲春之月，始雨水，雷乃发声”，“季春三月，时雨将降，下水上腾”的时期（《礼记·月令》）。

两年半前，武王观兵孟津时，由于孟津渡口河身较窄，水流湍急，风大没有渡过，乃还师归。如今，出师再征，又“天雨，日夜不休”，孟津渡口更难渡过，到底从什么地方渡过黄河？又经过哪些地方到达殷郊牧野？

陈昌远根据历史文献、前人论著和实地考察认为《荀子·儒效》所记：“至汜而汎（《说文》：“汎，浮貌。”）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坠）。……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旦厌）于牧

之野”的行军路线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至汜而汎”：五十多年前，于省吾在《武王伐纣行程考》中考证：“此汜指的是西汜水，因距雒、汭甚近，由西汜水渡河抵怀亦相符合。”⑥《辞海》：“汜水发源于河南荥阳西南方山北，流经古虎牢关东，旧汜水县西注入黄河。”为什么武王要选择从汜渡河呢？因为黄河至汜，河身较宽，水流平稳，沙滩多，水又浅。汉时刘邦北上时也从此渡河。所以汜在古代就成了南北交通的重要渡口了。

“至怀而坏”：《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即古刑丘。”《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到刑丘，更名刑丘曰怀。”《说文解字》段注：“今河南怀庆府武涉县西南十一里有故怀城。”由此可知怀在今河南武涉县西。今武涉县西南濒临黄河，河之南即汜水入河处。因此，从汜水渡河向北至怀是很自然的。至怀以后，北上至宁，宁即今河南修武县。修武之名与武王伐纣有关。郦道元《水经注·清水》：“余案《韩诗外传》言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宁曰修武矣。”至今修武民间还流传着武王伐纣的一些传说。

“至共头而山隧（坠）”：唐杨惊注：“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县之山名，隧谓山石崩摧也。隧读为坠。”《大明一统志》：“共山，在辉县东北八里，俗呼九山。”为什么山名用九？是因为“共工氏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山海经·海外北经》）。因此，共山之名，是得名于共工氏，九山之名与共工氏之臣相柳氏有关。武王伐纣所至之共头山应指此山。从此到百泉，正符合于武王伐纣的路线。

“朝食于戚”：戚应在今河南辉县，离百泉不远的赵固村一带。

“暮宿于百泉”：《辉县县志》：“苏门山在县西北七里许，一名苏山岭，一名百门山，山下即百泉。”从百泉到殷都朝歌相去只有二十多里，当时武王的军队为什么到百泉后不北上直

抵朝歌，而转向东南牧野呢？这主要是因为辉县北面是大山，属于太行山山脉，通过此地确实困难。因此武王的军队不直接由戚直抵朝歌，而转东南由百泉到牧野。

《震》卦爻辞、历史文献、历史自然地理的科学结论和陈昌远的实地考察一致表明：“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因“震苏苏，震行无眚”故虽“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师至孟津，因“天雨，日夜不休”，水流湍急，风大浪高，难以渡过，乃由孟津东进，从水流平稳、滩多水浅之汜水渡河北上。但行军艰难，“武王之乘震而死”、“坏船于河中”；到怀城遇到城坏，到共头遇到山崩，人“坠泥”、师“丧贝”，“跻于九陵”，军心有动摇，武王、吕尚、周公等以“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为由劝说、动员后，“遂摆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3. 从《革·上六》、《鼎》卦爻辞看牧野之战的实情

关于牧野之战的情况，从战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至今尚未一致，现简述于下：

“武王之伐纣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鼓之而纣卒易乡（读曰向。清郝懿行曰：荀所称易乡者，盖谓纣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杀也。）遂乘殷人而诛纣。（郝懿行曰：乘者，覆也。）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儒效》）

“纣将与武王战，纣阵其卒，左肱（翼）右肱，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向纣也。”（《新语·连语》）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必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周本纪》）

“古书上说，当时商军在战场上起义，倒转戈矛于后，战争以武王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史纲要》）

以上材料说明，牧野之战是没有经过什么激烈战斗，“兵不血刃”的。

“察《武成》之编，牧野之战，血流漂杵，赤地千里。”（《论衡·语增》）

“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未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中国历史研究法》）

“后人形容这次大战，说杀死商人之多，‘血流’可以‘漂杵’。”（《中国上古史纲》）

以上材料说明，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不能平静地得天下，从而认为牧野之战“兵不血刃”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观察、分析，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反映了牧野之战的一个侧面，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正可彼此补充，从而全面了解牧野之战的实情。因为，“我们始终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列宁《论国家》）请看《革·上六》爻辞：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1）君子：将帅，似指恶来之徒。《诗·小雅·采薇》郑笺：“君子，谓将帅也。”（2）小人：徒兵、奴隶。（3）革面：临阵脱逃。《集解》引郑玄曰：“革，改也。”《周礼》郑注：“面，向也。”爻辞意为：师帅凶猛如豹，驱赶徒兵陷阵，前徒临阵脱逃。

可见，“小人革面”、“辟易奔北”，事见《周易·革上六》

《荀子·儒效》、《新书·连语》、《淮南子·泰族训》、刘向《烈女传》、《史记·殷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篇》等古籍，非尽出妄造，也合乎情理。因为，“商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是才俘虏不久的夷族奴隶，他们与商王纣‘离心离德’，早就盼着周人快点打过来解放他们。因此两军稍一接触，商纣前边的军队纷纷倒戈，登时就乱了阵脚，溃败下来。”（《西周史话》）

同时，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核实，我国商、周时车战发达，是战争的主要形式。那时作战用的战车（轻车）每辆车上有驾车、持干、戈和拿弓、矢的作战人员三名，俗称“三甲士”。每辆战车的附属步兵（徒兵）西周时是二十二人，其中下士七人，徒兵十五人；此外，还有五徒将重车（大车），负责炊事、樵汲、厮养、固守衣物等，共三十人。所以，《孟子·尽心下》、《吕氏春秋·简选》、《新语·慎微》、《淮南子·本经训》和《史记·周本纪》等篇均记载：“武王之伐纣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虎贲即甲士，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是每车甲士十人。^⑦军队的核心是王家和贵族子弟，即“王族”和“多子族”所组成。基本力量是由“国人”（有产者，组成的甲士、武士）。

《尚书·费誓》中伯禽率师伐徐夷、淮夷的甲士，他们的甲、胄、干楯是自备的，甚至建筑工事的“斧、斨”也是自备的。（《诗·豳风·破斧》）这些甲士使用着甲、胄、干楯、弓、矢、戈、矛等重武器；他们都是乘在战车上作战的武士。因此，在甲士之外，必须有大量徒兵（步兵）来配合作战。徒兵由奴隶、臣妾充当。这种徒兵既有略诱的可能，也有逃亡的可能，假如给他们重武器，是十分危险的，因而这些徒兵所使用的都是轻武器，大概是削尖了的木棒，或在木棒上绑一块石器。他们既是武士，同时又是甲士的杂役。^⑧所以，在战争中“驰骤控弦以决军事之利钝者，车中之甲士耳。步兵之属，每乘七十二人，勇怯无择，备什五以防冲突，护车牛以供刍粟，治井灶以安壁垒而已矣。固农

人服事之劳，非壮士折顶陷胸之选也。”（王夫之《尚书引义·费誓》）故而，在牧野之战中，前徒临阵而叛，“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可见，牧野之战武王胜利的原因决不是如孟子所说的什么“以至仁伐至不仁……诛其君，弑其民，如时雨泽”的说教；而是“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国语·周语》）

然而，正如王充在《论衡·语增》中指出的：“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飞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所素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飞廉、恶来助纣之验也。”故而，牧野之战中，“君子豹变”、“纣走，还于寝庙之上，身斗而死”（《新语·连语》）、“血流漂杵”的说法也是符合史实的。

但是，在同文中，王充却提出了：“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浮杵？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的疑问，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解的困境，成为千年悬案。现在，考古资料和历史自然地理学者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原来，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温暖时期，在仰韶到西周前期为最温暖的一段。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不断遭受寒冷空气的侵袭，自西周中期以后，中原一带的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孝王七年（公元前434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气候寒冷，连长江、汉水都结了冰。这段寒冷的时间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第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④

王充生活在公元27(?)—97年间，正是气候寒冷、干旱、植被破坏、地高壤干的时期；又不了解“杵”为何物，因而无法理解“血流漂杵”的含意。其实，前已说明，牧野之战时，连日雷雨，“杵”即徒兵所用的削尖之木棒；或在木棒上绑一块石器的

轻武器。因为木棒很轻，所以才能“漂”；也因为绝大多数徒兵都用木棒，以至前徒临阵而叛时遍地遗弃着木棒；又连日雷雨，处处积水，所以才有“漂”的机会和条件。

可是，争论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兵不血刃”说者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武王之伐纣，非有深仇宿怨；特为民除暴耳。”（《史记志疑》）既使“血流漂杵”也是“纣众倒戈，自相攻杀”（清焦循《孟子正义》），何关武王之事！为此，必须对牧野之战时武王之所为进行考察。

武王伐纣“非有深仇宿怨，特为民除暴”吗？请看《鼎》卦爻辞：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1）鼎：古代的饪食器，一般华丽的青铜鼎多为盛放已熟的肉食品的。古代以为立国的重器，故称定都为“定鼎”，篡夺为“问鼎”。（2）颠：倒。《释文》：“颠，倒也。”（3）否：音痞pǐ，秽物。《王注》：“否，不善之物也。”（4）《经传释词》：“《易》‘得妾以其子’，言得妾与其子也。”爻辞意为：颠倒鼎足口朝下，清除鼎中之秽渣；又得美妾与其子，鼎妾两得无咎害。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1）实：指鼎中装的美食以及鼎所代表之爵禄。《说文》：“实，富也。”（2）仇：仇敌。《释文》：“郑云：怨耦曰仇。”（3）《说文》：“即，就食也。”高亨：“不我能即”乃“不能即我”之倒装句。爻辞意为：鼎有美食，我自独食，我仇有疾，虽恨难至，重器归我，真乃大吉。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1）《说文》：“鼎，三足两耳。”鼎耳革，鼎耳脱落。

(2)《尔雅·释宫》：“行，道也。”(3)塞：音腮sai，堵塞。
《说文》：“塞，隔也。”(4)雉(音至zhì)，野鸡。雉膏：肥
野鸡肉。《释文》：“郑云：雉膏，食之美者。”(5)方：又。
《诗·小雅·大田》郑笺：“方，又也。”(6)《尚氏学》：“亏
悔，不明也。吴先生曰：悔，晦也。”(7)终吉：“终于度过了
雨天。”(《周易通义》)爻辞意为：鼎耳脱落，道路堵塞，雨又
不停，昏天黑地，美食难咽。雨住天晴，万事大吉。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1)《尔雅·释诂》：“公，君也。”(2)餗(音素sù)，和
米的肉羹。《正义》：“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食也。”
(3)渥：音握wò，汁液濡地之貌。《王注》：“渥，沾濡之貌。”
《象》传：“覆公餗，信如何也。”高亨译为：国事已败，真无
可奈何也。爻辞意为：鼎足折断，鼎身倒翻，君之肉羹，洒地渥
然，国事已败，鼎难保全。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1)黄耳：铜耳。(2)金：古指铜。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金以赎罪，古用铜，赤金也。”(3)铉(音宣去声xuàn)，
举鼎之具，形如木棍，穿入鼎之两耳，二人共举之。金铉，以黄
铜为铉也。《说文》：“铉，举鼎具也。”(4)《集解》引干宝：
“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贞也。”爻辞意为：得此宝
鼎，黄耳金铉，重器在手，任我施令。

《鼎》卦爻辞所叙与《周本纪》所记武王入商都朝歌后，
“命南宫括、史佚展(迁)九鼎保(宝)玉”；而且回到周都后，第
二天就“荐俘殷王鼎”(《逸周书·世俘》)相合。1976年在陕西
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更为此提供了证据。唐兰把铭文意译
为：“武王征伐商国，甲子这天早上，迁移了鼎，战胜了昏(纣)，
继承了商王朝……”并指出：“铭中把‘越鼎’放在‘克昏’之前，
这是很突出的。这固然可以说是夺取王权象征之鼎，比打胜殷纣

更重要。但如果设想檀伯达即是南宫伯达(南宫括),就是他和史佚带领人去迁九鼎的,那他在器铭中首先谈到‘越鼎’,就更容易理解。”而《鼎》卦爻辞,也为解决《利簋》铭文中“越鼎”(迁移了鼎)还是“岁鼎”(岁星当岁)之争,提供了力证。⑨所以,唐兰说:“在《周易》里《鼎》和《革》两卦是一对矛盾,是革故取新。所谓‘汤武革命’,接着就要定鼎,因此,后来就把改朝换代叫做‘鼎革’。当时要夺取九鼎,跟秦、汉以后封建皇帝改朝换代要夺取传国玺是同一心理。”再看《吕氏春秋·首时》:

“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又)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玉)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章炳麟曰:“《御览》四百八十六引《尸子》:‘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羁(拘押)于玉门’。案《吕览·首时篇》云:‘文王不忘羑里之丑,武王不忘玉门之辱’,是其事也。”盖文王被系,武王亦从执辱,故云不忘玉门之辱。⑩

可见,王季历时周在初兴阶段,尚未强盛,故臣属于商,而为文丁所杀。为报父仇,文王伐商,有“戡商”之行,力弱而败;羑里之丑后,“乃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打下“戡商”之基础。武王承受文王之基业,怀杀祖、囚父、辱身之“深仇宿怨”,先观兵孟津,伐纣预演;再牧野之战,克商建周,终报三世之仇,实现“戡商”大业。所以,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的疑问。林庚《天问今译》译为:武王伐纣,为什么那么悒郁不乐?载着木主会战,急的又是什么?陆贾在《新语·慎微》中更明确指出:武王“革车三百辆,甲卒三千,征敌破众,以报大仇。”

武王的“仁义之师”果然是“兵不血刃”,“胜殷遏刘”(《诗·周颂·武》高亨注:周人认为武王伐纣并非争夺权利,而是止住了殷纣的屠戮生灵)吗?请看《周本纪》:

商纣兵败自焚死后，武王还“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死。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同时，太公望命吕他等伐商属国。归周后第二天“辛亥，荐俘殷王鼎。”(《逸周书·世俘》)顾颉刚曾根据《逸周书·世俘》记载统计如下：

第一，杀人：除纣及其二妾外，计杀纣的共恶臣一百余，献祭殷王士一百名。至于所伐的小子、四十夫家君等，数字不详。

第二，征伐：所伐有方来，越戏方、陈、卫、磨、蜀、宣方、厉等，计九十九国。所俘有霍侯、艾侯、佚侯、小臣四十六人等。所服的计五百六十二国。

第三，禽(擒)禦(车)：蜀、磨、宣方三国计八百六十辆，他国不详。

第四，俘馘(音 国 guó，古代战时割取敌人的左耳，用以记功。亦指所割下的左耳。)：馘磨十万零七千七百七十九名。俘人三万零二百三十名。

第五，狩猎：所得栏畜如虎、犀、熊，野生畜如麋、麀，半野生畜如鼈、豕、鹿计一万零三百三十三头。

第六，器物：鼎数目不详。玉十八万块。

第七，祭牲：牛五百四十头，羊、犬、豕二千七百零一头。①

于是武王克商时大量杀戮殷方的人民、掠夺殷国的财富，以及祭祀上帝和祖先时的极度铺张和残酷，都明明的放在我们面前！所以伯夷、叔齐发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的悲叹！屈原也提出“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定周之命以咨嗟？”的疑问。对此，黄文焕曰：“列击纣躬，则罪周之词也。夺其国，又不免其身，既死矣，又忍击之乎！列击，谓非一人，非一击也，是周人尽凌其君也。将谗之曰：‘阴谋尽属太公，钺斩旗悬，或周公所不喜

见’，然与武王发揆度谋图定周者谁乎？既已亲揆之于先，即咨嗟于后，无益也。”②

所以，四十多年前，历史学家吕思勉就明确指出：《史记》虽多取《尚书》、《逸周书》之说，但观其述武王伐纣事，多依孟子之说变乱史实，与《逸周书》相出入而失其真。

第一，《逸周书·克殷》云：“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帝辛大崩。”如此而已矣。《史记》则曰：“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殷。”增入纣师倒兵之说矣。

第二，《逸周书·世俘》云：“武王狩禽”计一万零三百三十三头，世皆疑其诞而不信，然此即《孟子》所谓“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者也。（《滕文公下》）《孟子》言纣之罪曰：“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同上）古多旷地，园囿汙池，岂待坏宫室弃田而为之？齐宣王之囿，方七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讥其为阱于国中（《梁惠王下》）亦故山泽之区，禁御之，使刍豢雉兔者不得往焉耳，未闻其坏宫室弃田而为之也。纣早于周宣王七百余年，安得有此？盖殷都朝歌，台在沙丘，地偏东北，本皆旷废之区，纣乃因以为苑囿耳。虽曰禽，其恶未至如《孟子》所言之甚也。而武王则尤而效之者也，或且变本加厉焉。顾美其“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天下真无复是非矣！

第三，“兼夷狄者”，《孟子》所谓“灭国者五十”（同上）《世俘》所记太公望命御方来等是也。皆云“告以馘俘”，又总计曰：“武王遂征四方。凡馘（音对 duì）国九十有（又）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三。”世或疑其诞。然俘馘本有虚数。馘国九十有九，盖以九为数之究而云然。灭国者五十，则举成数言之。虽不

必实，然其数必不少矣。慙云灭云者，破坏其国，杀戮其君，服则望风归款者也。即谓不然，亦师速而疾略之而已。灭国五十，慙者九十有九，而服者六百五十有二，正不必怪其多矣。不特此也，《史记·殷本纪·周本纪》皆言纣衣宝玉赴火死，纣何所衣以死，则何足记？然而斤斤记者何？《世俘》又曰：“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璫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史记》曰：“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三巫（引注：三丘，地名）”此即《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所谓“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者。周之所求可知矣。而曰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何其诬也？抑粟帛不可载以行，亦非野人所宝，乃从而破散之邪？

第四，更有甚者，纣既自焚矣，武王又射之三发，下车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悬之大白之旗。又适二女之所，二女既缢矣，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之小白之旗。（《克殷》）《世俘》则曰：“武王燎于周，大师负商王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亲加刃于敌国帝君之尸，不归其元而用之于庙，则又暴秦之所不为，更无论齐桓、晋文也。周之为德，亦可见矣。^⑬

4. 从《革》卦爻辞，探索牧野之战一举克商的原因

对于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韩非子·初见秦》）的原因，古往今来，论述甚多，却至今未臻一致。令人高兴的是，《革》卦爻辞却为我们提供了探索这个问题的可靠线索。请看：

“初六 巩用黄牛之革。”

（1）巩：束紧，巩固。《说文》：“巩，以韦束也。”（2）黄牛之革：用黄牛皮制成之绳，牛革所以喻其固也。《说文》：

“革，兽皮治去其毛。”《象》传：“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集解》引干宝：“巩，固也。在革之初，而无应据，未可以动，故曰：巩用黄牛之革。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殷，其义也。”爻辞意为：时机未到，决不妄动。

“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1) 革：革命。《象》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杂卦》传：“革，去故也。”(2) 已日：末日。《玉篇》：“已，毕也，讫也。”《集解》引崔憬：“汤武行善，桀纣行恶，各终其日，然后革之，故曰：已日乃革之。”爻辞意为：我方准备完毕，敌方末日来临，此时出征则吉，可保战争顺利。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1) 凶：凶恶残暴之人，《说文》：“凶，恶也。”(2) 贞：事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卢注：“干事曰贞。”《乾·文言》传：“贞者，事之干也。”(3) 革言：誓师之辞。《程传》：“革言，谓当革之论。就，成也、合也。审察当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则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则必得至当，乃有孚也。已可信而众所信也如此，则可以革矣。”爻辞意为：征伐元凶，其事多危，誓辞三告，数其罪行，师出有名，众信师胜。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1) 胡朴安：“悔亡有孚者，革言三就之后，民众皆服从，悔亡而有孚矣。此爻之有孚，即九三之有孚也。”《集解》虞翻：“革而当，其悔乃亡。”(2) 《集解》引虞翻：“改命者，传以比桀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故改命吉也。”胡朴安：“改命吉者，《尚书·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咸受命于周。’吉者，改命而吉也，故《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言民众皆信其伐殷之志也。”爻辞意为：众信师胜，其悔乃亡，改朝换代，革命大吉。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1) 虎变：凶猛残暴如虎。《礼记·檀弓下》：“夫子曰：（小子识

之，苛政猛于虎也。”(2)黄寿祺：“占，有疑而问；‘未占’犹言不须置疑。”(3)孚：为人所信服。《说文》：“孚，信也。”爻辞意为：君既凶残如虎，众必心愿其亡，乘此良机讨伐，必得民心信服。

现以《革》卦爻辞为纲，结合古籍记载、西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对武王牧野之战一举克商的原因试加论述，以资探讨。

我们知道，武丁统治的四十几年里，征服了从商朝西北直到南方的广大地区，达到了商王朝的极盛时期。武丁以后，祖庚和祖甲先后继位。祖甲以后的几个王，多沉溺在享乐里，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殷益衰”(《周本纪》)。商代最后的两个统治者，一个是帝乙，一个是帝辛。帝乙多次对江淮之间的东夷作战，取得了胜利，也消耗了商王朝的财力和人力，而且俘虏的奴隶也与商王朝“离心离德”，更加深了社会危机，“殷益衰”(《周本纪》)。帝辛就是纣，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制定严法酷刑，大肆压榨奴隶和庶民，修筑了极为华丽的宫殿园囿。他和贵族们群聚狂饮，过着放纵的生活。纣又亲自率兵征东夷，经过将近一年的苦战，取得了胜利，但这次战争消耗过大，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使殷王朝陷入了“殷罔不小大好草(钞，掠也)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尚书·微子》，言殷之庶民群臣无不钞掠盗窃，内外为乱，卿士众长不遵法度。)“凡有罪辜(音姑 gū)，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讎”(言凡有罪人，乃常不能获得，庶民并起，讎怨长上)的变乱局面。

但是，“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音力 lì)，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孟子·公孙丑上》)加之，“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殷本纪》)并曾将“文王拘于羑里，而武王羈(音机 jì，拘留)于玉门。”(《战国策·赵策》)可见，殷纣的国力仍强于周人远甚。所以，文王时没有伐纣；武王没有

胜利把握，也不敢轻举妄动，故而先观兵孟津、伐纣预演。

武王观兵孟津后，“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逸周书·酆谋》，孔注：言商君臣皆罪周，日望以周建功也。）武王、姜尚、周公等根据“周武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的情况，认为“天下诸侯，助周者，皆爱周者也；次之，虽不爱周，亦无恶周之意；则商虽恶周，不能取也。”纣若伐周，“诸侯皆已叛商，虽从之出。”（同上，清朱右曾释文）因而，必须抓紧有利时机，作好伐纣准备，以便条件成熟，立即出师伐纣，为此，他们从以下四方面加紧工作：

1. 在加强战备、巩固后方的同时，加紧训练一支强大精干、纪律严明的主力军；组织一支斗志顽强、勇猛善战的同盟军。

为了克服“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师·六五》）的不足，武王提出：“一、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无声。”（《逸周书·酆谋》，朱右曾注：戚，亲。矢，誓。无声，不譁也，皆欲同力同心。）即：统一王族内部意志；任用贤能之人；同心同力对敌。

为了防备殷军偷袭、遣谍，保障边境安全，武王制定“三虞：一、边不侵内；二、道不毁牧；三、郊不留人。”（同上，朱注：御之于境，不使内侵。不毁牧，不留人，防钞掠及间谍。）

同时，根据商军多于周军远甚的实际，以及“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初六》）的经验，从三方面加紧对周军的训练：首先，加强战前动员工作，使“士卒咸若同一心”（同上，朱注：吾惟安抚我士卒，使之咸顺同，一心以应付而已。）其次，建立各级军事组织，拟定编组作战的阵法，规定各级军事组织首领和士兵的职责，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此，《逸周书·武顺》云：“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开，一卒居后曰敦（孔注：开谓启，敦谓服），左右一卒曰闾，四卒成卫曰伯（皆阵名，伯，卒名）。三伯一长曰佐，三佐一长曰右（九伯卒也），三右一长曰正，三正一长曰卿，一卿一长曰辟（伯卒则右，千卒则正，三千卒则卿，万卒举令之

于君。辟，君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言其德如此，乃堪其任也），佐必敬，伯必勤，卒必力（卒，二十五人之师，故以勇力为之也）。”这，跟武王在《牧誓》所举各级军事首领有“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一致；也跟“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勋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夫子勋哉！”（郑玄曰：一击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敌，六步、七步当止齐，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当止齐，正行列。）所言编队作战的方法一致。更跟观兵孟津时，师尚夫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周本纪》）；牧野之战时，武王曰：“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的严厉军事纪律一致。

为了取得军事上对殷的优势，武王等还把跟殷纣王怀有深仇大恨（据清宋翔凤《考庭录》和吕思勉《先秦史》考证，纣所脯、所囚之九侯、鄂侯、西伯昌皆西方之诸侯也。）并且勇猛善战的西南方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的军队组成联军，由姜尚任统帅。“周武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华阳国志·巴志》）

后来，在歌颂武王取天下的《大武》舞曲的第五章《诗·周颂·酌》中就专门叙述此事：“於铎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高亨注：於，呜，叹息词。铎（音硕 shuò），辉煌。遵，屯聚。遵养，把兵屯集起来加以教养、训练。时晦，时代黑暗，指殷纣王统治末年。此句指王师屯聚不动而养之，由于那个时代是黑暗的。纯，大也。熙，光明。介，疑借为捷，胜也。大捷，指打败殷纣王。

2. 在争取与国、联合反殷力量的同时，针对殷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采取招降纳叛的策略，使殷纣王陷于孤立。

面对武王小心谨慎、惨淡经营、“巩用黄牛之革”（《革·初九》）积极地准备克商的严重局势，殷纣王仍“恃才与众”（《左传·宣

公十五年》），愈淫乱不止，不敬神祇，施行暴政，导致臣怒民怨。这时商王族的大贵族王子比干、箕子和微子等人，预感到大难临头，对殷纣王反复进谏，企图挽救殷王朝的灭亡。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跑了，殷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分裂。武王、周公抓住时机，加紧招降纳叛，请看：

“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周公）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吕氏春秋·诚廉》）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淫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悦）。”（《吕氏春秋·先识览》）

“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周本纪》）

“迁藏就岐何能依？”（《天问》）林庚译为：一变而暗
中亲于岐下，诸侯们何以能相依相存？（《天问论笺》）
再看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

西周凤雏甲骨 H31:2 “唯衣鸡（箕）子来降，其执罪华（厥）史。”

近年出土的《虡盘》铭文，前半歌颂武、成、康、昭、穆五王的功德；后半则记微氏家族的高祖、烈祖、亚祖、文考乙公至史虡五代臣周的史实。说明武王克商以后，“微史刺伯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表明虡的曾祖原系微国史臣，降于武王，以后可能世为史官，故自称史虡。（《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可见，殷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分裂，殷纣王已陷于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绝境，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出现“‘下面’不能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革命形势（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故曰：“已日乃革，征吉，

无咎。”(《革·六二》)

3. 在抓住良机，与反殷诸侯和亲周贵族约期牧野的同时，对商人众庶许愿，争取民心。

据说，周先派间谍到殷察看国情，回来说：坏人执政当权，昏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武王还认为时机未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中国通史》)正是“大人虎变，未占有孚。”(《革·九五》)同时，这一年，周国正遭遇饥荒，贵族和“国人”都愿意出去作战，藉以获得粮食，解决粮荒。于是，武王、吕尚、周公决定抓住良机，约期伐纣。而且，根据“纣虽曰不有天命乎，然于是时，亦当稍严河内之防，乃复出其不意，济孟津而临牧野。”(《先秦史》)

于是，“王赫奋烈，八方咸发，约期于牧。”(《逸周书·武寤》)为了坚定反殷诸侯的伐纣决心，稳定亲周贵族的叛纣信心，武王“徧告诸侯”时重申“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师·上六》)的同时，还郑重宣称：“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同上，朱注：庶赦犹云胁从罔治。定宗者，定其宗主、立武庚也。)牧野之战前，武王还对殷人说：“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孟子·尽心下》)

4. 为了使伐纣行动名正言顺、合乎民心，还“革言三就”，大造革命舆论。

根据观兵孟津总结的“田有禽、利执言”(《师六五》)的教训，为了使伐纣行动名正言顺，合乎民心，武王“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牧誓》)。”(《周本纪》)果然“革言三就”。

观其为殷纣王所开列之罪状主要有三条：一是听信妇人之言；二是不祭祀祖先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之罪人和逃亡之徒，

而不信任亲族。“今予发惟共行天罚。”正是针对殷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严重、争取殷贵族的拥护而提出的。而其所宣布的“弗迓（御）克奔，以役西土”（《牧誓》言勿禁止其能奔来以助西土者。）的命令，则激发了殷军前徒临阵而叛的决心，促成了牧野之战的速胜。同时，“周武王的战前讲话，对于周军早已高涨的士气起了引爆的作用。它使战士更加了解殷纣的罪恶，更加懂得了这次远征作战的目的，掌握了作战的方法（人自为战改为编组作战）和纪律，而使他们同仇敌忾、勇敢地投入战斗。”（《中国奴隶社会史》）

综合上述，可知牧野之战、一举克商的原因，一方面正如顾炎武早已指出的：“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纣之为君，沉湎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斲脰，盖齐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而为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祇之牺牲牲用以容，将食无灾（言殷民盗神祇之牲用而不隐匿之，或养或食皆无罪罚）。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两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日知录》）而纣“恃才与众”对这种情况似乎没有充分估计。

而另一方面，武王在王季历、文王长期准备，不仅使周具备了克殷的力量，并为其伐纣时长驱直入扫除了障碍的条件下；又作了大量精心策划的舆论工作与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难怪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两翼，何以将之？”林庚译为：武王伐纣只争朝夕，诸侯们何以趑趄到齐？兵马如苍鹰群飞，那是谁使之云集？都争着拿起武器，会战中如何安排？齐头并进两翼夹击，是由谁来指挥统帅？对此，黄文焕曰：“其曰何践、孰萃，致不满之微词也。美顺应之师者，皆曰不期而会；然前此称不期矣，甲子之期，誓师俱在，谓非出于期约可乎？将谁欺乎？称尚父之勇者，曰‘时维鹰扬，师旅用张’，一人先之，群苍鸟往之，此独尚父

一人一日之事乎？谓非久有萃聚者可乎？”周拱辰曰：“言何以，似隐语‘以至仁伐至不仁’，何用许多阴谋权诡，为后世疑乎？”^⑫

〔注〕

① 详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

②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

③ 陈昌远《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详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历史自然地理》，王宇信、杨宝成《殷人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

⑤ 刘启益《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13辑。

⑥ 于省吾《武王伐纣行程考》，《禹贡》七卷1、2、3合期。

⑦ 参见杨英杰《先秦战车制度考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⑧ 参见李亚农《西周与东周》。

⑨ 参见马承源《中国青铜器》。

⑩ 参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文王是否善终，实古代史上一大疑问”说。

⑪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

⑫ 黄文焕《楚辞听直》，转引自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

⑬ 详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先秦史》。

(四) 武王克商后统治殷人的策略

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后，周王朝统治殷人的策略如何，对于西周社会性质的确定和周武王的评价有着决定意义。对此，有关的历史文献还是不少的，《尚书序》记录的有《武成》、《分器》、《旅獒》、《旅巢命》等篇，但都已亡佚。《逸周书》中有《克殷》、《世俘》、《大匡》、《文政》、《大聚》、《商誓》、《度邑》等篇，但除《克殷》和《度邑》被《史记·周本纪》采用外，其余各篇都因如《世俘》叙武王残暴、《大聚》叙武王与周公谋划治殷，与孔孟标榜“圣王仁政”之旨不合，长期被贬低、封锁，以至于先秦古籍除《吕氏春秋》对此问题叙述较多外，都言之简略。自章学诚、朱右曾、梁启超等重新评价《逸周书》，认为“其中典言宝训，诚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耳。”（《文史通义·书教上》）“与《尚书》有同等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后，吕思勉、顾颉刚、唐兰等均据《逸周书》治西周史，对此问题加以探索。现行历史著作，虽然也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进行研究，但因史料不足，除《中国史稿》、《西周史话》和《中国奴隶社会史》对此略有叙述外，都未能把武王克商后周王朝统治殷人的策略，跟周公东征后周王朝统治殷人的政策加以区分并具体论述，脱离了历史实际。

现将《周易》中有关此问题的《泰》、《否》和《井》卦爻辞加以考释，并结合古籍记载、前人论述和考古资料，对此问题作些探索，以资探讨。

1. 从《否》、《泰》卦爻辞，看武王克商后的 形势及其统治殷贵族的策略

我们先看《否》卦爻辞：

“初六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1) 茅：茅草。(2) 茹：根相牵引之状。《释文》：“茹，牵引也。”(3) 汇：同类。《集解》引虞翻：“汇，类也。”(4)《经传释词》：“以，语词之‘用’也。《书·尧典》曰：‘以亲九族’是也。”《王注》：“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爻辞意为：拔除茅草，根系相牵，用其同类（以殷治殷），办事通顺。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1) 包：包容。《集解》引虞翻：“在中称包。”(2) 承：顺承。《说文》：“承，奉也。”(3) 小人：指庶民和奴隶。大人：贵族。《尚书·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4)《集解》引虞翻：“否，不也。”爻辞意为：对我包容，小人顺承，大人不通。

“六三 包羞。”

羞：古通“丑”，以为耻也。《广雅》：“羞，辱也。”爻辞意为：对我包容，引以为耻，拒不从命。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1) 有命：天命。《诗·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高亨注：“有命既集，指天命已经落在文王身上。”(2) 畴(音仇 chóu)，古通俦，众类。《荀子·劝学》杨注：“畴与俦同类也。”(3) 离：古通“丽”，附依。《集解》引《九家易》：“离，附也。”(4)《说文》：“祉，福也。”《象》传：“有命无咎，志行也。”爻辞意为：天命在周，王朝无咎，附依于我，尔众得福。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1)《释文》：“休，息也。”(2) 否(音痞 pǐ)，遭逢祸患。《释文》：“否，闭也，塞也。”《尚书·君奭》：“监于殷丧大否。”(3)

王引之：“其犹‘将’也。《易·否九五》：‘其亡其亡’。”（4）《周易集注》：丛生曰苞，丛者聚也。柔条细弱，群聚而成丛者也。桑止可取叶养蚕，不成其木，已非樟楠松柏之大矣；又况丛聚而生，则至小而至柔者也。以国家之大，不系于磐石之坚固，而系于苞桑之柔小，危之甚也。即危如累卵之意。此二句有音韵，或古语也。”《尚氏学》：“其亡其亡者，言时时虞亡，如系于苞桑之不足恃也。”爻辞意为：休止祸患局面，大人才获吉祥，（心中时时自警）：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国家安危，如系柔桑。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1）《集解》引《九家易》：“倾，覆也。”《易经集注》：“上文言休息其否，则其否犹未尽也。倾者，倒也，与《鼎》之颠趾同，言颠倒也，本在下而今反上也。”（2）《集解》侯果：“倾，犹否，故‘先否’也；倾毕则通，故‘后喜’也。”《象》传：“否终则倾，何可长也！”爻辞意为：倾覆祸患，终必实现，当今之务，先除祸患，祸患倾覆，国泰民欢。再看《泰》卦爻辞：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1）陂（音皮pī），坡，倾，水旁或山旁倾陡之处。（2）复：返。《集解》引虞翻：“陂，倾。天成地平，谓危者使平、易者使倾。”（3）艰：古通“垦”。《说文》：“艰，土难治也。”段注：“引申之，凡难理皆曰艰。按：许书无垦字，疑古艰即今垦字。”徐灏曰：“段谓艰即垦字，其说甚精。《书·益稷》：‘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鲜食谓鸟兽鱼鳖，艰食谓垦耕而食也。古音艰读苦根，声变为垦。”（转引自《同音字典》）（4）《说文》：“恤，忧也。”（5）孚：取信于人。《说文》：“孚，信也。”（6）“福，富也。”（《释名·释言语》）爻辞意为：平地成斜坡，去者必回复，自危者平安，自傲者倾覆，垦耕则无咎，粮食足且福，民信国无忧。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1) 翩翩：古通编，巧言欺人也。《释文》：“翩翩作篇篇。”《说文》：“编，巧言也。”(2) 富：古通服。(于省吾说)(3) 戒：谨慎。《仪礼·士昏礼》郑注。爻辞意为：巧言骗人，丧失信用，邻人不服，形势严重。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1) 帝乙：殷帝名乙，纣之父。《集解》引虞翻：“帝乙，纣父。”(2) 《集解》引《九家易》：“妇人谓嫁曰归。”(3) 《王注》：“妹，少女之称也。”(4) 《词詮》：“以，介词，与也。”爻辞意为：帝乙嫁女，西伯姬昌，与周以福，乃大吉祥。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1) 复：古通覆，崩倒。(2) 隍(音皇huáng)，无水的护城壕。《说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3) 胡朴安：“勿用师者，师，众也，众不为其所用也。”(4) 《说文》：“邑，国也。”王筠注：“案邑之名，古大而今小。《书》曰：‘率割夏邑’是桀都也。《殷武》：‘商邑翼翼’，毛传：‘京师也。’《多士》曰：‘今朕作大邑于洛邑。’是周初犹沿夏、商之名也。”《象》传：“城复于隍，其命乱也。”爻辞意为：城倒于隍，前徒叛变，武王克商，乘殷命乱，自邑告命，事情难办。

(1) 武王克商后的严峻形势

从《否·九五》爻辞可知武王克商后面临着“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严峻形势，所以古籍记载：克商后“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尚书大传》)；“乃恐惧流涕”(《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本纪》引《逸周书·度邑》)，《正义》：“武王伐纣，还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何以如此？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以及《否·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原来，商纣时殷人甚众，国力强于周人远甚，故周人屡称殷为“大国”，自称

为“小邦”。因而，直到牧野之战前，武王犹战战兢兢，在“徧告诸侯，约期牧野”的同时，向殷人宣告：“王不食言，庶赦定宗（《逸周书·武寤》朱注：庶赦，犹言胁从罔治。定宗，定其宗主，立武庚也。）牧野之战时，还再次向殷人重申：“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郑玄注：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也。”（《孟子·尽心下》引）

可是，武王克商后，“则威刘商王纣，执其共恶臣百人”；并在归镐京的祭祀中“荐殷士百人”，“武王乃废于共恶臣百人”，“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馘人，燎于周庙。”（《世俘》）这些残暴行径，既违背了“庶赦”的誓言，又触犯了古老的历史传统，因为，在此之前，无弑君之事，桀虽虐，汤放之而已。“当时八百诸侯，虽并有除残之志，然一闻其君之见杀，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云骇，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日知录》）于是，伯夷、叔齐发出了“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的怨歌。“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左传·桓公二年》）武王的辅弼重臣、同母弟周公也对“列击纣躬，叔旦不嘉”而不得不“亲揆发定周命以咨嗟”。（《天问》）

何况，“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主要由于殷王朝内部崩溃，殷纣王众叛亲离，才使“小邦周”猝然间夺取了“大国殷”的政权。对此，殷贵族事后十分懊恼，对武王怀恨在心；武王的残暴行径，更促成了殷贵族反抗的决心和行动。虽然武王亲自召集，对其利诱、威胁，“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周本纪》引《逸周书·度邑》）言统率殷族的三百六十个族长仍不归服）而周王朝又没有充足的力量把他们消灭。

而且，武王以少数军队夺取了殷政权，“此时周之兵力，实未踰殷之旧境”（《先秦史》），不能迁都朝歌、就近统治殷贵族和

广大东部地区。因为，在征服者的力量相对弱小，而被征服者的力量还相对强大的情况下，那里仍是反周意识最强烈的殷贵族的中心；而且远离国都丰、镐。故而武王只能仍以镐京为基地，先站稳脚根，再从长计议，“倾否，先否后喜。”（《否·上九》）所以，武王进攻朝歌后四十五天，就还至镐京。（《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日夜劳来定我西土”。（《周本纪》）故曰：“休否，大人吉。”（《否·九五》）

不仅如此，武王克商后，还面临着复杂、严重的民族矛盾。因为，古代的黄淮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终有周一代，始终是一个华夷杂处的局面，“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

（《史记·陈杞世家》）当时除了殷族外，还有一部分旧部族，即所谓“先王之后”以及许多蛮夷戎狄部族。武王克商之后，为了争取居住在新征服地区的古老部族，第一项举措就是封被征服的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与之相安。而对大部分商属国，则继续殷紂的政策，命太公望、吕他、侯来等率兵征伐之。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所伐有方来、越戏方、陈、卫、磨、蜀、宣方、厉等九十九国；有俘霍侯、艾侯、佚侯、小臣等四十六人；从蜀、磨、宣方即获车八百六十辆；斩首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个；抓获俘虏三十一万零二百三十人。“世或疑其诞。然俘馘本有虚数，愍国九十有九，盖以九为究而然。灭国者五十，则举成数言之。虽不必实，然其数必不少。”^① 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周初甲骨文，也有“伐蜀”（H11:48）和“征巢”（H11:100）的记事刻辞。这些征伐暴行自然激起许多部族，特别是奄、徐、淮夷的仇视和反抗。

所以，《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记载：“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卢注：言少间之不忍，则为终身羞，以君子于杀之中，礼怨存焉。）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

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卢注：溺于民庶，大人之祸，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为鉴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王注：胡，何也。残，坏也。祸，谓祸灾。然，烧也。）

（2）对殷贵族采取怀柔利用、分化瓦解、以殷治殷的策略

武王克商后，面对着周人既没有充足的力量把殷贵族和其他部族的贵族完全消灭，又必须有效地防止他们反叛的严峻形势；如何以偏居西土的镐京为中心，去镇抚仍有潜在反抗力量的殷贵族及其与国，则更使周初统治者深为忧虑。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和《说苑·贵德》记载，武王召集亲信大臣研究对策时，师尚父主张把敌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召公认为应当加以区别，“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周公提出了分化利用，既要进行武力监视，又要施以笼络的办法，武王最后决定采取周公的策略：一方面维持周贵族的现状，“使各居其居，田其田”，与之相安；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殷人内部原来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的手段，以殷治殷，把商人与周族的民族矛盾转化为殷人内部的斗争。^②

因此，武王封殷纣王子禄父于商都，利用他统治殷遗民，而由武王之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加以监督，称为“三监”。显然这是一种权宜的但也是急需的办法。因为，周的胜利是小国对于大国的胜利，这固然已经不易；而以小国统治大国，就更加不易。紧接着军事上的胜利之后，武王用封纣子禄父的办法迅速地在被占领的殷畿内地建立政权，这并非出于仁慈，实在是因为周之兵力尚未越殷之旧境，管（今河南郑州市）为东方军事重镇，周初兵力所极。要在当时就对殷遗民实行全面的直接统治，是周人力量所办不到的。同时，“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殷本纪》）以争取殷贵族与周王朝合作。这种“拔茅茹，以其汇”（《否·初六》）的怀柔利用、以殷治殷的策略，正是武王、周

公的明智之处。

然而，不仅殷纣的死党飞廉逃于海隅之奄，伺机反攻（《孟子·滕文公下》；《丰镐考信录》）；伯夷、叔齐有“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怨歌（《伯夷、叔齐列传》）；而且“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周本纪》）；甚至，“武王入于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吕氏春秋·贵因》）可见殷贵族以受周王朝的包容为耻辱，故曰：“大人否亨”（《否·六二》）殷贵族力量的照旧存在，而且不理睬周王朝的招安，对周王朝的统治实在是致命的威胁，武王对此采取哪些对策？请看：

“有命无咎，畴离祉。”（《否·九四》）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六五》）

据此可知，武王、周公利用殷贵族崇拜天神、相信天命、迷信龟卜的传统，大肆宣扬文、武如何得天佑而获得统治；如果殷贵族敢于反抗，周王朝就“恭行天罚”；如果与周王朝合作，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统治人民。所以，武王克商后，“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尹佚笑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于是武王又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因拜稽首，乃出。”（《周本纪》）

武王定都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时，还“考卜维宅，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诗·大雅·文王有声》）武王克商后回周都大会东南北三方诸侯时所作《朕簠》铭文又宣称：“文王有□□德行，显赫的王是察看了，开展的王是有了功劳，能够终止了殷王朝的命运。”（《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后来，在“武王命商王之诸侯绥定厥邦，申义告之”的《商誓》中再次宣称：“今在商纣昏扰于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弃天之命。上

帝不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发弗敢忘天命。……予惟甲子致天之罚□帝之来，革紂之□，予亦无敢违天命。’

可是，随着商亡周兴，天命思想在殷遗民中也有所动摇；为此，武王、周公在宣扬天命的同时，又抓住殷遗民崇拜祖先、留恋商王朝鼎盛时期，眷顾他们“古先哲王”的心理，尽力宣扬王季历、文王与殷代诸王有过亲密关系，是与殷代先哲王同样“有德之人”，并且以效法殷先哲王自居。所以，武王克商后，“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悦）、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

（《吕氏春秋·慎大览》）《殷本纪》也记载武王克商后，“令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这说明周初统治者把盘庚视为殷先哲王，成为周人极力宣扬的人物；并把周王朝对殷人的举措说成是符合殷先哲王的精神，从盘庚那里去找根据。他们还极力宣扬：“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以及“帝乙归妹”于文王的史实，促使殷人时常回忆商王朝文丁、帝乙时期殷周两国间的亲密关系，以争取商族人心，鼓舞周族信心。

武王、周公为了消除周族对殷族的抵触情绪，从而积极执行周王朝对殷贵族怀柔利用、分化瓦解、以殷治殷的策略，还向周人说明只有包容殷人，以殷治殷，才能渡过难关的道理；并以牧野之战、前徒叛变，以及伐纣前后殷贵族微子、中行、胶鬲等等跟周合作，怎样促成了克商胜利之事实加以证实，以坚定周人执行对殷贵族策略的信心和决心。

因此，武王克商后，为了分化瓦解殷贵族，在“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的同时，“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宋微子世家》）《饬盘》铭文也记载了武王克商后，降于周王朝的微史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命令周公亲自安排居住地方，让他住在岐周。凤雏甲骨还有“唯

衣鸡(箕)子来降，其执众厥史”(H11:2)的记事刻辞。

武王、周公还以“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泰·六四》)为训，依文王隐忍待时，蓄积力量的方针，一面坚持“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周本纪》引《逸周书·度邑》，《索隐》：言今悉求取夫恶人不知天命不顺周家者，咸贬责之，与纣同罪。)另一方面，却“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周本纪》)为了表示“息偃戎师”的决心，在罢兵而归途中，还把宁更名为修武，把元和改为偃师(《韩诗外传》、《太平寰宇记》)回周都大会东南北三方诸侯时，还对把武器退藏于库有功的“朕”大加赞扬、赏赐；朕特铸《朕簋》“称扬王的休美写在这尊簋上。”甚至，“武王不闭外门，以示无惧；去剑搢笏，以示无仇。”(《御览》六百九十二引《周书》)

对于被历代儒者大肆歌颂的武王这种“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的作法(《吕氏春秋·原乱》)，王夫之在《尚书引义·武成》中，一语破的地指出：“放牛归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东征之役起，则亦不足以立信于天下矣。东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侧，迨其后又徐图之耶？则操‘朝四暮三’之术以笼愚贱，是术也，固以道贞治，为守天下可久之规者所不屑也。”

2. 从《井》卦爻辞，看武王不杀

俘虏、安定民生的措施

在殷大周小、殷人兵力强于周人远甚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殷纣军中的平民和奴隶，武王在《牧誓》中提出了“不御克奔，以役西土”的命令(《史记集解》引郑玄：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促成了牧野之战、前徒叛变，殷纣速亡。而

且，周人原本以农业立国，胜殷进入中原后，那些贵族成了周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数庶人也由于战功和其他原因变成了不事农耕的“国人”；故而劳动人手必然短缺，必须从殷人中补充大量劳动力。所以，武王克商后，一方面“命南宫括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萌隶”，以争取商族下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在力所能及的地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以安定民生。另一方面，采取了与殷王朝有别的重要措施，即把大量俘虏包容下来，令其服兵役或劳动；而不像殷王朝那样大规模地以俘虏作人牲和人殉。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王朝虽有几十万俘虏，在朝歌和镐京的祭祀中，除献殷王士百人以外，其用牛五百零四头，犬、羊、豕二千二百七十一头，却没有人性。再看《井》卦爻辞：

“初九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1)《王注》：“沈滞滓秽，故曰井泥不食。”(2)《集解》引崔憬：“禽，古擒字，禽犹获也。……所用之井不汲，以其多涂；久废之井不获，以其时舍，故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爻辞意为：旧井之水，浊似泥浆，井水不清，人心慌慌。

“九二 井谷射鲋，瓮敝漏。”

(1)井谷：水井崩塌，积水成谷。《集解》引崔憬：“井之为道，上汲者也，今则若谷水下注，惟及于鲋。”(2)鲋：音付fù，青蛙。《释文》：“《子夏传》谓蝦蟆。”《周易尚氏学》：“蝦蟆居水际，故曰井谷射鲋。”(3)《周易程氏传》：“瓮敝漏，如瓮之破漏也。”爻辞意为：水井崩塌，积水成谷，人不能用，养了青蛙，井如破桶，水往外漏。

“九三 水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1)渫(音屑xiè)，闻一多据《汉书·王褒传》张晏注：“污也。”(2)《说文》：“恻，痛也。”(3)可用汲，李镜池意为用汲

水去泥的掏水法，恢复水的清洁。(4)明：英明。(5)并：同，齐。爻辞意为：井水污浊，人不能用，令人掏净，民可汲饮。君主英明，邑人同福。

“六四 井甃，无咎。”

甃：(音宙 zhòu)，用石垒井壁。《正义》：“《子夏传》：‘甃，亦治也’，以砖垒井、修井之坏，谓之为甃。”清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喻殷弃其旧井，而周修之也。”爻辞意为：井壁用石垒成，水已由浊变清。

“九五 井冽，寒泉，食。”

(1)冽：音列 liè，《说文》：“水清也。”(2)寒泉：井水是从地下寒泉水冒出来的。爻辞意为：井水清，泉水寒，可食用。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1)收：成也。《正义》：“凡谓可收成者，则谓之收，如五谷之有收也。”(2)幕：《集解》引虞翻：“盖也。”《王注》：“水已出井，井功大成，故曰‘井收’也。幕，犹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则物归之，往勿穷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爻辞意为：井已修成，不用覆盖，民心大快，大为吉祥。再看《逸周书·大聚》：

“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呜呼！殷政总总若风草，有所积，有所虚，和此如何？’（孔晁注：总总，乱也。有积有虚言不平也。朱右曾曰：地邑民居参相得曰和。）周公曰：‘闻之文考，来远宾，廉近者。道别其阴阳之别，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诱之于四郊，王亲在之’。

（赵曰：欲来远宾，在廉察近者之利病，使之各得其所。朱注：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农事阳燠则旱，阴寒则晚。水土之便，因之以制城廓沟洫。聚亦邑也。

孔注：四郊，自近始也。朱注：在，察也。）”

可见，武王克商后，对殷人采取“来远宾，廉近者”的方针，在兵力所及的“三监”所辖地区，合并或改变邑的居住组织；根据各个地区的“阴阳之别，土地之宜，水土之便”及居民多寡，把邑重作安排。从统属说，是变了；但从贵族、平民的耕地和聚居的奴隶来说，仍是“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没有改变，不会引起贵族和平民、奴隶的反感。同时，为了争取殷平民和奴隶的信任和支持，缓和民族间矛盾，周公还根据“水性归下，人民归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设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德。”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施行了一些“德治”：如规定“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振乏救穷，民有欲畜发令”（孔注：命之畜牧。）；允许殷人“合族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耦耕耨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孔注：言相通也。）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称贤使能，关市平财，分地薄敛。”从而逐渐取得殷人和奴隶的信任和支持，接受了周王朝的统治。所以《否·六二》曰：“包承，小人吉。”《井·上六》曰：“有孚元吉。”

3. “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

据《逸周书·大匡·文政》记载，在对殷人实行上述措施的同时，武王谆谆告诫管、蔡等诸侯要“宽俭恭敬，夙夜有严”地慎行“九典：一、祗道以明之；二、称贤以赏之；三、典师以教之；四、四戚以劳之；五、位长以遵之；六、群长以老之；七、群丑以移之；八、什长以行之；九、戒卒以将之”。加之，“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这样，经过一二年的努力，周王朝政局才初步稳定下来。所以《泰·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诗·周颂·桓》曰：“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懈。桓桓武！保有厥

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陈子展译为：安了万邦，屡有丰年，天命没有懈怠。桓桓威武的武王！要保有他的事业，于是用武力于四方；能够奠定他的国家。1976年出土的《虡盘》铭文也记载：“强有力的武王，就征伐四方，达到了殷朝的农民，是永久的。大大巩固远祖，奋起击伐夷童（指纣）。 ”

但是，对于如何以偏居西土的镐京为中心，去镇抚仍有潜在反抗力量的殷贵族和奄、徐、淮夷等国贵族，从根本上消除隐患、巩固统治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为此，武王日夜劳形焦思，疾病日益加重。于是，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周贵族内部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武王对此问题很快察觉，并采取了防范措施。首先，他告诫管叔、蔡叔等贵族必须“思勇丑忌，思意丑变，思信丑奸，思让丑残”；严禁“外与内通、大禁不令”。（《逸周书·文政》朱右曾注：不令，不宣令也。外与内通，谓外臣交接近侍。）其次，适应当时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需要，武王病危时提出“兄弟相后”，即兄终弟及，传位其弟周公旦。（《逸周书·度邑》）^③不料，武王很快就一病不起了。周王朝的周公、召公、太公等大臣，深知周王朝统治地位并不巩固，而且当时成王年轻，缺乏统治经验；武王如果死去，他很难应付复杂、严峻的政治局面，所以人人心急如焚。据说，周公为武王病向祖先祈祷，“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廖。”（《周本纪》）可是，没过多少日子，武王还是死去了。正如贾谊所说：“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新书·礼容语下》）

注]

①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

② 参见王宇信《西周史话》；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

③ 参见刘起忼《由周初诸〈诰〉的作者论“周公称王”的问题》，《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

（五）周公东征的因果

“周的王业是在周公东征和营建东都以后才巩固起来的。”（《中国通史纲要》）如实了解周公东征的原因、进程及其结果，是正确认识殷周之际变革的实质和周公历史作用的前提。但受战国以来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歪曲史实、封锁史料之影响，至今尚未得出比较一致的论述。现根据《周易》有关卦爻辞、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此问题作些论述，以资探讨。

1. 从《蛊》、《无妄》卦爻辞，看周公东征的原因

周公东征“到底是因武庚看到周内部矛盾不和，串通管、蔡和徐、奄等国进行复国战争呢？还是管、蔡串通武庚和徐、奄等国，利用殷周之间的矛盾进行反叛活动呢？”^①对此，《尚书·大诰》曰：

“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周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

周秉钧《尚书易解》：（1）腆：王肃曰：主也。黄式三曰：小腆谓武庚。（2）纪其叙：谓理其余，组织其残余也。（3）天降威者，谓武王丧也。（4）知我周有疵，民不康者，谓成王年幼而周公见疑也。（5）曰予复者，殷小腆扬言恢复殷国也。（6）鄙：鄙视。（7）今蠢今翼，谓今发动今驱驰矣，形容形势十分危急。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逋，亡。播，散也。殷亡散臣，谓禄父。言予得吉卜，我谋与庶邦往伐之也。

“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

(1) 若昔，如前也。(2) 其，将。(3) 逝，往也。如前一样
我将往矣。《史记·鲁世家》：“武王东伐，至盟津，周公辅
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破殷。”故曰如前也。
(4) 艰日思，艰日之思也，即艰难时日之想法，下文所言是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

‘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数宁王大命？”

按此即艰日之思也。(1) 考，父也。(2) 底，定也。(3)
堂，基也。(4) 矧，况也。(5) 构，盖也。不肯为基，况肯盖
屋乎？言不肯也。(6) 菑，才耕田。(7) 播，布种。(8) 获，收
割。不肯布种，况肯收获乎？言亦不肯也。(9) 翼，当读为意，
犹或也。其父或将肯曰：予有后人，不弃基业乎？言必不肯也。

(10) 肆，故。(11) 越卬，予我也。(12) 数，终也。(13) 宁
王，当作文王。言故我何敢不于我身完成文王之命乎？杨树达
《尚书说》曰：“此言不欲为不克构不克获之子，故不能不终文
王之大命，云汝等当畏天明（命）。”再看《蛊》卦爻辞：

“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1) 《广雅·释诂》：“干，正也。”《集解》虞翻注同，
犹言“匡正”。(2) 蛊音古gǔ，蛊害、蛊惑，指弊乱。《正义》
引褚氏曰：“蛊者，惑也，物既惑乱，终致损坏，当须有事也，
有为治理也。”(3) 《广韵》：“考，成也。”用如动词，犹
言“成就”。《周易尚氏学》又引《逸周书》及《左传》孔疏，
证“考”训“成”，并指出，初六“能正父蛊，故曰‘有子考’，
“即谓有子能成就先业也。”(4) 《说文》：“咎，灾也。”爻辞
意为：“匡正父辈的弊乱，儿子能够成就先业，必无咎害，即使
危险但最终必获吉祥。”（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爻辞意为：“匡正父辈的弊乱，虽有悔恨，但没有重大咎

害。”(同上)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爻辞意为：“宽裕不急地缓治父辈的弊乱，这样往前发展，必然出现憾惜。”(同上)再看《无妄·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凶)；则利有攸往。”

(1) 菑(音资 zī) 畲(音于 yú)，开荒地，治熟田。《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2) 《尔雅·释言》：“攸，所也。”(3) 《广雅·释诂》：“往，劳也。”《礼记·坊记》：“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易》曰：‘不耕获，不菑畲，凶。’”郑玄注：“言必先种乃得获，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无事而取利者乎！”《礼记》引《易》有“凶”字，今《易》无“凶”字，应据补。爻辞意为：不耕种就想收获，不开荒就想种熟田，岂能不劳而得，唯有继承先祖事业，才能有所收获。

以上爻辞与《尚书·大诰》，不仅记事一致，而且比喻相同，所以，宋杨万里曰：“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者，其曰不耕不菑，则耕且菑，前人之所已为也。昔者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迹王室。既历三纪，世变风移，而康王作《毕命》之书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

(《诚斋易传》)又《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

不仅如此，1931年出土于河南浚县的《沫司徒遯簋》铭文：“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唐兰意译为：王来征伐商邑，命康侯在卫地防守边境。《小臣单觶(zhì)》铭文：“王后反，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唐兰意译为：王后到了，打败了商邑，在成师，周公赏赐给小臣单，十卦贝。1972年汉墓出土简书《孙臆兵法》：“帝奄反，故周公践之。”(《孙臆兵法·见威王》)均跟上引历史文献所记不谋而合，相互为

证。可见，“殷人休养生息后，意图复辟，乘周邦内乱而联合周之叛人以反周。”^②

可是，战国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从论证“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宗法道德原则出发，提出：“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叛。……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孟子·公孙丑下》）后来，《史记·管蔡世家》又记载为“管叔、蔡叔疑周公为之不利于武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周本纪》）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者的鼓吹下，这种说法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以至对于中国历史有丰富论断和独立见解的王夫之竟提出：“禄父之封，必然之事也；东征之举，不必然之事也。”（《尚书引义·微子》）

直到1929年，郭沫若才指出：“周公东征就是因为被征服了的殷人不甘受奴隶制的压迫，造起了反来，周公便带兵去征讨他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此后，吕思勉、范文澜、翦伯赞、徐中舒、白寿彝、金景芳等历史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研究，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武王克商后两年病死，年幼的儿子成王诵继位，由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贵族不满。武庚乘机串通蔡叔、管叔，联合东方的一些部落和小国，一同起兵叛周。”（《中国通史纲要》）

近来，《周公东征的原因及其意义》一文却旧论重提：“历史文献记载，策动反叛的主要罪人应是管叔，而不是武庚。周公东征并不是什么武庚看到有机可乘，联合管、蔡和东方的徐、奄等国进行复国战争；而是管、蔡串通武庚进行反叛活动。这个叛乱的爆发，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所引起的。”^③王玉哲也提出：“管叔、蔡叔对周公代替成王当国不满，所以制造流言蜚语，说周公篡位。管叔、蔡叔并恶毒地离间王室，在国内造成贵族之间的分裂；在国外则‘启商’，引诱武庚乘

机叛周。可见，作乱的主谋是管、蔡二叔，他联合东方的商遗，举起反周的旗帜。”^③王冠英更提出：“很多著作把武庚管蔡之乱说成是武庚利用周统治集团的不和而乘机勾结管、蔡发动的复国战争。这虽不无道理，但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面。因为，事情的始末，首先是管、蔡为了自己的目的煽动和勾结了武庚，想借殷人的仇恨打倒周公，才给武庚这样一个可乘之机。所以，武庚之乱，应该说是管、蔡之乱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由管、蔡内乱引起的外乱。”^④

既然当时的实录（《大诰》）、历史文献（《周易》卦爻辞和《吕氏春秋》）和考古资料（《沫司徒遽簋》和《小臣单觶》铭文；《孙臧兵法》）对周公东征的原因记载相同，为什么至今却没有取得一致看法呢？我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缺乏全面的分析、如实的了解。我们同意：武王死后，对周政权的最大威胁来自企图复辟的以武庚为首的殷余民和以管、蔡为代表的内部分裂势力，以及东方的一些异族。这些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大叛乱。但对于这三种势力在叛乱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从而对周公东征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此，试对此问题作些分析，以资探讨。

武王克商，殷人被周人征服，只是一时武力不济，殷贵族并不心服，卫地贵族曾乘周师远征异族，发动叛乱，武王不得不动用警卫之虎贲来镇压。（《逸周书·世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周政权建立后，武王采取权宜之计，封禄父、设“三监”，亡国之仇却是消灭不了的。禄父和殷贵族一听到武王死去，就以为复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聚集力量，准备反周复国。所以，“成王元年，大开告成。周公曰：‘呜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竞时逋播以辅，余何循何循何慎。王其敬天命不易，天不虞。’”（《逸周书·成开》孔注：言商余紂子禄父竞求是逋逃。播越之人以自辅。当敬天命，备不度也。）

因此，武王死后，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传子诵，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本纪》）在这关键时刻，周公肩负起巩固政权的重任，表现出不畏人言的英雄气概，使周政权巩固下来，不愧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但这一点对于自以为具有武王次弟身份，应当先于周公继位的管叔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刺激。“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管叔为此言，怀有“践阼”的野心，昭然若揭。“加以文王的儿子很多，同情管叔们的举动的也难免有人，他们各有徒属，为了个人的利益打算，必然会同周公貌合神离。这就形成了自己阵营里的分裂。”⑤

西周初年，武王尚无力量象帝乙、帝辛那样经营东夷地区，那里大约维持着帝辛东征后的状况。武王死，周公摄政，周王朝内部发生了矛盾；禄父也积极准备反周。在他们看来，商之帝辛虽大举征伐过东夷，但现在帝辛死掉，商王朝灭亡，代之而起的周王朝已成为现实的威胁。所以，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⑥

周初政治上的困难，给以上三种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这些势力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因为，“夫殷而不念牧野之事乎？玄黄浆食，举国如狂，而轻去其君父。流言风雨，复举国如狂，而自诎以忠孝。……盖昔之迎周者，‘宅尔宅’，‘攸尔田’，家室温饱之情重于节义；则向之‘宅尔宅’、‘攸尔田’，周已操尔来去之情以相制而责偿焉。”（《尚书引义·多方二》）管叔及其群弟“公将不利于孺子”之流言，却正可起转移目标，把应付局势说成是王叔篡权，把反周复国的叛乱说成是“清君侧”的义举。而管叔、蔡叔呢？他们虽然不和殷贵族一条心，可是眼看周公揽着大权，作了实际上的王，也心怀嫉忌，想借着殷人的力量

来打倒周公，扩张自己的势力，以便取而代之。所以禄父和管、蔡虽不同族，目的相异，但在反周公政权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却是一致的，于是禄父串通管、蔡叛周。这就是“管、蔡启商，惑间王室”、“管、蔡以殷叛”的真相。

至于东夷，经过帝乙、帝辛两世征伐，久已屈服于殷人的统治；武王克商后，又间接承受了周人的统治。他们所以响应禄父的号召，不在于助殷，而在于防止周势力的东渐，更希望殷周两败俱伤，自己乘机独立。

故而，在这次叛乱中，与周有亡国杀君之仇的以禄父为首的殷贵族，很自然地成为叛乱的中坚。以管叔为代表的周王朝内部分裂势力，是抱着借殷人之力，反周公政权，为自己夺权的野心，附合禄父叛乱的。而与殷、周有着旧仇新恨的东夷，则是抱着防周东渐的目的响应禄父号召的；在叛乱爆发后，只是消极观望、摇旗呐喊，并未积极行动。

综合上述可知：周公东征的原因是“因武庚看到周内部矛盾不和，串通管、蔡和徐、奄等国进行复国战争”；不是“管、蔡串通武庚和徐、奄等国，利用殷周之间的矛盾进行反叛活动。”

2. 从《夬》、《萃》、《无妄》卦爻辞，看周公、召公

“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的措施

禄父串通管、蔡、联合东夷起兵叛周后，一时之间，内忧外患交相袭来，使周政权面临“若涉渊水”（《大诰》）的危机。因为，反叛联合力量的声势和实力超过周王朝，而且周人自己的父兄、亲戚们也有很多在东方，一定会被胁从到叛乱集团里，“投鼠忌器”如何抵抗得！加以同情管、蔡的文王诸子和他们的徒属，又跟周公貌合神离，这就形成了自己阵营里的分裂。如何把自己阵营团结起来，矛头一致对外，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复杂、困难的局势面前，周公表现了不畏流言的英雄气

概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请看《萃》卦爻辞：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
勿恤，往无咎。”

(1) 孚：信义。《尔雅·释诂》：“孚，信也。”(2) 终：到底。《玉篇》：“终，极也，穷也。”(3) 《象》、《序卦》、《杂卦》传并曰：“萃，聚也。”(4) 《经传释词》：“若，如也。”(5) 号：号召。《释文》：“马、郑、王肃均读户羔反”，即号召之号。(6) 握：汉帛书《周易》作“屋”。《释文》：“郑云：握当读为‘夫三为屋’之屋。蜀才同。”(7) 《说文》“恤，忧也。”《象》传：“乃乱乃萃，其志乱也。”爻辞意为：背信弃义，作乱相聚；若发号召，一伙为笑；不须忧虑，前往无咎。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1) 引：引导、引进。见《礼记》郑玄注。(2) 禴(音跃yuè)，祭名，不用大牲，仅用菜饭等，祭之俭约者也。《王注》：“禴，春祭名，四时之祭省者也。”爻辞意为：引而进之，不致咎害；欲其信从，利用禴祭。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胡朴安曰：“萃如嗟如者，方萃之时，族众咨嗟，多所议论也。无攸利往无咎者，或言萃之事无所利，或言萃之事往无咎。小吝者，如此杂乱，则小吝矣。”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1) 匪：古通“非”，不也。(2) 《广雅·释诂》：“元，君也。”爻辞意为：身居其位，会聚族众，事本无咎，众却不信，君负其责，永治其事，其悔自亡。

“上六 赍咨涕洟，无咎。”

(1) 赍(音齐qí)，持也。《集解》引虞翻：“赍，持。”(2) 咨：古通“资”，财也。《集解》本作资，引虞翻：“资，赍也，货财丧称赍。”(3) 洟(音夷yì)，流鼻涕。爻辞意为：携持资财，

痛哭流涕，逃奔他方，亦无咎害。

《萃》卦爻辞既具体补充了《大诰》所言周师未出，邦君庶士以为此举困难甚大，劝周公违卜、停止出征，甚至携资逃奔管、蔡的严重情况；又表明周公不畏流言，一心为国，誓平叛乱的决心，以及为团结族众、一致对敌而确定之“大化诱我友邦君”（《大诰》）、劝其出征的不咎既往，积极引导的原则。为此，他还严于责己，恳切声明完成父业、功成身退的衷心。请看《夬·九三》：

“壮于頄，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1) 壮：古通“状”，形状。《说文》：“状，犬形也。”(2) 頄（音求 qíú），面颧。《玉篇》：頄，面颧也。”(3) 夬夬（音决 jué），古通“决”，决决，行事果决而又果决也。《彖》、《序卦》、《杂卦》传并曰：“夬，决也。”(4) 濡（音如 rú），沾湿，淋湿。《集韵》：“濡，沾湿也。”(5) 《说文》：“愠，怒也。”元吴澄《易纂言》：“若，语词，犹言而也。濡，谓为其所沾濡。”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外若相濡，中实‘有愠’，则于君子之道终无所失。”即是说表面上对他们很和悦，但内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实际上并没有被玷污，所以得“无咎”。⑦ 爻辞意为：怒形于面，于事不利，果决独行，君子志坚，流言伤人，若雨沾身，表面和悦，内心怀怨，才得无咎。再看《无妄·九五》、《蛊·上九》卦爻辞：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1) 妄：曲邪谬乱。《说文》：“妄，乱也。”无妄即无曲邪谬之行。(2) 疾：非毁。《礼记·缁衣》郑玄注：“疾亦非也。”(3) 高亨：“古语谓病愈为有喜，因病愈乃可喜之事。”(4) 药：治疗，见《诗·大雅·板》毛传。《王注》：“非妄之疾，勿治自复，非妄而药之，则凶，故曰：勿药有喜。”爻辞意为：本无乱行，横遭非毁，不烦攻击，流言自灭。又《蛊·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说文》：“事，职也。”清陈梦雷《周易浅述》：“时当艰难，则

鞠躬尽瘁，不避险患，不以为劳；世已昇平，则功成身退，辞劳谢宠而不为矫。”

上引爻辞不仅与《逸周书·作雒》所述：“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一致；而且被“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周本纪》）之史实证实。

为了破邦君庶士艰大与违卜之说，劝其出征，周公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模仿文王，宣扬天命，告以吉卜，劝邦君庶士畏天出征。所以，在六十几句诰语的《大诰》中共用吉卜九处，且都放在诰辞的关键处，以坚定邦君庶士参战的信心，如：“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命）”（言我用文王遗留之大宝龟，卜问天命）；“朕卜并吉”（郑玄注：谓三龟皆从也）；“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遗播臣”（言予得吉卜，我谋与庶邦往伐殷亡散臣）；“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故我大用尔等东征，天命无有差错，卜之所陈惟顺从哉！）为了劝庶邦出征，周公说上帝虽然降给我们灾祸，但现在又要爱护我们，打倒东方的叛徒了。为了服从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该不对敌人作迎头痛击。

第二，言文王大业必须完成，破其艰大之说，并以种庄稼为喻，说明后人应当继承前人之遗业，号召大家团结一致，矛头对外。除前引《大诰》和《无妄·六二》卦爻辞外，再看《无妄·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1）无妄：不虞，出乎意料之外。马融、郑玄、王肃并曰：“妄，犹望，无妄，无所希望也。”（2）行人：叛离之人。《左传·昭公五年》杜注：“行，出奔也。”（3）《王注》：“牛者，稼穡之资。”爻辞意为：稼穡之事，耕牛为先，叛人牵去，邑人遭难。

又《大诰》：“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终朕

亩？”（言天思丧殷，若农夫之去草，我何不终我之田亩之事乎？言必终之。）

第三，联络殷族的一些贵族，许下他们优惠的条件，要他们帮助周王朝，戡定叛乱；并以其不可怠易天命的行动，破庶邦违卜之说。因为当周公的许多兄弟、亲戚和臣子们还在踌躇着不想接受这吉利的龟卜、武力平叛时，一些亡国的殷贵族们却拥护周公，表示愿意随同出征了。这使得周公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很坚决地发动他们一起出征；并借以告诫庶邦。对此，《大诰》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此言十人（孔传：十人者，谓民献有十夫来佐周）导知天命与天辅诚信之人，尔无敢轻视此事，何况天已降定于周邦乎？为此，周公还发展了“以殷治殷”的策略。请看《泰·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1）包：包容。（2）荒：荒之借字。《集解》本正作荒。《说文》：“荒，水广也，又大也。”清惠士奇《易说》：“愚谓广大为荒，包荒者，包容广大。”（3）清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用者，用此包荒也。”（4）冯（音平 píng），古通溯，《说文》：“溯，无舟渡河也。”《尚书·大诰》：“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言若涉深水，我只往求我所以渡过之法。）（5）遐（音侠 xiá），远也。《诗·小雅·天保》毛传：“遐，远也。”（6）遗：遗民。《尚书·多士》：“尔殷遗多士。”《说文》：“遗，亡也。”（7）朋：朋友。《易·复》卦卦辞：“朋来无咎。”（8）亡：往也，去也。《礼记·少仪》郑玄注：“亡，去也。”（9）尚：助也。王引之据《尔雅·释诂》：“尚，右也。”认为尚有祐助之意。（10）中行：人名。高亨、唐兰据《吕氏春秋·当务》：“纣之同母弟三人，其长曰微子，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以及《孟子·公孙丑上》、《史记·宋微子世家》之相同记载，认为“中行”似为人

名，似即微子之弟仲衍。爻辞意为：只有包容广大，不远殷遗贵族，同我一道涉河，才能共渡难关，幸得中行相劝，得与朋友同行。再看《夬·九五》：

“宽陆夬夬，中行无咎。”

(1) 宽陆：借为莞陆，谓对人宽大而和睦也。《释文》引虞翻：“宽，一本作莞。陆、蜀才作睦。”《集解》引虞翻：“宽，说（悦）也。睦，和睦也。”高亨认为虞氏训宽为说，尚不确切。宽当作宽，宽睦谓对人宽大而和睦也。(2) 夬夬：决决也，谓行动果决而又果决也。(3) 中行：人名，似指仲衍。爻辞意为：对殷朋友，宽大和睦，态度果决，不容怀疑，仲衍对我，有利无咎。

周公的坚强决心和中肯的利害分析，使邦君庶士认识到平叛是巩固周政权所必需，愿意为东征出力。周公联络亲周殷贵族，许下他们优惠条件的策略，也吸引了以仲衍为代表的一些殷贵族。于是，包括殷师在内的平叛大军终于组织起来，周公亲自帅师东征。

3. 从《晋》、《解》、《困》、《旅》卦爻辞 看周公东征的进程及其结局

对于周公东征的进程及其结局，古有两说。《逸周书·作雒》：“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迁于九毕（里）。”^⑥伏胜据此概括为：“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尚书大传》）

而《左传·定公四年》则记载：“管、蔡启商、纣间王室，王于是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司马迁据此记载为：“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之车十乘，徒七十人。”（《史记·管蔡世家》）

因此，现行中国通史著作对此问题的叙述也有分歧。《中国史

稿》、《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史纲要》认为：“周公东征遇到了商代残余奴隶主贵族顽强的反抗”，“经过三年持续战斗，才把叛乱平定。……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中国通史》则认为：“武庚遇到周兵，不战而溃，周公杀武庚、黜三叔，攻灭奄等十七国。”

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周公东征的文章，虽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周公东征的进程作了具体考证，并一致认为：“周公东征是一场很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伐纣的继续。”^①但对于东征的结局到底是“武庚北向逃亡，不知下落，管叔上吊死了”；^⑤还是“武庚弃城逃走，半路被周兵杀死，管叔被杀”，^⑥却未取得一致。为此，且将《周易》有关卦爻辞加以考释，并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加以探索。请看《小过·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1) 朱骏声：“密云、布散流言也。不雨，不实也。”(2)《正义》：“自我西郊，所聚密云由在我之西郊。”(3) 弋(音亦 yì)，带有绳子的箭，用来射鸟。《集解》引虞翻：“弋，矰缴射也。”

(4)《王注》：“在穴者，隐伏之物。”爻辞意为：流言蜚语，自我西郊，公往讨伐，捉彼在穴。再看《解》卦爻辞：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1)《集解》引虞翻：“田，猎也。”《程传》：“田者，去害之事也。”(2)唐史征《周易口诀义》：“狐，隐伏之物，喻奸猾之人。”

(3)黄矢：青铜箭。《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宜侯矢簋》铭文记载康王封宜侯时赏给“彤弓一、彤矢百”，表示可以代周王专行征伐。爻辞意为：讨伐叛逆，捉获三奸，剥夺黄矢，讨伐大吉。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1)负：背叛。《集解》引虞翻：“负，倍也。”《说文》：“倍，反也。”(2)乘：欺凌。《国语·周语》韦注：“乘，凌也。”(3)

致：以致。(4)寇：应为“戎”。《象》传：“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需·九三》“致寇至”，《释文》：“寇，郑玄、王肃本作戎。”《象》传：“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爻辞意为：背叛民族，导致战乱，民受欺凌，国遭灾难。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1)《诗·大雅·文王》毛传：“维，乃也。”(2)孚：得其情实。见《尚书·吕刑》孔传。《象》传：“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爻辞意为：捉获三奸，得其情实，君子冤解。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1)《周易尚氏学》：“解而拇，言利往也。”(2)《正义》：“而，汝也。”(3)朋至斯孚：即《象》传：“往得众也。”爻辞意为：王应亲出征，与众同伐叛，既坚庶邦心，又能往得众。

以上爻辞所叙与《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说文》引作：我之不彛。并曰：彛，法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与《逸周书·作雒》：“辟三叔”之义一致。同时，也证实当管、蔡流言时，成王不免动摇，所以《金縢》云：“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鹑》，王亦未敢诮公。”《诗·鸛鹑序》：“《鸛鹑》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曰《鸛鹑》焉。”这和《尚书大传》：“一年救乱”的记载也是符合的。既在一年救乱之后，就是摄政二年了。《金縢》又说：“秋大熟，未获，天大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接着说成王因开金縢，启金縢之书，得知周公之忠诚而言“惟朕小子其新（亲）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等等。尽管其中夹杂一些迷信的话，但在秋季以后，周公从东国回来，成王要亲去迎接是可信的。周公这次回来，是策划攻殷，《作雒》云：“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尚书大传》云：“二年克殷”均可证。这次东征是用成王名义行动。《尚书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诰中云：“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就是成王的口气。篇末说：“肆朕诞以尔东征”，则是成王也随周公东征了。今存《沫司徒遯簋》铭文：“王来伐商邑”，《小臣单觶》铭文：“王后反，克商”，都可以为证。

可见，周公平叛的第一阶段是“救乱”、诛管蔡。管叔首恶，处罪最重，结局最惨。至于管叔到底是上吊死的，还是被杀死的？根据周王朝以“亲亲尊尊”为内容的宗法制度及“刑不上大夫”

（《礼记·曲礼上》）的原则，我认为“管叔经而卒”（《作雒》）的可能性最大。对此，屈原在《天问》中有“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之问。清徐文靖《管城琐记》以此为问管叔事，伯林即管城之北林，雉经即自缢（上吊），即管叔与武庚作乱、失败后自缢于伯林。闻一多《天问疏证》、林庚《天问论笺》等均采此说。林庚译为：管叔在伯林吊死，那是什么缘故？

与周有亡国杀父之仇的以禄父为首的殷贵族，既是叛乱的中坚，“克殷”自是平叛的主战场。周公、太公帅师东征，成王也随同出征，经过艰苦战争，“殷大震，溃降。王子禄父北奔。”（《作雒》）对此，《旅》卦爻辞有记载。请看：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1）《释文》：“旅，王肃等以为军旅。”（2）《释文》引马融：“琐琐，疲弊貌。”（3）《尔雅·释言》：“斯，离也。”（4）《论语·为政》何晏注：“所，犹地也。”《象》传：“旅琐琐，志穷灾也。”（志穷，志不得达也。）爻辞意为：军队疲弊，溃败离邑，志不得达，祸由自取。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1）处：居处。（2）《释文》：“资斧，《子夏传》及众家并作‘齐斧’。张轨云：齐斧，盖黄钺斧也。”《尚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象》传：“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爻辞意为：攻占其居，得其黄钺，

未获其人，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1) 雉：鸟名，疑即《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中之隼。《集解》引《九家易》：“隼，鸷鸟也。今捕食雀者，喻暴君也。”(2)《王注》：“射雉以一矢，而复亡之，明虽有雉，终不可得矣。”(3)《广雅》：“命，名也。”《集解》引干宝：“此记禄父为王者后，则小有叛扰，终逮安周室，故曰：终以誉命矣。”爻辞意为：一矢中雉，带矢飞去；叛乱终平，公得荣名。再看《小过》卦爻辞：

“初六 飞鸟以凶。”

姚配中曰：“以，已也。凶已成，不可如何者也。”此飞鸟即《旅·六五》、《解·上六》“一矢亡”，“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雉”鸟。

“六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1) 过：行越其前。《说文》：“过，度也。度，越也。”(2) 从：追逐。《说文》：“从，随也。”(3)《经传释词》：“或，犹‘又’也。”(4) 戕(音枪 qiāng)，伤害。《集解》引虞翻：“戕，杀也。”爻辞意为：不宜紧追，利于防守，猛追穷寇，凶多吉少。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1) 遇：碰到。《玉篇》：“遇见，道路相逢也。”(2)《释文》：“眚，马云：灾也。”爻辞意为：没有追到，超越其前，飞鸟逃掉，留下祸患。

爻辞所叙不仅与《作雉》：“王子禄父北奔”情况相同，而且比喻相似。因为，据《国语·鲁语》：“有隼集于除侯之庭而死”，韦昭注：“隼，鸷鸟，今之鸢也。”则爻辞所言之“隼”与《诗·豳风·鸛鸣》所言之“鸛鸛”同为猛禽。殷墟出土物有铜鸢、大理石鸢，盖为压胜之物，是殷、周人已知其为猛禽了。故而，从《诗序》到《诗经今注》、《诗经直解》均认为诗中的“大鸟”比周公自己，

“鸛鷖”比禄父，“既取我子”之“子”比管叔、蔡叔。既然《作雒》、《旅》和《小过》卦爻辞以及《鸛鷖》三者所言同事，比喻相同，可为信史。

另外，据唐兰考证：武庚的名称，跟纣的名称帝辛一样，显然不是王子禄父生存时的名，如果在攻克殷都时王子禄父被杀死了，周人决不把祭日的武庚作为他的称号而且还冠以武字的。那末，北奔的话是真的。正由于王子禄父率领了殷国的残余突围北奔，因此殷城就崩溃而投降。王子禄父北奔以后，大概又过了一个短时期才死，他的臣下还用庚日祭祀他，所以号为武庚。周公死后，成王大概曾经北征，铜器《太保簋》铭文：“王伐录子聿”，此录子当是商的王族。成王的伐录子聿，显然是随着王子禄父北奔之路线的。

伏胜曰：“三年践奄”（《尚书大传》），可见践奄是在“二年克殷”后，紧接着进行的。因为，殷人的两大重镇，商邑（今河南安阳）靠近洛阳，奄（今山东曲阜），接近东夷，夺取了这两个据点，既可以从侧翼保障后方的安全，又可以获得征东夷的前进阵地。^⑩何况奄君还直接鼓动和参与了殷乱。经过两年苦战的东征军如何“践奄”呢？据《韩非子·说林上》：“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江声曰：商盖，商奄也。）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也就是说，直接打击的是东部的一些夷族。他们处在殷、周的东方和东南，被称为东夷和东国，他们的方国金文中有奄、丰伯、蒲姑，文献中有“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作雒》），而徐、奄是熊盈族中之强大者。他们似乎都是早期的国家和部落，虽有反周的同盟关系，而没有统一的军事部署和指挥，利于各个击破。可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的历史教训，周公记忆犹新。加之，苦战两年的周军，又远离后方，长途远征，困难较大。因而，周公为“践奄”制定了以殷攻夷、利用神鬼、怀柔招降、各个击

破的方针。请看《晋》卦卦爻辞：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1) 康侯：据顾颉刚考证，指武王弟康叔封，封于康，所以称康侯。^①于省吾、李镜池、高亨和唐兰等均同意此说。《沫司徒遯簋》铭文：“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以及《康侯丰方鼎》、《乍册鬲鼎》铭文均可证。(2) 锡：古通“赐”。锡马指成王、周公赏赐给康侯的良马。(3) 蕃：古通“番”，古时对外族的通称。《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4) 庶：古代指众民。《史记·秦始皇本纪》：“庶心咸服。”(5) 昼日：终日，一天。(6) 接：交战。《说文》：“接，交也。”卦辞意为：身骑王赐马，率领殷士兵，康侯征东夷，一日三交战。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1) 晋：进，指战争中的进攻。《象》、《序卦》传和《尔雅·释诂》并曰：“晋，进也。”(2) 《释文》引《子夏传》：“如，辞也。”(3) 《释文》：“摧，退也。”(4) 《尔雅·释言》：“罔，无也。”罔孚，无信。(5) 裕：宽宏。《新书·道术》：“包众容物谓之裕。”《王注》：“进明退顺，不失其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也。功业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故必裕之，然后无咎。”爻辞意为：始而进攻，继而退守，对我则吉；我军进攻，无信于人，对其宽宏，方保无咎。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1) 《说文》：“愁，忧也。”(2) 《说文》：“贞，卜问也。”(3) 《释文》：“介，大也。”(4) 古人称祖母为王母。《尔雅·释亲》：“父之妣为王母。”爻辞意为：进攻敌人，不胜为忧，龟卜得吉，王母保佑。

“六三 众允，悔亡。”

(1) 《说文》：“众，多也。”《尚书·汤誓》：“格尔众

庶。”(2)《说文》：“允，信也。”爻辞意为：众信于我，忧虑乃无。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鼫(音石 Shí)，田鼠。《尔雅·释兽》：“形大如鼠，头如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集解》引《九家易》：“鼫鼠喻贪。”爻辞意为：进攻之时，贪如田鼠，只顾窃食，其事必危。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1)《集解》引虞翻：“勿，无也。”(2)恤：气馁。爻辞意为：一时失败，不必气馁，胜败常事，再接再厉，无往不利。再看《困》卦爻辞：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1)《集解》引《九家易》：“株木，枯木。”(2)幽谷：深谷，见《诗·小雅·伐木》毛传。(3)覿(音敌 dī)，见也。

《象》传：“入于幽谷，幽不明也。”爻辞意为：征夷受困，如坐枯木，入于深谷，树木茂密，方向不明，很难行进。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

无咎。”

(1)朱紱(紱音弗 fú)，紱古通袂，《说文》：“袂，蛮夷衣也。”朱紱，红色的服装，代指穿红色服装的民族。不是国名。少数民族至今仍有以服色分别种族的。这是周人根据服色对某一民族的称呼。《周易通义》(2)享祀：祭祀求神。爻辞意为：困于深谷，缺吃少喝，朱紱方来，征伐则凶，祭祀求神，可保无灾。

以上卦爻辞所叙与下列青铜器铭文一致：

《禽鼎》铭文：“王伐奄侯，周公决策并且卜了，禽侯举行祭强鬼的典礼。”

《墉鼎》铭文：“周公在征伐东夷时，丰伯和專古(蒲姑)都

斩杀了。”^⑫

又跟下引文献记载相合：

《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诗·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陈子展译为：我们往到东山，好久好久不归。自从我们不得相见，到如今恰有了三年。

《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陈子展译为：既破坏了我们的圆孔斧头，又缺损了我们的方孔斧头。周公这次东征，四国就被匡正。可怜我们这些人呀，也都算是强壮的很！

《尚书·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

可见，周公“克殷”后，即同成王、太公、康侯、仲衍等亲帅周军、殷师大规模征东夷。不料面对的却是“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部落和早期国家的顽强反抗，经常陷入困境，很难征伐取胜。由于及时采取利用神鬼、怀柔招降的方针，经过艰难的斗争，才各个击破地消灭或招降了丰伯、蒲姑、徐、夷等国。由于附奄叛乱的东夷被击败，奄只得投降。

综合上述，可知周公率领的旨在击溃企图复辟的殷贵族和附合他们的内部分裂势力，以及东方的一些异族、巩固新生的周政权的东征，经过“救乱、克殷、践奄”这三个阶段，历时三年，最后取得完全胜利。

周初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胜利地平息这样一次大乱，既表明周公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卓越的才干和魄力，也表明周政权具有在政治上保持稳定的力量。可见，取得并巩固一个政权，光有军事上的胜利远远不够，还必须有能力保持政治上的稳

定。（《中国奴隶社会史》）

〔注〕

- ① 陈昌远《周公东征的原因及其意义》，《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 ②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 ③ 王玉哲《周公旦的当政及东征考》，《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
- ④ 王冠英《周初的王位纷争和周公制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 ⑤ 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 ⑥ 参见王汝涛《东夷与东夷文化》，《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 ⑦ 参见徐志锐《周易大传今注》。
- ⑧ 句读从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 ⑨ 白玉《简论周公的历史作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论集》。
- ⑩ 参见何幼琦《周公东征概述》，《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
- ⑪ 详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3册。
- ⑫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六）周公是怎样巩固周政权的

周公东征的胜利，比较彻底地摧毁了殷王朝在东方的势力，从而控制了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使周人在更大的地域内以更巩固的方式建立政权，不仅具备了可能，也成为必要。因为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殷朝潜在的社会势力并没有彻底消灭，还很顽固地存在着。在东征的过程中，大批殷贵族成了俘虏，失去了过去的威信，心怀不满，时刻梦想复辟。要制服他们，困难很大，周公始而在《康诰》中指出：“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殍我，我其不怨。”言今民不安，其心未定，屡导之犹未和同，天其诛罚我，我其不敢怨之。继而在《多方》中又说：“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言汝乃数导不静，汝心未顺，汝乃不考虑天命，汝乃悉弃天命，汝乃自为不法，谋击正长。就足以说明当时巩固政权的迫切性。

为此，周公适时而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仅巩固了周政权，而且奠定了周王朝“八百载，最长久”（《三字经》）的基础。现根据《周易》有关卦爻辞，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略加论述，以资探讨。

1. 从《益》、《艮》、《节》卦爻辞看周公建侯卫、营成周、根治殷顽民复辟的措施

（I）建侯卫

禄父与管、蔡的叛乱，给周王朝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东征胜利后，为了有效地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周公吊二叔之不

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请看《晋》卦卦辞和《益·六四》卦爻辞：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1）中行：似即微子之弟仲衍。（2）公：周公。（3）从：听命。《礼记·乐记》郑玄注：“从，顺也。”（4）依：古通殷，即殷商也。（5）迁国：迁都。爻辞意为：仲衍告公，听命于周，迁都商丘，以代殷后。

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可知，文王已“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屯·初九》），但只有周公、召公等少数人，也只限于畿内的岐山、丰邑等地。武王观兵孟津时曾“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师·上六》）但武王克商后，周军只到了今山东省的西部边境和河南省的东部，未踰殷之旧境。紂地既未能有，仍以封王子禄父，还保留殷国，只是把商王朝变为周王朝而已。奄、徐、淮夷又力所未及。故当时的分封，除“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氏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周本纪》）即原来就建立了的由古老部落转化的国，周重新明确了跟它们的政治关系者外，只“封弟叔鲜于管（今河南郑州市）、弟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原为殷有，属于周人征服地区，其中殷都和由管叔驻守的商东都（今河南商丘），还属于殷，管、蔡、霍“三监”还只处于镇抚地位。^①

周公东征“克殷”把殷国灭了，“东”大概也随着攻下了，周公乃“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旻父宇于东。”（《作雒》），中旻父即是仲衍，东是相土之东都，当时还没有建卫、宋两国，只是派人留守罢了。接着，就更向东去“践奄”、伐淮夷，并把丰和薄姑也灭了。东征时，太公望大概还是主要的将领，所以打下奄时就由周公之子伯禽驻守，打下薄姑时就由太公望之子吕伋驻守，而打下丰国时就由文王的庶子丰侯来驻守，丰侯大概也是随军征

伐的。等到成王封建诸侯的时候，就从这些既成事实出发，封康侯于殷，改称卫国，实际上由康伯髦为第一代卫侯；封仲旄父于东，改称宋国，就是仲衍；封周公于奄，改称鲁国，实际上伯禽才是第一代鲁侯；封太公望于薄姑，改称齐国，实际上吕伋才是第一代齐侯；只有丰侯封于丰，还用原来的国名。这都是在新得的土地上建立的诸侯，所以称殷东国五侯。后来，成王随着王子禄父北奔的路线“伐泉子聿”（《太保簋》铭文），接着北进，一直歼灭燕国，当时召公之子在军中，所以随着被封在燕国了。上述史实不仅与文献记载相同，如：

《诗·鲁颂·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陈子展译为：王说，叔父，立您的长子，使他为侯在鲁。大大开辟您的土宇，作为周室的藩辅。于是任命了鲁公，使他为侯在东，赐给他山川、田地和属国附庸。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对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汉书·地理志》据此纠正了《史记·周本纪》武王“封诸侯而师尚父首封”的错误，说：“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武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

《史记·宋微子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

更为周公、成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证实，如：

《沫司徒遽簋》铭文：“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唐兰意译为：王来征伐商邑，命康侯在卫地防守边境。

《宾尊》铭文：“乙卯，王命殷东国五侯，诞赐六品。”唐

兰意译为：乙卯这天，王命了保和东国的五个诸侯（卫、宋、齐、鲁、丰），送了六份礼品。

《亳鼎》铭文：“公侯赐亳杞土，……毫敢对公仲休，用作尊鼎。”唐兰意译为：公侯赏给亳杞地。……毫敢于对公仲的休美，用以作陈列用的鼎。并认为公仲或者就是宋国的仲衍（微仲），即仲旄父，为诸侯之一，所以称公侯。

这同武王时期相比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殷和东，一个是殷王朝的国都，一个是殷王朝过去的东都，所以武王要立“三监”；三监的叛乱平定以后，把这两个地点的重点改变了，把微仲放到东，实际上是次要的地点，而把康叔放到殷国掌握了全局，所以连续有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诰辞。把姬周王族封在殷地，使周朝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有了新的布局。二是据《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康叔的殷余民有“殷民七族”，封鲁公“殷民六族”，把殷余民分割在各个姬周王族封国治理，这无疑是吸取了王子禄父率领殷余民叛乱的教训。

“建侯卫”从根本上解决了武王以来的殷贵族复辟的问题，是东征在政治上的总结。同时，周公也吸取了管、蔡叛乱的教训，在建侯卫时，把最可靠的和最有力量的亲属分封到最要害的地区，并使他们同中央政权有较密切的关系。太公之为太师，周公之为太傅，召公之为太保，康侯之为司寇；而吕伋封为齐侯，伯禽封为鲁侯，召公之子封为燕侯，康伯髦封为卫侯，显然是保证齐、鲁、燕、卫忠于周王朝的一个因素。这就使周政权终于摆脱了《鸛鸣》中所描写的那种“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的困境，而开始巩固下来。周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正是由这时起开始得以顺利实现的。②

（2）营建成周，迁殷顽民

根据《周本纪》引《逸周书·度邑》的一段文字以及《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的记载，特别是

《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唐兰意译为：我要住在中央地区，由这里来治理民众。表明还在周武王时，营建洛邑的设想已经形成。因为，周由老根据地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而经文王迁丰（今陕西户县东）、武王迁镐（今陕西长安西南），步步东移，在当时显然是为了夺取殷政权的需要。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又进一步计划迁都洛邑，无疑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与周公讨论在洛邑建都的问题，甚至于睡不着觉。

可是，武王克商后，才两年就死了。紧接着王子禄父与管、蔡叛周，周公摄政，忙于东征，一直到“践奄”胜利后，这项计划便成了当务之急。因为，殷之余民虽已化整为零，使其分处卫、鲁、宋的统治下；而剩下的殷顽民，却都是有雄厚势力和重大影响的权门、势族，对周王朝的统治尚未心服，梦想复辟。为了彻底治服他们，便于对新拥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周公立即实现这个计划，营建洛邑。周公营建洛邑的史实不仅在《尚书》的《康诰》、《召诰》、《洛诰》、《多士》等篇，以及《逸周书·作雒》、《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尚书大传》等文献中，特别是周原甲骨文的“于洛”（H11:2）、“见工于洛”（H11:102）中均有记载，而且在《益》卦爻辞中也有叙述，请看：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1）大作：大兴土木。高亨：“大作即今语所谓大建筑。盖古谓造物为作，青铜器铭文率云作某器，即其明证。因而建筑亦谓之作，此皆作字之初义也。《诗·文王有声》：‘作邑于丰’，《诗·定之方中》：‘作之楚宫’，诸作字皆建筑之意。”（2）《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元，大也。”爻辞意为：营建都邑，对我大吉，无有灾咎。按：从《同卦·《六四》：“利用为依迁国”，可知，“大作”为营建洛邑事。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

(1) 或：古通“惑”，疑惑。《乾·文言》传：“或之者，疑之也。”(2) 《战国策·秦策》高诱注：“益，助也。”(3) 十朋之龟：价值千贝的大宝龟。唐兰据《斐方鼎》铭文：“朋，二百”，定二百贝为一朋。(4) 弗克违：不能违拒龟卜。爻辞意为：邑建何地，龟卜决疑，遵卜兴建，事则永吉。

爻辞所述与《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洛邑）。我卜河朔黎水（孔传：不吉。）；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王城所在，周师驻此），惟洛食（吉兆）；我又卜瀍水东（成周所在，殷顽民迁此），亦惟洛食。伋来以图及献卜。（言使成王来洛以谋定都之事且献卜兆也。）”相合。同时，看这前后三卜，黎水未出殷都畿内，殷顽民愿意居此，故不吉；渡河营成周、王城，殷顽民不愿意，却为吉卜，完全合乎周公调虎离山，就近监视的意图。

周公营建洛邑的经过，可从《尚书》中的《康诰》、《召诰》、《洛诰》、《多士》和《逸周书·作雒》，以及《尚书大传》等篇窥其概况。《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周公在建侯卫后，立即卜宅“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康诰》），五年开始营建洛邑，洛邑规模很大，据《作雒》是“城方千二百一十丈”，即所谓城方九里，而郭（外城）则方十七里，直到摄政七年，新邑才建成。③《书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尚书·多士》就是为处理这部分所谓“殷顽民”而发布的软硬兼施的移民文告。周公在宣布对殷的“多士”不再任用的同时，宣称只要“臣尔多逊”，不但“尚有尔土”而且“尚宁于止”，就是说，只要顺从周的统治，便可给予土地，让他们和平安定的生活。如果“尔不克服”，那就要“致天之罚于尔躬！”就是说，要替天行罚、严惩不贷。而《周易》的《艮》、《节》卦爻辞则记录了对殷顽民的管制禁令。请看《艮》卦爻辞：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1) 艮（音亘gèn），止。《彖》、《说卦》、《杂卦》传并曰：“艮，止也。”(2) 《释文》：“趾，足也。”爻辞意为：只要不乱动，保你无灾咎，如能长如此，对你必有利。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1) 腓：腿肚。《说文》：“腓，胫腠也，在足之上。”(2) 《集解》引马融曰：“拯，举也。”(3) 《经传释词》：“其，犹‘乃’也。”即“于是”。(4) 随：听从。爻辞意为：令其止腓不行，于是听从不动，其心因之不快。

“六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1) 明何楷《古周易订诂》：“限，即门限之限。”(2) 列：古通“裂”，分裂，以刀割物使分也。《说文》：“列，分解也。”(3) 夤（音银yín），即“腠”，背上肉。《释文》：“马云夹脊肉。郑本作腠。”(4) 《尔雅·释诂》：“厉，危也。”(5) 薰：《集解》本作“阍”。虞翻曰：“阍，守门人。”清于鬯《香草校书》：“古阍作熏字。”《象》传：“艮其限，危薰心也。”爻辞意为：主人被封门，违令鞭其身，背肉血淋淋，吓坏守门人。

“六四 艮其身，无咎。”

身：身体。《象》传：“艮其身，止诸躬也。”爻辞意为：安居勿动，保汝无灾。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1) 辅：颊骨。《左传·僖公五年》：“辅车相依。”按辅为颊骨，车为齿床，两者互为依存。人欲言语，则牙动而上辅对，故曰辅车相依。艮其辅，谓闭口不谈。(2) 序：分寸。《孟子·滕文公》注：“序，次序也。”爻辞意为：闭口不谈，言有分寸，则无悔恨。

“上九 敦艮，吉。”

胡朴安：“敦，厚也。止居其所，厚其生也。《尚书·多士》：‘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

尔迁。’此敦艮之事也。不仅厚其身，且厚其子孙。故曰：‘以厚终也。’”爻辞意为：尔能安居乐业，我则厚尔子孙。再看《节》卦爻辞：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西周时期建筑技术已有相当水平了。当时贵族居住的房屋之形式大概是这样的：前有堂，后有室，中间有廊，室的左右为房，互相对称，布置十分整齐。堂是行礼的地方，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门在东南叫“户”。整座建筑叫“宫”。宫的出入口叫“门”。故《一切经音义》曰：“在于堂室曰户，在于宅区域曰门。”户庭：室内也。《集解》引崔憬：“慎密守节，故不出焉，无有灾害。”爻辞意为：听从命令，安居室内，无有灾害。

“九二 不出门庭，凶。”

《周易尚氏学》：“通则利往，乃竟不出，是失时也，故凶。”爻辞意为：闭门不出，抗拒招抚，不识时务，必有凶险。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正义》：“违节之道祸将及己，以至哀嗟。祸自己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爻辞意为：不服管制，祸将及身，以致哀嗟，祸自己致，无所怨咎。

“六四 安节，亨。”

《象》传：“安节之亨，承上道也。”爻辞意为：安分守己，服从管制，奉命而行，自然亨通。

“九四 甘节吉，往有尚。”

(1)《说文》：“甘，美也。”(2)《国语·晋语》韦昭注：“往，行也。”(3)尚：古通“赏”。爻辞意为：心甘情愿，服从管制，坚持不变，必得赏赐。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象》传：“苦节贞凶，其道穷也。”《淮南子·时则》：高诱

注：“苦，恶也。”《程传》：“固守则凶，悔则凶亡。”爻辞意为：憎恨管制命令，坚持不变必凶，知过而改凶亡。不仅如此，《损·六三》还记载：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国语·周语》：“夫兽三为群，三人为众。”《象》传：“一人行，三则疑也。”《尔雅·释言》：“疑，戾也。”《左传·定公四年》注：“戾，罪也。”结合《酒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言有告发群饮，汝莫放过。全部逮捕送到周京，我将杀之。足以表明当时周王朝对殷顽民防范措施之严、管制法度之全、以及区别对待之明，分化拉拢之切了。

2. 从《恒》、《姤》、《蒙》、《噬嗑》卦爻辞，看周公对 殷余民实行的尚德保民、谨用刑罚的政策

牧野之战、前徒叛变、殷纣灭亡，禄父与管蔡叛周、殷师“崩溃、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的事实，使周公、召公等切实认识了民心向背是周王朝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因而他们在建侯卫、营成周的同时，及时教诲成王、康侯等贵族坚决执行尚德保民、谨用刑罚的政策。所以，周公始而在《康诰》申告康叔：

“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言要谨慎警惕！天德辅诚，而民情则大可见矣，小人难保，汝往治民，须尽汝心，毋苟安而好逸乐，乃安民矣。继而在《酒诰》又告诫康叔：“古人有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言古人有言曰：人无监于水，当监于民。今惟殷失其命，我等其可不大观览于此乎！对此，《周易》卦爻辞有更具体的论述，请看《恒》卦爻辞：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1)《国语·晋语》：“浚民之膏泽以实之。”韦昭注：“浚，煎熬也。”(2)《象》、《序卦》、《杂卦》传并曰：“恒，久也。”爻辞意

为：对民煎熬太久，事必凶多吉少，对我无有所利。

“上六 振恒，凶。”

《广雅·释诂》：“振，动也。”《象》传：“振恒在上，大无功也。”爻辞意为：动用民力太久，对我凶多吉少。再看《益·上六》：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1) 莫：不也。(2) 益：助也。(3) 恒：坚持不变。《说文》：“恒，常也。”(4) 《汉书·翟方进传》颜师古注：“击，摧抑也。”(5) 《经传释词》：“或，犹‘又’也。”爻辞意为：不去助益之，又去摧抑之，民心不坚定，形势必凶险。又《姤·九四》：

“包无鱼，起凶。”

(1) 包：包容。《集解》引虞翻：“在中称包。”(2) 起：动。《象》传：“无鱼之凶，远民也。”《王注》：“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也。”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庄子·徐无鬼》向秀注：“宾，客也。”《象》传：“包有鱼，义(宜)不及宾也。”《诚斋易传》：“古者以鱼比民。鱼者，众渔之所利也。包者，缓辞；有者，坚辞。取之缓，则有之坚矣。后有他人善渔者至，利亦不彼及之矣。何也？吾遇之时早，而取之之义缓也。宾者，他人之谓也。”

为此，周公、召公在《康诰》、《召诰》等篇中教诲成王、康叔等牢记文王尚德慎刑而有天下的经验，从而坚持尚德保民、谨用刑罚、用德化民，以巩固政权，使周王朝长治久安。所以，王国维曰：“《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殷周制度论》)对此，《周易》卦爻辞也有较多的论述，请看《蒙》卦爻辞：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1) 蒙：古通“氓”(音 蒙 méng)，周时称非本族之民为氓。

《释文》：“《方言》云：蒙，萌也。”萌、氓音同，古通用。《汉书集注》引如淳：“氓，古文萌字。”《周礼·遂人》郑注：“变民言氓，异外内也，氓犹懵懵、无知貌也。”《说文》：“氓，民也。”段注：“自他归往之民，则谓之氓，故字从民亡。”故王力《同源字典》、《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皆曰：“氓萌实同一词。”（2）《本义》：“包，包容也。”（3）《春秋·宣八年》杜注：“克，成也。”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引王申子曰：“包蒙者，包众蒙而为之主也。纳妇者，受众阴而为之归也。此通一卦而言也。”（4）《礼记·曲礼下》郑注：“言子者，通男女。”爻辞意为：包容殷民，令男娶妻，让女成家，君民两利。

“六三 勿用取女，贝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1）《说文》：“捕，取也。取，捕取也。”（2）金夫：武夫。《礼记·中庸》郑注：“金，兵也。”（3）李镜池：“不有躬，丧命。躬，身。”爻辞意为：强取殷女，违犯律令；碰上武夫，可能丧命。

“六四 困蒙吝。”

《释文》：“困，穷也。”《吕氏春秋·慎大》高注：“无衣食曰困。”爻辞意为：如令殷民，无衣无食，生活困难，未免遗憾。

“六五 童蒙吉。”

《程传》：“童，取未发而资于人也。”《周易集注》：“此就其纯一未散，专听于人而言。”《象》传：“童蒙之吉，顺以巽（服从）也。”爻辞意为：童蒙天真，柔弱顺从，听命于人，对我吉祥。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1）《释文》引王肃曰：“击，治也。”（2）《经传释词》：“为，犹‘用’也。”（3）《说文》：“寇，暴也。”（4）《集解》引虞翻：“御，止也。”《象》传：“利用御寇，上下顺也。”爻辞意为：治理氓众，不利用暴，利止暴。

周王朝对殷余民不仅采取包容下来、使其成家的作法，而且

令其牧畜、耕织，以怀柔、利用之。请看《大畜》卦爻辞：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

(1)《说文》：“良，善也。”(2)逐：放牧。《周礼·大司马》郑玄注：“逐，放也。”(3)利：宜也。(4)艰：垦耕。《广雅·释地》：“垦，耕也。”爻辞意为：既放良种马，更宜垦耕田。《酒诰》：“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言庶民须专一于妹土，用股肱之力，专种黍稷，服劳奔走，以事其父兄。农事已毕，又速牵车牛，远为商贾，孝养其父母。所言与爻辞一致。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1)童牛：牛之幼者。(2)吴昌莹《经词衍释》：“之犹‘有’也。”(3)《说文》：“牯，牛马牢也。”张舜徽《演释名》：“牯，窖也，饲养牛马于山谷或地下也。古代饲养，昼则放牧于野，夜则归藏于山谷或地下。今边裔山区犹然。”爻辞意为：幼小之牛，昼则放牧，夜归于窖，安全大吉。

“六五 豮豕之牙，吉。”

(1)豮(音分 fēn)，胡朴安：“古通墳。《诗》毛传：‘墳，大防也。’豮豕，大豕也。”(2)牙：古通互，栏也，即今之猪圈。《释文》：“郑读为互。”《周礼·修閭氏》郑玄注：“互，行马也。”

“互者，交互其木以为遮栏也。”爻辞意为：大猪奔突，破坏黍秧，圈中饲养，安全可靠。又《姤·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

(1)《汉书·景帝纪》颜注：“系，饲养之也。”(2)金，黄铜。(3)柅(音尼 ní)，纺车转轮的把手。《说文》：“屎，𨋖柄也。或作柅。”爻辞意为：男耕女织，有衣有食，安居乐业，对我大吉。

虽然如此，殷顽民和部分殷余民并不心服周王朝的统治，反抗之事时有发生。为此，周公制定了以德化民、谨用刑罚的政策。他在《康诰》、《无逸》中指出：除了对“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

啓不畏死，罔弗憝”（言寇盜攘奪內奸外宄，殺遠人取貨，強不畏死，无人不怨恨的破壞治安者，當順民意以刑之）；“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首惡為人大恨者，亦惟不孝不友之人，當刑之）；“乃別播敷遺民，大誓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言別播布告民之教命，大稱誓不念不用國家大法之人，以病其君，是乃增長其惡，惟我其怨之，此謂不循大法之官，亦當殺之）；一定要“刑茲無赦”，施以重刑。對廣大庶民則應着重及時引導、加強管教、防患未然，不能“亂罰無罪，殺無辜”以至“怨有同，是丛于厥身”（言民怨會同，于是丛集于其身），人們把怨恨集中在周王朝。對此，《蒙·初六》卦爻辭有明確的敘述：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1）發：启发。《爾雅·釋詁》：“發，開也。”（2）刑：古通“型”。《周易尚氏學》：“《詩·大雅·思齊》曰：‘刑于寡妻’，《左傳》襄公十三年‘一人刑善、數世賴之’，注皆訓‘刑’為‘法’，是‘刑’與‘型’通。‘利用刑人’者，言宜樹之模型，使童蒙有所法式，得為成人，永免罪辟也。”（3）清焦循《易章句》：“說，讀為脫去之脫。”古書通以“說”為“脫”。（4）桎梏（音至固 zhìgù）；手铐、腳鐐。《說文》：“桎，足械也；梏，手械也。”爻辭意為：启发殷民，宜樹典型，行有所法，以免刑罰，以往統治，難以再行。再看《噬嗑》卦爻辭：

“初九 履校滅趾，无咎。”

（1）履校：腳鐐。古代一種拘鎖腳的刑具，即所謂“貫械”。《集解》引干寶：“履校，貫械也。”（2）滅：遮蓋。《荀子·臣道》楊倞注：“滅，遮也。”（3）《集解》引虞翻：“小愆大戒，以免刑戮，故曰：无咎。”爻辭意為：足上腳鐐，遮蓋其腳，小愆大戒，以免刑戮。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1）噬肤：墨刑，用刀刺額頰等处，再涂上墨。《香草校

书》)(2) 灭鼻：劓(音 艺yì)刑,用刀割掉鼻子。《集解》引侯果:

“刑法虽峻,得所疾也,虽则灭鼻,而无咎矣。”《象》传:“噬肤灭鼻,以乘刚也。”乘,欺凌也。言以下犯上,民欺凌其君也。爻辞意为:以下犯上,身受墨刑;如若不改,要受劓刑;从此悔改,免受重刑。

“上九 何校灭耳,凶。”

何校:“若今犯人带枷也。”(《说文解字注》《系辞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爻辞意为:怙恶不悛,严惩不贷,颈上带枷,身陷牢狱。

以上爻辞所叙,不仅与《康诰》、《吕刑》以及《左传·昭公六年》:“国有乱政而作《九刑》”等记载一致;更为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训匭》(音宜yí)铭文:“查牧牛违誓诬主……念其初犯,姑以轻惩处,可减刑为鞭打一千,黥面……”④所证实。

3. 从《涣》卦爻辞,看周公致政成王、 建立嫡长子继承制

周公是武王之弟,他屏成王而及武王的做法,是特殊情况下的—种应急措施。根据他为周王室建立嫡长子继承制的设想,周公决心在他生前就结束这种局面,使国家走上嫡长子继承制的正轨,以垂范后昆。东征胜利和东都建成以后,周的王业巩固起来了,成王也已成人并积累了一定的统治经验,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成熟了。于是,周公在他摄政的第七年,把天子的权力正式交给王位的法定继承人武王的嫡长子成王,这就是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周公“致政成王”。这件大事不仅由《尚书·洛诰》、《多士》和《书序》具体记载了;并为近年出土的《王莫新邑鼎》和《何尊》铭文所证实;还为《涣》卦爻辞所补充,请看:

“初六 用拯，马壮吉。”

(1)《释文》：“涣，散也。”《序卦》传：“涣，离也。”(2)《释文》：“拯，拯救之拯。”涣为涣散，即人心涣散。人心涣散，必有危难，唯有结合人心，才能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乘上强壮之马，急驰速往去拯救，可以转危为安而得吉。《象》传：“初六之吉，顺也。”《程传》：“涣拯于始，为力则易，时之顺也。”顺字是指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行动，能辨别得早，行动快，即可达到拯救的目的。⑤ 爻辞意为：拯救涣散，当机立断，快马加鞭，转危为安。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1)《说文》：“奔，去也。”(2)《古周易订诂》：“机即几也。《说文》：‘踞几也，象形。’古人坐于地，几，坐所凭也。”《尚书·顾命》：“甲子，王乃洮颍水，相被冕服，凭玉几。”古代王坐凭玉几。《象》传：“涣奔其机，得愿也。”爻辞意为：离开玉几，（致政成王），北就臣位，行其所愿。

“九三 涣其躬，无悔。”

(1)《说文》：“躬，身也。”(2)《程传》：“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本无也。”爻辞意为：引身自退，得其所愿。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1)《礼记·祭法》郑注：“群，众也。”(2)《尚书孔安国序》注：“丘，聚也。”(3)匪：古通“非”。(4)夷：常也。“匪夷所思，言为恒常所不料也。”(《周易尚氏学》)《程传》：“天下涣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谓大善之吉也。涣有丘，匪夷所思，赞美之辞也。丘，聚之大也。方涣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难，其用甚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见所能思及也。非贤智，孰能如是？”爻辞意为：王室涣散，团结其众，（叛乱平定），大善之吉；（引身自退），致其大聚，其事甚难，非夷所思。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1)《周易尚氏学》：“吴先生曰：涣汗连绵字。愚按《上林赋》：采色滹汗，注：王石符采映耀也。涣汗与滹汗同。涣汗其大号，即颁布光显其号令，如风之无不屈也。”(2)《程传》：“大号，大政令也，谓新民之大命，救涣之大政。”“王居，谓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象》传：“王居无咎，正位也。”《尚书·洛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言始行殷见诸侯之礼，祭于洛邑，皆已安排而无紊乱）予齐百工，俘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言我带领百官，使之从王于新邑，我想到：庶几将有祀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无祀。’”（言王今就而命之曰：记功，宗人率领群臣举行大祀。）爻辞意为：颁布光显还政令，新王新邑即王位，从此天下得安宁。

爻辞不仅形象地叙述了周公“致政成王”的壮举，还赞扬了周公是一位对周王朝忠贞无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因为，王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每个王朝兴亡盛衰的大问题。因此，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绞尽脑汁、总结历史经验，希望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例如夏代的王位继承是传子，商代则不但传子也传弟，结果“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殷本纪》）西周初期由于受殷商影响，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之需要，周武王病危时提出“兄弟相后”，即兄终弟及，传位于其弟周公旦。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内有管、蔡怀抱野心，外有王子禄父不忘复辟，形势十分严重。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荀子·儒效》）结果，促成禄父与管、蔡叛周的祸乱。汲取这一教训，周公决心改行嫡长子继承制。《吕氏春秋·慎势》记载慎到一段话，深刻而形象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嫡长子继承制的特点和优点

恰恰在于定分。这就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所概括的那两句话：“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所以实行这种制度，使储君确定，杜绝诸子和诸弟的继承权，从而避免争端。故而，这个举动表现出周公的伟大和深谋远虑，对周王朝的王业无疑奠定了一块牢固的基石。

4. 从《既济》、《未济》、《临》、《观》、《谦》、《豫》、《家人》

卦爻辞，看周公为成王、康侯等总结的治国原则

(1) 以夏殷两代为鉴，不忘休恤相依，天命不常

周公、召公从巩固周政权的角度，把夏、商、周三代的兴替联系起来考察，提出：“天惟时求民主”的观点（《尚书·多方》），就是说天神时刻在寻求适合于作人民君主的人。由于“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不大克开”言夏之共职多士大不能明于保护劝响人民，竟皆为虐于人民，凡百所为，大不能明保护劝响人民也，所以天命抛弃了它，命令成汤“代夏作民主”。到了殷纣灭亡后，“天惟五年须臾之子孙，诞作民主”，用了五年的时间等待成汤子孙的悔悟，使他们继续作民之主。但是殷“多方”“罔可念听”（绝无可为天念听者）使“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善顺于众，能用明德以主神天之祀的周人取代殷王作民之主。^⑥因此，周公、召公要求成王、康侯等不仅要牢记休恤相依、天命不常的忧患，而且要恭敬地遵循文王的传统，虚心学习殷代先哲王的治国经验和那种励精图治、不敢过度享乐而谨慎戒惧的作风。这样才能“乃以殷民世享。”请看《既济》卦爻辞：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1) 东邻、西邻：殷在东，周在西。东邻指殷人，西邻指周人。《礼记·坊记》引此文，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2) 高亨：“‘杀牛’下，汉帛书《周易》

有‘以祭’二字，当据补。殷王朝杀牛以祭鬼神，可谓厚矣。”(3) 杓：古通褻，音跃 yuè，祭名，祭品薄约，仅用饭菜等，不用大牲。《象》传：“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广雅释诂》：“时，善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宋李杞《周易详解》：“胡氏以为此爻当文王与纣之事。纣居东山，故为东邻；文王居岐，故为西邻。东邻杀牛，祭之丰者也；西邻杓祭，祭之薄者也。纣贵为天子，得用郊祀之礼，其礼固丰矣，然秽德彰闻，腥闻于天，岂如文王之薄祭足以受命于天，而得大来之福也哉！”爻辞意为：纣为天子，杀牛以祭，然其德秽，神不保佑；文王杓祭，然其德香，神却保佑，代殷为王。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1) 繻：古通“襦”（音如 rú），《说文》：“襦，短衣也。”
(2) 袽音如 rú，《集解》引虞翻：“袽，败衣也。”《象》传：“终日戒，有所疑也。”《周易尚氏学》：“惧有所侵犯，故恶衣以自晦。”爻辞意为：身穿破短衣，整日戒不虞。

同时，鉴于“方纣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七王如父母。”

（《东坡书传》）的现实，周公、召公认为对于殷代的典章制度、刑法条例要大量继承过来，为周所用。因此，在《康诰》中告诫康叔要“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言汝往徧求殷先哲王用以安治人民之道，汝大远思商志成人度量民心而知所训导之方；别求闻于古先哲王用以安保人民之道。在宣布法律、判断案件时，要“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以殷代法律为依据，不要恣一己之私利行事。

(2) 以文王为法，用德治和悦小民；并以民为鉴，知己政得失之源

周公、召公在《康诰》、《梓材》、《召诰》、《洛诰》、《无逸》

等讲话中，反复告诫成王、康叔：君主既然是因政绩优良而从天神那里取得统治的权力，君主就应正确行使治理人民的职责，否则就会因政绩恶劣而被天神取消统治人民的权力；因之，必须以文王为法，“徵柔懿德，怀保小民，惠鲜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无逸》）言文王有和柔美恭之德，怀安小民，惠善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日中至于日昃，一食之顷，有不遑暇，欲以咸和万民。对此，《临》卦爻辞有具体的论述。请看：

“初六 咸临，贞吉。”

（1）咸：古通“诚”。《说文》：“诚，和也。”《尚书·召诰》：“其丕诚于小民。”《无逸》：“用咸和万民。”（2）临：治民。《国语·周语》：“爰职于王，以临其民。”爻辞意为：用德治和悦万民，王朝统治必吉祥。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1）甘：古通“拑”，“用拑制压迫的政策治民。”（《周易通义》）（2）《词诠》：“既，时间副词，表过去，已也。”（3）忧：忧惧。《象》传：“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爻辞意为：拑制人民，必无所利，既已忧惧，庶可免咎。

“六三 至临，无咎。”

《说文》：“亲，至也。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诗·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不自为政，卒（瘁）劳百姓。”陈子展译为：做事不躬不亲，庶民可不是对你信任？不自行好好为政，结果劳苦了百姓。爻辞意为：事必躬亲，治民无咎。

“上六 敦临，吉无咎。”

《集解》引荀爽：“敦厚之意。”《象》传：“敦临之吉，志在内也。”爻辞意为：敦厚诚实，必得民心，吉而无咎。

周公作为一个政治家，恪守的信条是：“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监就是鉴，也就是镜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

作为统治者，不要拿水作镜子去照自己的形象，而应当用被统治者的反应作镜子去了解自己的统治情况。因此，周公告诫成王曰：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充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无逸》）言其有告之以小人怨汝詈汝，则益自敬德；其有举其过失，则曰朕之过信若是，不敢含怒。郑玄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屡闻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同时，更要很好地考虑王族、诸侯、卿大夫、庶民，特别是殷商遗老的思想动态，要研究他们究竟想些什么，这样，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治理才能使他们顺服了。为此，《观》卦爻辞总结了“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象》传：言国君巡视邦国，观察民情，正是推行德政之活动）的经验和作法，请看：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1）童观：自作聪明。《释文》：“马云：童犹独也。”虞翻注与马同。《太玄·玄衡》：“童寡有也。”（2）小人：庶民之通称。爻辞意为，其在小人，自作聪明，尚无可咎；若在君子，狭隘为病，未免遗憾。

“六二 闾观，利女贞。”

闾观：一孔之见。《说文》：“闾，闪也，倾头门中视也。”爻辞不说君子，是承上文省。爻辞意为：一孔之见，妇人尚可，君子则吝。

“六三 观我生，进退。”

（1）生：古通省，过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香草校书》）（2）进退：前进或后退。《象》传：“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爻辞意为：观察已过，应进则进，应退则退，以改进之。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1）国之光：国家政绩风俗等之光辉。《尚书·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2）宾：宾聘、联盟的意思。（《周易通义》）爻

辞意为：巡视众邦国，观察其政教，利于众邦国，宾聘周王朝。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传：“观我生，观民也。”《集解》引虞翻：“生谓生民。”爻辞意为：观察庶民情况，据以制定措施，施政才能得当。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其：犹彼也，其生指殷余民。《象》传：“观其生，志未平也。”高亨：“平借为辨，谓辨明也。言周君考察他国之庶民，因其心中未能辨明他国庶民之情况也。”《尚书·康诰》：“汝丕远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训。”爻辞意为：观察殷民情况，度量民心施政，君子行事无咎。

(3) 以殷纣覆亡为鉴，不可逸豫，要“知稼穡之艰难”，谦逊勤政，作好臣民的表率

周公、召公吸取夏殷两代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不仅要勉励成王、康叔等敬德恤民以光显王业，而且还应告诫他们：“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召诰》，言勿使小民淫用非法，先教化也。王立于德之首，小民乃效法以行于天下，发扬王之光显矣。）

（《殷周制度论》）因而，周公作《无逸》谆谆告诫成王要“知稼穡之艰难”，不要“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走殷纣覆亡的道路，提醒成王勿忘“其监于兹！”对此，《豫》卦爻辞作了具体论述，请看：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1) 介：古通砢，坚硬。《释文》：“介，古文作砢。”《集韵》，“砢，硬也。”(2)《经传释词》：“于犹‘如’也。”(3) 终日：整日。《集解》引侯果：“明豫动之可否，辨趣舍之权宜，假如坚石不可转变，应时则改，不待终日。”爻辞意为：志坚如石，不骄不盈，娱不终日，应时而改，其事乃吉。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1)《集解》引王肃曰：“盱（音 虚 xū），大也。”(2) 豫：古通“娱”，享乐。《尔雅·释诂》：“豫，乐也。”(3)《经传释词》：“有犹‘又’也。”爻辞意为：过度享乐，已有忧悔，迟疑不改，又有忧悔。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1)《集解》引虞翻：“由，自从。”(2) 豫：古通“预”，预防。《荀子·大略》：“先患虑患之谓豫。”(3) 高亨：“盍（音合hé），借为嗑，多言也。簪，汉帛书《周易》作‘谗’。按簪借为谗，进恶言以毁人也。勿疑明嗑谗，言勿疑友人多言而谗己。”《象》传：“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爻辞意为：预防骄逸，谨慎而行，事大有得，勿疑友人，多言谗己。

“六五 贞疾，恒不死。”

(1)《尚书·太甲》孔传：“贞，正也。”(2)《集解》引虞翻：“恒，常也。”《古周易订诂》：“必战竟畏惕，以正自守，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所谓生于忧患者也。”《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也。瘝，病也。恫瘝乃身，盖即苦身劳形之意，谓当勤劳汝身，与文“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之义相贯。爻辞意为：以豫为病，贞正自守，苦身劳形，则常不死。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1)《释文》：“冥豫，冥昧耽于乐也。”冥豫，指不明白豫乐之道而无节制地寻欢作乐。(2)《说文》“成，就也。”(3)《集解》引虞翻：“渝，变也。”《象》传：“冥豫在上，何可长也。”爻辞意为：沉溺享乐，前途凶险，已成即改，则无咎害。再看《既济·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集解》引虞翻：“孚，信也。是，正也。有孚失是，谓若殷

纣沈湎于酒，以失天下也。”《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言文王诰教小子有政有事者曰：无 常 饮酒。诰教其在众国者曰：惟祭祀时 可以饮，以德自扶持，无使酒醉。《象》传：“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爻辞意为：惟祀饮酒。勿使至醉，方无灾害；饮酒无节，醉后志乱，泼酒淋漓，致濡其首，以至失正，自召灾害。

为此，周公告诫成王曰：“厥亦 惟 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无逸》， 江声曰：二王能自谦抑敬畏，则无逸可知。）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所以，《谦》卦爻辞曰：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1）谦：谦逊。《系辞》：“谦也者，致恭以 存 其位者也。”《说文》：“谦，敬也，敬其事也。”（2）《经传释词》：“用，犹‘以’也。”（3）《王注》：“用涉大川者，用涉大难。”《君奭》：“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象》传：“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郑玄曰：牧，养也。）爻辞意为：谦而又谦，重慎其事，用涉险难，何所不吉。

“六二 鸣谦，贞吉。”

《象》传：“鸣谦贞吉，中心得也。”爻辞意为：功成名扬，不骄不盈，谦逊自守，干事吉祥。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1）《尔雅·释诂》：“劳，勤也。”故胡朴安曰：“与民共耕，曰劳谦。”（2）胡朴安：“教民稼穡，努力于始，不懈于终，故曰终。”《象》传：“劳谦君子，万民服也。”《王注》：“居谦之世，何可安尊，上承下接，劳谦匪懈，是以 吉也。”爻辞意为：与民共耕，始终不懈，万民信服，何所不吉。

“六四 无不利，撝谦。”

《释文》：“撝，义与麾同。《书》云：‘右秉白旄以麾’是也。”撝同麾，麾同挥。爻辞意为：发号施令，谦虚谨恭，不骄不盈，

无往不利。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1) 于省吾：“富，古通服。不富以其邻，言与其邻不相悦服也。”(2)《释文》：“侵，王虞作寢。”《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注：“寢犹止也。”爻辞意为：虽与其邻，不相悦服，寢兵息战，无所不利。

(4) 要“仪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为了保证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子孝兄友等宗法原则的顺利施行，并利用家庭、宗族组织对被统治阶级从思想上加以控制，周公、召公认为不仅要“不友不孝”的“元恶大憝”、“刑兹无赦”；而且告诫成王、康叔等要恭己正家，以化成天下。请看《家人》卦爻辞（其九三、六四、九五、上九注解见（二）3）：

“初六 闲有家，悔亡。”

(1) 闲：防也。《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2)《经传释词》：“有犹‘于’也。”《象》传：“闲有家，志未变也。”爻辞意为：防闲于家，始终不变，防患未然，自无悔恨。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1)《公羊传·桓公八年》：“大夫无遂事。”何休注：“遂，专事也。”(2)中馈（音愧 kuì），家中饮食烹饪之事。《仪礼》郑玄注：“馈，朝夕食也。”《象》传：“六二之吉，顺以巽也。”（巽，伏从也。）《尚书·牧誓》：“古人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爻辞意为：妇女勿主事，只管朝夕食，如此顺以巽，家事则大吉。

以上七卦爻辞所叙，不仅与《康诰》、《酒诰》、《召诰》和《无逸》诸篇之意一致，而且跟《诗·豳风·七月》（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是诗也，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成王童稚，未

有所知，故详告之也。”）《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陈子展译为：成王不敢安逸，日夜谋出政教以安民。啊！好光明！尽了他的心。故今他会安靖天下四方）的意思相合。也跟《史记·周本纪》：

“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一致。更为康王时代的《大盂鼎》铭文（记康王说：

“那末，作事的，将要行酒礼，没有敢酣醉的；有文采的冬天的烝祭，没有敢喝到迷乱的，所以上天帮助并照临他的儿子，大大地保护先王，保有四方土地。我听说殷朝丢失她的天命，那是殷朝边界的诸侯们和殷朝的执政百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群众。……现在我就仿效文王的正德，象文王那样命令执政们。现在我就命令你，盂继续荣伯，恭敬和穆的德行，坚强而敏疾，早晚来规谏，献出奔走之劳，畏惧天威。……”见《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和1976年底在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铭文（“有法度的聪明的成王，在各方面授予和概括的治国纲要，用以开始治理周国。”）所证实。

综合上述可知：东征胜利后，周公、召公针对面临的严峻而紧迫的问题，吸取夏、商、周三代兴替的经验教训，适时而有成效地采取了建侯卫、营建洛邑、迁殷顽民等措施，以及尚德保民、谨用刑罚的政策，使周王业巩固起来，一切政事走上了轨道。周公却断然“致政成王”，使周王朝走上嫡长子继承制的正轨；并从国家利益出发，对成王负责到底，把治国的经验也传给他。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殷顽民复辟的危险和争夺王位的祸乱，牢固地巩固了政权，打下了周王朝八百年统治的基础。当时曾对周公有过疑心的成王都不得不赞美周公：“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洛诰》）言周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普为穆穆之美化，遭横逆而心不乱。

周公对事业忠心耿耿，料事多谋而审慎，善于从前人的得失利弊中寻找出自己的道路，对于有周一代甚至中国的封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真正称得上是一位对国家忠贞无私、光明磊落、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⑦

〔注〕

① 详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② 本节多采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和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说，不一一另注。

③ 参见附录拙文：《〈尚书·康诰〉篇首四十八字错简说”考辨》。

④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马承源：《中国青铜器》。

⑤ 参见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

⑥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⑦ 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

四、六十四卦各卦爻辞主题简介

通过对《乾》、《坤》、《泰》、《离》、《井》、《革》和《艮》等三十余卦爻辞的字解而句说之，表明各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连贯地论述一个观点或一件史实，并非“缺乏甚至没有必要的逻辑联系”的“筮辞的堆砌”。为此，特将六十四卦各卦爻辞主题简述于下，以资探讨。

（一）《乾》卦爻辞是周文王确定的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之要点；

（二）《坤》卦爻辞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根据殷大而周小的实际，确定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之事；

（三）《屯》卦爻辞是周文王在国内建诸侯、访贤才、屯膏粱以蓄积力量之事；

（四）《蒙》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公确定的对待殷遗民的政策；

（五）《需》卦爻辞是周文王（或派使臣）前往西北、西南，争取部落首领之事；

（六）《讼》卦爻辞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总结教训、认识“作事谋始”之事；

（七）《师》卦爻辞是周武王观兵孟津、伐纣预演事；

（八）《比》卦爻辞是文王、武王、周公确定和执行的团结内部、争取同盟方针的要点；

（九）《小畜》卦爻辞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决定与殷朝恢复臣服关系之事；

(十)《履》卦爻辞，是周文王脱羑里之囚后，亲往朝歌、请罪复交之事；

(十一)《泰》卦爻辞是武王克商后，统治殷人的措施；

(十二)《否》卦爻辞是武王克商后，统治殷贵族的策略；

(十三)《同人》卦爻辞是周文王伐崇之事；

(十四)《大有》卦爻辞是东征胜利后，周公“用享于天子”之事；

(十五)《谦》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敬慎治国之道；

(十六)《豫》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无逸、备豫之道；

(十七)《随》卦爻辞是周文王提出“有亡荒阅”之约及其实施事；

(十八)《蛊》卦爻辞是禄父串通管叔、蔡叔叛周后，周公以文王大业必须完成、破邦君庶士艰大违卜之说，劝其出征事；

(十九)《临》卦爻辞是周公、召公为成王、康叔等总结的“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的治民之道；

(二十)《观》卦爻辞是周公、召公为成王、康叔等总结的观察民情以确定政策之道；

(二一)《噬嗑》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赦过宥罪”的用刑之道；

(二二)《贲》(音必bì)卦爻辞是“帝乙归妹”、文王纳征之事；

(二三)《剥》卦爻辞是文王身陷羑里水牢之苦，及文王亲信求美女献紂而得赦归之事；

(二四)《复》卦爻辞是文王“伐商”失败后，决心与殷王朝复交之因由；

(二五)《无妄》卦爻辞是禄父串通管叔、蔡叔叛周后，周

公劝邦君庶士东征事；

（二六）《大畜》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王朝休养生息、加强戒备事；

（二七）《颐》卦爻辞是文王、武王、周公对待庶人议论的态度和利用龟卜麻痺殷人事；

（二八）《大过》卦爻辞所指不详，待考；

（二九）《坎》卦爻辞是文王身陷羑里水牢，及与亲信密谋出险事；

（三〇）《离》卦爻辞是周人麻痺，被敌袭击、遭烧杀后，出征灭敌事；

（三一）《咸》卦爻辞是一首少男求少女的情诗；

（三二）《恒》卦爻辞是周公、召公告诫成王、康叔等减轻剥削、施行德治事；

（三三）《遯》卦爻辞是文王“伐商”失败后，确定及时退避、以退为进策略之事；

（三四）《大壮》卦爻辞是文王确定养精蓄锐、“遵养时晦”方针之依据；

（三五）《晋》卦爻辞是康叔率殷师“践奄”事；

（三六）《明夷》卦爻辞是微子、文王、武王、箕子蒙难之事和脱难之道；

（三七）《家人》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文王齐家之道；

（三八）《睽》（音癸huí）是管、蔡流言、王族乖离事；

（三九）《蹇》卦爻辞是文王时期王臣蹇蹇、前往西北、西南争取同盟事；

（四〇）《解》卦爻辞是周公东征，“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之事；

（四一）《损》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王朝善待殷余民、争

取民心事；

(四二)《益》卦爻辞是东征胜利后，周公决定营建洛邑、为殷迁国之事；

(四三)《夬》(音怪guài)卦爻辞是禄父串通管、蔡叛周后，周公沉着应变、决心东征事；

(四四)《姤》(音构gòu)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公实施包容殷余民政策之事；

(四五)《萃》卦爻辞是禄父串通管、蔡叛周后，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事；

(四六)《升》卦爻辞是文王、武王讨伐敌对、扩张势力之事；

(四七)《困》卦爻辞叙东征三年之艰苦历程；

(四八)《井》卦爻辞是武王克商后，改善民生、争取殷民事；

(四九)《革》卦爻辞是牧野之战、武王克商之事；

(五〇)《鼎》卦爻辞是克商夺鼎，以“正位凝命”事；

(五一)《震》卦爻辞叙武王伐纣、雷雨难行事；

(五二)《艮》(音根去声gèn)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王朝管制殷顽民的措施；

(五三)《渐》卦爻辞是对大雁群飞列阵、有序不乱的赞歌；

(五四)《归妹》卦爻辞是“帝乙归妹”文王之事；

(五五)《丰》卦爻辞是殷纣大兴土木、盛极而亡之事；

(五六)《旅》卦爻辞是禄父北奔、周师追剿事；

(五七)《巽》(音逊xùn)卦爻辞是文王“内怀王心而外驯服”，利用龟卜，麻痺殷人之事；

(五八)《兑》(音队duì)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实施和悦殷余民政策事；

(五九)《涣》卦爻辞是周公“致政成王”事；

(六〇)《节》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王朝节制殷顽民的措施；

(六一)《中孚》卦爻辞是东土既定后，周王朝怀柔分化殷顽民之事；

(六二)《小过》卦爻辞是禄父北奔、周师追剿失利事；

(六三)《既济》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大局虽定、成败未卜，要常怀忧患之事；

(六四)《未济》卦爻辞是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要居安思危，“思患而豫防”之事。

六十四卦爻辞之记事，井然有序，毫无前后凌乱之处；且每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连贯。而所叙之观点或史事，皆与《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两汉古籍和《史记》相合或接近，又为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所证实，断非偶然之事也。

五、《周易》思想新探

——兼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一)

自从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几十年来，通过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特别是近年来赵光贤、傅筑夫、匡亚明等学者的研究，逐渐明确了：“殷周间的斗争，不仅是两个王朝谁胜谁败的斗争，而且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封建制和奴隶制）之间大变革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农奴制战胜了奴隶制，于是开创了西周封建社会，同时也奠定了尔后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方向。”^①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反映在意识形态上是周人在天命、政治、伦理思想上的跃进，这不仅表现在《尚书·周书》、《诗经·大雅、周颂》、《左传》和周初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而且更加如实、全面的保留在《周易》卦爻辞中。

1. 天命不常，“革命”合理，常怀忧患意识

殷人迷信上帝、鬼神，殷王事无大小，无不占卜，这在甲骨文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是说，殷人是十分相信天命的。殷纣王在西伯戡黎，形势对殷很不利，而殷民又不安定的危急时刻，还狂言：“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可是，

在《周易》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只有三处讲到天命在周、“革命”合理：

《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集解》引虞翻：“革而当，其悔乃亡。《传》以比桀、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故改命吉也。”

《姤·九五》：“含章，有陨自天。”

高亨：“含借为戕，胜也；章借为商，戕商，谓周武王克商。有犹其也。陨，坠也、灭也。爻辞言：武王克商，商之陨灭，乃出于天意。”

《大有·九四》：“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通“佑”，助也。此条爻辞乃东征胜利后，周公“用享于天子”时的颂辞，故曰：自天保佑，故东征吉祥而无不利。

多数爻辞却和殷人不同，特别突出天命不常天不可信：

《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传：“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集解》引侯果：“况纣之乱世也。”朱骏声：“喻纣之昏暗，为乱世也。《盐铁论》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此爻商受当之。”

《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明来知德：“此爻与《明夷》‘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相同。以屋言者，凡丰厚富贵，未有不润其屋者。丰其屋者，初登于天也。蔀其家以下，后入于地也。蔀其家者，草生于屋，非复前日之炫耀而丰矣。闚者，窥视也。阒（音去汭）者，寂静也。阒其无人者，户庭寂静而无人也。言窥其户寂静无人，至于三年之久，犹未见其人也。凶者，杀身亡家也。”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集解》引虞翻：“陂（音皮pí），倾，谓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正因为天不可信，所以《周易》卦爻辞要成王、康叔等存不忘亡，常怀忧患意识：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来知德：“休否者，休息其否也。其亡其亡者，念念不忘其亡，惟恐其亡也。丛生曰苞，丛者聚也。柔条细弱，群聚而成丛者也。桑止可取叶养蚕，不成其木，已非樟、楠、松、柏之大矣；又况丛聚而生，则至而柔者也。以国家之大，不系于磐石之坚固，而系于苞桑之柔小，危之甚也，即危如累卵之意。”

《既济·六四》：“濡有衣袽，终日戒。”

胡朴安：“濡有衣袽者，濡（音如rù），濡之借字。《说文》：襦，短衣也。虞翻曰：袽（音如rú），敝衣也。此说可用。短衣而敝也。终日戒者，终日衣此短敝之衣，以戒不虞也。故《象》曰：有所疑也。疑，即疑此不虞之事。”

对此，《系辞下》作者已有察觉，故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世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集解》也引陆绩曰：“文王在纣世，有危亡之患，故于《易》辞，多趋危亡，本自免济，建成王业，故《易》辞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属是也。易，平易也。纣安其位，自谓平易，而反倾覆，故《易》爻辞易者使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之属是也。”现在看来，忧患思想确实是有的，但不是文王忧于美里，而是周公忧于成周；所忧的不是得天命，而是保天命，患不在得而在失。因此也可以看出这是西周统治者的思想。②而这些思想跟西周初期青铜器铭文和古文献的记载一致，请看：

1964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在记载成王在京室对宗小子诰诫：“以前你已故的父亲公氏辅协文王。文王得到

了上天赋予统治天下的伟大使命。后来武王攻克了大邑商，曾祭告于天说：我建都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人民”之后，着重指出：“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意为：王有恭德、顺天，教训我不聪敏的。③

《康诰》：“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尔雅·释诂》：“肆，力也。”此谓努力。郑玄：“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天不专佑一家也。”

《诗·大雅·大明》：“天难忱斯，不易惟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陈子展译为：天命是难相信的呀，不容易做的就是王。居帝位的本是殷王的嫡子，却使他的命令不遍达于四方。

《诗·大雅·文王》：“命之不易，无遏尔躬。”知道保佑天命的不容易，就不要遏止在你们身上。

可见，这种天命不常、“革命”合理、常怀忧患意识观点的提出，是以周灭殷后急需从思想上压服殷人为政治背景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告诫周贵族，“天”既然能改变让殷王统治天下的命令，也就可能改变让周王统治天下的命令；从而借“天”的权威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约束他们不要干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事。这种认识与殷纣王仰仗天命、有恃无恐的态度是大相径庭了。这种观点含有变化、发展的积极因素，它不仅对殷商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天命崇拜是个重大的修正，而且说明至少在周公、召公一些先进之士对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④

2. 殷鉴不远，民心可畏，存亡事在人为

周公、召公之所以提出天命不常、“革命”合理、常怀忧患意识的观点，是专恃天命、虐用人民的殷纣王终于覆亡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他们又亲身经历了牧野之战、前徒叛变、武王克商以及周公东征“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等巨大历史变革，切实领会了天命是渺茫的，民心向背才

是现实的。对此，《革》、《晋》卦爻辞均有反映，《革·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1) 大人：指殷纣王。《论语》郑玄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2) 虎变：喻殷纣王之威猛残暴。《礼记·檀弓下》：“苛政猛于虎也。”(3) 胡朴安：“未占有孚者，言不待占决而天下信也。”爻辞意为：殷纣王凶残如虎，不待占决民信我。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爻辞意为：将帅凶残如豹，前徒临阵而叛。《晋·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来知德：“贞者，尽其在我，不畔援苟且汲汲以求进也。吉者，终得遂其进也。罔孚者，不信之也。……设或不我见信，不可急于求信，惟宽裕以处之，则可以无咎矣。”爻辞意为：始而进攻，继而退守，对我则吉；我军进攻，无信于人，对其宽宏，方保无咎。

“六三 众允，悔亡。”

爻辞意：众信于我，忧虑乃无。

因之，《益》、《损》等卦爻辞谆谆教导成王、康叔等要重视民意、争取民心；只要人民不反对，天命就可以长保。《益·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1)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尔雅》：惠，顺也。有孚惠心者，言我信于民，顺民之心也。”(2) 勿问元吉：可无问而大吉也。胡朴安：“民众之孚，须有仁惠之心，可无问而大吉也。故《象》曰：勿问之矣。有孚惠我德者，行有所谓之德，惠心谓心，惠德谓政。民众之孚，以仁惠之心，行仁惠之政，政行而民从，故《象》曰：大得志也。”

“上六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易经集注》：“莫益者，莫能益也。若益而不已，则日进

无疆，其益无方，所以立心当恒。若不恒，不能益而不已，犹有击之者，则凶矣。”《损·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

《象》传：“弗损，益之，大得志也。”朱骏声：“弗损，弗浚民以生。”

这些论点跟下引文献完全一致：

《君奭》：“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周秉钧《尚书易解》：“时我以下，皆召公之言也。已，尝也。时，借为恃。《吕氏春秋·恃君览》《史记索引》作《时君览》，时与恃古通用。我，我辈。宁，安也。越，与也。言不敢不永远念天之威及此下民。罔，无也。尤，过也。罔尤违惟人者，言无过失，无背违，惟恃有人耳。今按《墨子·非命中》引召公之语曰：不自天降，自我得之。正此意也。”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大誓》）

《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陈子展译为：伟大呀上帝！看到下面这样分明。观察着天下四方，寻求人民的安定。

《诗·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陈子展译为：宜安民，宜官人，受福禄于天神。保佑而授命他，从天神申警他。

可见，这种从民心向背来观察天命，依靠人力来维持天命的思想，是西周初年的时代精神。这种观点把民心放在天命之上，重人事轻天命，这是周人天命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思想前奏。

3. 以德化民，谨用刑罚，“以小民受天永命”

既然民心向背决定天命的存亡，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康诰》言今民不安，其心未定）、“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怎么办？周公、召公提出了以德化民、谨用刑罚的方针。《恒·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象》传：“不恒其德，勿所容也。”（1）《集解》引侯果：“恒，久也。”（2）《老子河上公章句》：“或，常也。”（3）《说文》：“承，受也。”（4）羞：耻辱。爻辞意为：不恒其益下之政，常受其自下之辱，行事难以成功。”《损·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1）损：减损。《释文》：“损，省减之义也。”（2）疾：疾苦。（3）遄（音船chuán）：迅速。《正义》：“疾何可久？速乃有喜，乃无咎，故曰：使遄有喜，无咎。”爻辞意为：减损民之疾患，使其迅速开颜，对我才无咎害。

这些论点跟下引论述一致：

《诗·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陈子展译为：上帝告文王：我赋与你的天性曰德，不夸大号令的声威和严厉的颜色，不长用教刑的夏楚和官刑的鞭革。

《殷周制度论》：“《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

卦爻辞又以殷亡为鉴，提出了“以德化民”的具体措施：

首先，是包容殷余民，使其成家立业：

《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爻辞意为：包容殷民，令男娶妻，让女成家，君民两利。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爻辞意为：对我包容，小人欢迎，大人不通。

《姤·初六》：“系于金柅，贞吉。”爻辞意为：男耕女织，有衣有食，安居乐业，对我大吉。

其次，是宽其徭役，解其疾苦：

《恒·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爻辞意为：对民煎熬太久，事必凶多吉少，对我无有所利。

“上六 振恒，凶。”爻辞意为：动用民力太久，对我凶多吉少。

《损·六四》：“损其疾，便遄有喜，无咎。”

前引《井》卦爻辞则全面、具体地叙述了修治旧井、解民疾苦事。

再次，当时，殷乱方定，尚多反侧，时有不法，故周公、召公又诚以注重说服、谨用刑罚，《兑·初九》：

“和兑吉。”

和兑即和悦。《释文》：“兑，音悦。”爻辞言对民和悦，万事大吉。

“九二 孚兑吉，悔亡。”

《说文》：“兑，一曰谈说也。”《象》传：“孚兑之吉，信志也。”爻辞意为：以诚信之谈话，使民信而从之，则吉祥而悔亡。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1)《释文》：“商，商量也。”(2)《尔雅·释诂》：“宁，安也。”

(3)《释文》：“介音界，隔也。”爻辞意为：商谈事虽未定，隔阂有所消除。又《蒙·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爻辞意为：启发殷民，宜树典型，行有所法，以免刑罚，以往统治，难以再行。又《噬嗑·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爻辞意为：足上脚镣，遮盖其脚，小惩大戒，以免刑戮。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爻辞意为：以下犯上，身受墨刑；如若不改，要受剕刑；从此悔改，免受重刑。

“九四 噬乾肺，得黄矢，利艰贞，吉。”

《易经集注》：“肺（音子 zǐ），乾肉之有骨者。治狱遇多年陈久烦琐之事，一时难以断理，故有噬乾肺之象。曰得者，教人必如此也。恐其徇于私而未甚光明，故必如金之刚、矢之直，而又艰难正固则吉矣。艰者，凛凛然惟恐一毫之少忽，以心言也。贞者，兢兢然惟恐一毫之不正，以事言也。”

爻辞所叙跟《尚书·周书》记载完全一致：

《康诰》：“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忧。否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尚书易解》：“无作怨者，无作怨于民也。非谋，不善之谋。非彝，不善之法。蔽，塞也。忧，诚也。丕则敏德，于是勉行德教也。顾其德，唯仁是亲也。远乃猷，谓宽其徭役。裕乃以，谓足其用也。民宁，不汝瑕殄者，言如是，则民安宁，不疵瑕汝，不殄绝汝矣。”

《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此言皇天既付人民与疆土于先王矣，今王亦思用德，以和悦教导此迷惑之民，用以完成先王受命之事。

周公在《康诰》第三段还告以谨用刑罚之准则：原情定罪；真心保民；用刑之权，操之康叔；尽心断狱；依法行刑。刑律：破坏治安者当刑之；不孝不友者当刑之；不循大法之官亦当杀之；

大弃王命之诸侯，亦当征讨之。

周王朝所以实施这种跟商代奴隶主纯用神权政治加暴力手段不同的德教(《汉书·元帝纪》：“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由于在殷大周小、殷人兵力强于周人远甚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殷纣王军中的平民和奴隶，武王在《牧誓》中就提出了“不御克奔，以役西土”(郑玄曰：“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的誓言，促成了牧野之战、前徒叛变，殷纣灭亡。而且，周人原本以农业立国，胜殷进入中原后，那些贵族成了周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数平民也由于战功和其他原因变成了不事农耕的“国人”；故而劳动人手必然短缺，必须从殷人中补充大量劳动力。所以，武王克商后即把大量奴隶和平民包容下来，令其成家立业，从事农耕。

这种以德化民、谨用刑罚、“以小民受天永命”的观点反映了封建领主制战胜奴隶制，劳动人民之被重视，他们由奴隶而农奴，社会地位在提高。与此相应，殷代盛行的杀俘虏以为人殉、人祭之风，到了周代则衰落下去，已发掘的周代墓葬中，有人殉、人祭的很少；即使有，人数也不多。

4. 修身齐家，自纳于德，效法先祖榜样

周公、召公根据商灭周兴的史实，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的教训，告诫成王、康叔等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必须“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陈子展译为：于是进修你们的品德：长久修德而配合天命，自己就会求得多福。)”且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殷周制度论》：勿使小人淫用非法，先教化也；亦勿敢杀戮以治民，戒暴虐也。乃有功，民可安宁也。言王立于德之首，小民乃

效法以行于天下，发扬王之光显矣。）为此，他们在《周易》卦爻辞中，向周贵族全面、具体地提出修身、齐家、治国的准则，现择其要者，简叙于下。

(1) 孝友、齐家，继承先祖事业

《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来知德：“当家事败坏之时，子欲干其蛊，若我以阳刚中直之性直遂干之，则不惟不堪，亦且难入，即伤恩矣，其害不小；惟当屈己下意，巽顺将承，使其身正事治，则亦已矣，故曰不可贞。事父母几谏是也。”

《师·六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程传》：“任将授师之道，当以长子帅师。二在下而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以弟子众主之，则所为虽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长子者也。”

《家人·初九》：“闲有家，悔亡。”《王注》：“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闲有家’，然后‘悔亡’也。”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集解》引陆绩：“假，大也。王得尊位，据四应二，以天下为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忧则吉。”

《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爻辞意为：不耕种就想收获，不开荒就想种熟地，岂能不劳而得；唯有继承先祖事业，才能有所收获。

这些论点跟下述文献所述完全一致。

《康诰》：“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言首恶为人大恨者，亦惟不孝不友之人。

《诗·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言想到这个王季，依他本心就能友爱他的阿兄。

《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

维则。”言有成王的诚信，做了天下的标准。长久的有孝思，孝思是上法先人。

(2) 勤劳、谦逊、无逸、戒酒

修身的具体内容，从积极方面说，是勤劳、谦逊。请看《乾·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爻辞意为：要做个亲临田间、与民同耕、利于示范大人的龙。《谦·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易经集注》：“劳者，即劳之来之之劳。有终即万民服。”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王注》：“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难，物无害也。”

从消极方面说，是无逸，戒酒，《豫·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爻辞意为：过度享乐，已有忧悔，迟疑不改，又有忧悔。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爻辞意为：志坚如石，不骄不盈，娱不终日，应时而改，其事乃吉。《未济·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爻辞意为：惟祀饮酒，勿使至醉，方无灾害；饮酒无节，醉后志乱，泼洒淋漓，致濡其首，以至失正，自召灾害。

上引爻辞与下引文献可互为其证：

《无逸》：“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不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惟正之供，惟正税是进也。此言无放恣于观览、安逸、出游、田猎。无自宽暇曰今日耽乐；今日耽乐乃非民所顺，非天所顺，若是之

人于是有过错矣；无若殷王纣之迷乱，以醉怒为酒德哉！

《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言文王诰教小子之有政有事者曰：无常饮酒。诰教其在众周者曰：惟祭祀时可以饮，以德自扶持，无使至醉。惟谓我民教导子孙惟爱土物（粮食），则其心善矣。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余其杀。”言有告发群饮，汝莫放过。全部逮捕送到周京，我将杀之。

《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敬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恫瘝乃身，盖即苦身劳形之义，谓当勤劳其身也；与下文无康好逸豫之义相贯。言天德辅诚，而民情大可见矣，小人难保。汝往治民，须尽汝心，毋苟安而好豫乐，乃安民矣。

《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言成王不敢安逸，日夜谋出政教以安民。

（3）观民、改过、亲临、用贤

《观·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王注》：“观民以察己之过。”爻辞意为：观察庶民情况，据此制定措施，施政才能得当。

“六三 观我生，进退。”爻辞意为：观察己过，应进则进，应退则退，以改进之。

《临·六四》：“至临，无咎。”高亨：“至临犹亲临，君上亲至理政以临民。亲临则朝无废事，臣无窃权，可以无咎。”

“初九 咸临，贞吉。”爻辞意为：用德治和悦万民，王朝统治必吉祥。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释文》：“知音智。”《老子·道经三十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来知德：“知临者，明四目、达四聪，不自用而任人也。宜者，得人君之统体也，吉可知矣。”

《蛊·六五》：“干父之蛊，用誉。”《易经集注》：“用者，用人也。

用誉者，因用人而得誉也。”

上引爻辞与下引文献可互为其证：

《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郑玄：“所，犹处也。君子处位为政，其无自逸豫也。”王引之：“依，隐也，谓知小人之隐也。《周语》：‘勤恤民隐’韦注曰：隐，痛也。小人之隐，即上文稼穡之艰难，下文所谓小人之劳也。云隐者，犹今人言苦衷也。”

“咸或告之曰：‘小人怨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言有告之以小人怨汝骂汝，则益自敬德；其有举其过失，则曰朕之过信若是，不但不敢含怒。郑玄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屡闻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言文王尚能修治安和我中国，亦惟有此五臣耳。

《诗·周颂·烈文》：“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不思惟德？百辟其刑之。”言莫强的是得到贤人？四方诸国都要教导的。不显明的是有德行？凡百诸侯都要来仿效的。

这些修身、齐家、治国的准则既表明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是分不开的。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尊祖敬宗”的观念是一致的，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唯一重要的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特征之一。又反映了周公、召公企图把道德规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要求居于统治地位的君主和诸侯带头遵守，作出表率，然后上行下效；而不是单纯依靠暴力和苛刑来建立一个人心所归的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并且成为刚直不阿的官员和士人劝戒天子，批评时政的武器。因之，使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的统治时期，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政局稳定，是周王朝的兴盛

时期。

由于周公、召公在《周易》卦爻辞中，不仅择要叙述了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而且根据其成败的因由，总结出：天命不常、“革命”合理、常怀忧患意识；殷鉴不远，民心可畏、存亡事在人为；以德化民、谨用刑罚、“以小民受天永命”；修身齐家、自纳于德、效法先祖榜样等观点，并付诸实践，行之有效。因而，卦爻辞关于天命、政治、伦理道德的根本观点，就成为西周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石，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发展的源头。

(二)

所以，春秋时期的管仲在回答齐桓公“何谓五官技？”的问题时说：“《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管子·山权数》）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春，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小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淮南要略》）他当然与《周易》发生过深广的关系，现简述于下。

1. 学《易》“而知天命”

《论语》有两条记载：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除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外，魏何晏注、南朝皇侃疏、宋邢昺疏、清刘宝楠正义和杨树达《论语疏证》均认为：“此盖孔子

四十以后之言。《易》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学《易》数年，故五十而知天命也。”这种看法符合孔子本人的历史、思想情况和《周易》思想的实际。因为，“三十而立”后的二十年既是孔子办学成名，也是孔子思想由形成到定型的重要时期。公元前513年，他三十九岁时，晋国六卿里的赵鞅、中行荀寅在晋国征铁铸鼎，刻上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孔子大加讥评，说是“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就是说废除了西周初祖唐叔的法度，使民众拿刑鼎作根据，就不会尊重贵族，因而贵族就会失去传统的地位，“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自此以后，凡事关保存西周之礼，他便不再动摇，自述“四十而不惑”。但孔子虽然对世道的变化“不惑”，却没有找出自以为最好的救世之道，即所谓“知天命”。他为此又探求了十年。

这十年里，鲁国同各诸侯国一样，政治动乱日益加剧。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在流亡中死了，鲁国民众却无人纪念他。鲁国三桓的处境也不美妙。鲁昭公死后，季平子立鲁定公，继续专国政。到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也死了，他的家臣阳虎、公山不狃，便合谋控制继任鲁国执政的季桓子，形成所谓“陪臣执国命”。不料，这却给孔子提供了“出仕”的机会。《论语·阳货》说到就在这年阳虎劝孔子出仕；因为阳虎是“陪臣执国命”，鲁国政局混乱，孔子虽没出仕，却说：“我迟早是打算出仕了。”为此，他对“周之所以王”的《周易》进行钻研，以了解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掌握周公、召公根据其成败因由总结出的一套以人事可以转移天命为基调的天命、政治、伦理道德观点，作好出仕的准备。所以邢昺说：“孔子四十七岁学《易》”是可信的。数年重学《易》更坚定了孔子“出仕”、“行道”的决心和信心，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就在这年，公山弗扰盘据费邑背叛季氏，请孔子参加，孔子曾准备去，因为子路反对，没有去成。但他表白了自己为什么去的愿望，说：“请我去的那个

人，难道是白白地请我去吗？如果有人能用我，我是要把文、武、周公的事业在东方复兴起来。”（《论语·阳货》）可见，孔子所谓“知天命”，即是他认为上天使自己成为周文王后全部文化的继承者，他的使命就是“修成康之道”，在东方复兴文、武、周公的事业。因而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鲁定公八年冬天，“阳虎欲去三桓”内乱后，五十一岁的孔子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卓有政绩；第二年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再由小司空升大司寇、摄相事。担任鲁司寇的三年，是孔子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不料，他为了削私家以强公室，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于是，孔子强公室、抑三桓的主张和三桓弱公室、强三桓的主张之间矛盾尖锐，合作破裂，堕三都失败，终于导致碰壁、辞官、离鲁的结局。

以后，自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足足有十三年，孔子便带着一班弟子访问诸侯列国，目的仍然是“出仕”、“行道”，结果到处碰壁，不得不结束流浪，回到鲁国。⑤

孔子返鲁后，虽然鲁定公向孔子问政，季子却不听，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出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虽风尘仆仆，到处碰壁，却依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继续为“述周公之训”而奋斗，故“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赵倬生解释：“此处彬彬，非指文明礼貌之状而言；字书曰：彬，备也。用当代语翻译出来就是全面。今以私意臆测，孔子生平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人，是分枝的；晚年归于《易》之综合，故喜。彬彬、备、全面，说的是一回事，即《易》中实包含有中国远古人所具备的一种原始的

综合。《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起点。”^⑥柳诒徵也认为：“文王、周公之学，以《易》之卦爻为最邃。”^⑦故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

2. 以《周易》为准则，整理《尚书》、《诗经》

“孔子之时，周室衰微，礼、乐废，《诗》、《书》缺。”为了让弟子们树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志，“以备王道”，孔子乃以《周易》为准则，整理《尚书》、《诗经》。因之，在《尚书》这部中国上古虞、夏、商、周四代历史文献选集中，便体现了以下选录原则：

(1) 孔子所选录的主要是政治史的材料，虞、夏、商、周的统治者如何为君、如何治民、如何为自己兼弱攻昧的行动寻找理由等等题材，都似乎引起孔子的关注。

(2) 孔子所关注的政治文献，重点在于有关殷灭周兴的祖伊对殷纣王的警告，微子对天命丧失信心的怨言，周武王牧野之战誓师之辞，特别是周公、召公谆谆告诫成王、康叔等要朝乾夕惕、存不忘亡的讲话记录。这理由，消极的如他所说是因为夏、殷的文献不足征；积极的则当如他说，一是出于提倡复兴文、武、周公之业的需要，二是出于表彰鲁国始祖周公的需要。

(3) 孔子所选录的《周书》十九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除了前面的《牧誓》、《金縢》、《大诰》、《多士》等篇，仍象商代一样讲到天命、刑戮、卜祀之外，一般都特别突出与《周易》卦爻辞一致的重人轻天、敬德保民思想，诸如：“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康诰》）“时（特）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君奭》）“肆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其惟王在德元，小民乃惟刑（型）用于天下。”（《召诰》）“惟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元恶大憝，

矧惟不孝不友，刑兹无赦。”（《康诰》）“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酒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闾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君奭》）可见孔子最注意的是殷何以亡，周何以兴的问题。他所选的篇章主要是颂扬文、武、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效法先祖之德业，以及阐述文、武、周公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而记载武王克商后，大量杀戮殷国君臣、掠夺殷国财富，以及祭上帝和祖先的极度铺张和残酷的《逸周书·世俘》、记载武庚串通管叔、蔡叔不孝叛周和周公不友杀管叔的《逸周书·作雒》，则一无见于《尚书·周书》。

孔子整理《诗经》的准则和《尚书》相同：《周颂》、《大雅》和《小雅》、《国风·邶风》的个别篇章，集中颂扬了后稷、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文功武治”；宣扬了“天命靡常”（《文王》）、“求民之莫”（《皇矣》）的天命观点；“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小雅·南山有台》）、“其准哲人，告之语言，顺德之行”（《抑》）的德治观点；“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皇矣》）、“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则”（《下武》）、“惟此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思齐》）的修身、齐家、治国观点。

但是，孔子也尊重事实，选录了写于西周末年的《小雅》中之政治怨刺诗，以及多数写在东周的《国风》，从而保存了反映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动乱、风俗人情，以至青年男女爱怨的珍贵史料；也提供了了解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天命观动摇，被压迫者阶级意识觉醒与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以及人生态度、巫术迷信等思想情况的具体素材。

3. 破除迷信、以义理解说《周易》

春秋时期在政治结构上变化的突出特点是王权衰落和诸侯争

夺，王驾驭不了诸侯，诸侯控制不了卿大夫，卿大夫管不了自己的家臣（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治秩序不复可见，王、诸侯、卿大夫、士层层相压的原来的贵族领主等级制度发生动摇，王、诸侯、卿大夫的地位前途未卜。于是，迷信天意、鬼神支配人事、相信龟卜的人增多。但甲骨价格昂贵，龟卜手续复杂、卜兆难以控制。为此，卜人便利用数的神秘性，从求神问卜的角度，把卜兆的一、--基本符号转换成奇数、偶数。这样就可以不用龟卜来决断吉凶。卜人只把固定数目的竹棍或著草，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反复演算，求得需要的六个数目字；再将这些数目字按照奇数为一，偶数为--的原则，顺序排列；然后对照卦画，得出六十四卦的某一卦、某一爻；最后，对照卦爻辞来决断吉凶。这种办法叫做“占筮”。这种既利用了数的神秘性，也保持了龟卜的神圣性，又简单易行的占筮，使人耳目一新，得以流行。为了使人们相信占筮的灵验，筮人一方面提出了卦象说，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征性的意义来解释八卦和六十四卦，讲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臆造了根据“本卦”和“支卦”的变化来决断吉凶祸福的筮法（“变卦”），以便牵强附会、胡乱类比地解说卦爻辞。《左传》和《国语》中就有十六条把《周易》用于占筮人事的记载。他们所占筮的，有娶妻、生子、嫁女、出仕、立君、夺国、出兵、作战等等，而且强调其灵验，大有宣传迷信神权的意味。⑩

同时，少数先进之士继承了周初人事可以转移天意的思想，提出了“《易》不可以占险”的观点（《左传·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语），又进一步发展为限制天意而注重人事的思想。既然《周易》的占筮不值得信赖，值得信赖的是人们对社会伦理的实践，所以他们就不把《周易》用于占筮，而是以卦爻辞作为人们分析人事的理论根据。例如，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郑国派大夫游吉到楚国聘问，被楚人拒绝，要郑国君亲自来。游吉

引用《复·上六》爻辞批评楚王说：“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那么，孔子是如何对待《周易》的呢？据《论语·子路》记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恒·九三》爻辞。孔子引用了《恒·九三》爻辞，并着重指出，只有不把《周易》用于占筮才能体会出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这种解说虽不合爻辞本意，却不把《周易》用于占筮迷信而是从爻辞义理上引申发挥，这是孔子继承前人，自觉运用以《周易》卦爻辞义理来论证人事。后来儒家都用孔子这个方法来读《易》，荀子就说过：“善《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由于这个方法被儒家自觉地运用，《周易》才逐渐摆脱占筮迷信的性质，被改造成为发挥儒家义理之书。在从《周易》到《周易大传》的发展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占了极端重要的地位。⑩司马迁和班固叙述《易》学的传授世系，都追溯到孔子，大体上是可信的。

4. 寓寄理想，效法《周易》修《春秋》

孔子七十一岁说：“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是孔子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晚年的心血结晶；其以史为鉴、总结教训以教育后人的模式又和《周易》相似，因之，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认为《春秋》与《周易》相表里，“《易》阐释人事，求其原于天道。《春秋》则根据天道以定人事设施之

准。”^⑩其实，两者背景不同、目的相左、作用相反。《周易》是东土既定，成王亲政后，“殷民不静”、周公、召公忧于成周，患周王朝存而复亡。其基调是要成王、康叔等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时刻警惕，治不忘乱、安不忘危，持盈保泰，争取化险为夷、化凶为吉。它的惩前毖后、朝乾夕惕、从民心向背来观察天意，依靠“敬德保民”来维持天命的思想，正好是当时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新兴封建领主精神的写照。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⑪

春秋时期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动荡。随着经济结构上领主制向地主制的急剧过渡，政治上王权衰落、诸侯纷争、卿大夫专政以至“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思想上则是某些传统观念在动摇，某些新思潮在萌芽。“孔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即往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作《春秋》，重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故“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孔子改订的《春秋》，讲的是齐桓公、晋文公一类人的事情，用的也是一般史官常用的文字，但有一点与过去的史书不同，即这部《春秋》里保存了春秋以来逐渐湮没的“义”。可见，在孔子那里，写历史只是一种手段，宣传“义”才是他的目的。

“义”者，宜也，就是通常所说“应该如何”的意思。前已指出，孔子注意的中心问题，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复兴已被社会实践否定了的周初文、武、周公时期的“礼”，这是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孔子忙忙碌碌地奔走了一生，然而到处碰壁，总是行不通。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坐下来，改订《春秋》以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

后世明君效法，并培养一批合乎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才，继续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对此，《庄子·天下》所谓：“《春秋》以道名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说：“拨乱世、反诸正。”就颇为精炼地概括了孔子注入《春秋》的“贬损之义”。董仲舒说：“《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春秋繁露·楚庄王》）他的概括是对的。《春秋》要人们墨守传统的礼，改变旧礼便遭到贬斥。“如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则讳之曰：‘天子狩河阳。’”（《史记·孔子世家》）等等，即是如此。故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因而，孔子虽然继承了《周易》重视历史，及时总结殷灭周兴因由的优良传统，写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开研究近现代史风气之先，釐定了编年史的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道名分”、“拨乱世、反诸正”的忠君尊王思想却是他思想中糟粕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很坏。对此，孔子似有察觉，所以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⑩

5. 孔子思想先进、政治理想倒退之渊源

孔子自幼“信而好古”，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并以“《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整理了《尚书》、《诗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文献的内容和风格；他也从中全面、如实地了解了商周两朝史事，特别是周初在天道观上开始表现为重人，在政治上表现为重民的思想。

同时，他还耳闻目睹了春秋时期，少数先进之士对周初思想的发展，例如：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僖公六年》季梁语）

“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黯语）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语）

“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同上）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语）

以及新的谈“仁”言论：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吾父语）

“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左传·僖公八年》目夷语）

孔子作为没有贵族身份而要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士之代表，具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因而，孔子首先把当时还很很不明确的仁之观念，提到很突出的地位。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其五十以后论学、从政记录的《论语》中，仁字就出现109次。孔子的仁，主要内容是“爱人”（《颜渊》），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里仁》）。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可见，仁的前提是承认对方和自己一样是人，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是人，然后才能爱他。仁的观念是建立在承认人有人格的基础上的。它反映了西周以来劳动人民之被重视，他们由奴隶而农奴、而农民，逐步在提高。与之相应，孔子反对用俑，反对人殉，反对奴隶制，主张爱人，主张爱民，主张“为政以德”（《为政》），实行“有教无类”（《述而》）等。这样，仁字就不只是一个道德观念，它代表

一种新的世界观，它是对奴隶制的否定。这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明显地闪烁着进步的光芒。

我们考察《论语》便知道孔子主张爱民(《学而》)、“养民”(《公冶长》)、利民、富民、教民(《子路》)、安民(《宪问》)、博施于民(《雍也》)。孔子拥护统治阶级，可是反对统治者把残酷的赋税剥削和徭役剥削加在人民头上(《公冶长》、《尧曰》)；孔子并不主张废除刑罚，却强调刑罚得当(《子路》)。他所主张，正如孟子所说：“所欲与之，聚之。”他所反对，正如孟子所说：“所恶勿施。”(《离娄上》)前者是忠，是积极的仁；后者是恕，是消极的仁。这种对待人民的态度和方针是从周初统治者以德化民、慎用刑罚的思想来的，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一般说来，都贪婪残酷，政是暴政，君是暴君，孔子提出仁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对后代封建皇朝，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为此，孔子还根据周公、召公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自纳于德、效法先祖榜样的思想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要求贵族统治阶级及士以德修身、以德治国。只有有了内在的修己之功，才会有外在的安人、安百姓之效。“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这种道德说教在春秋时代大国争霸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显得十分迂阔，为各国统治者所不取。但孔子把仁人、君子当作个人修养的目标，引导人们在道德上以仁为中心实行全面发展、培养道德完人，这在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仁人、君子这一称号，也的确吸引了历代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达到它而砥砺一生，做出自己的业绩的。可见，孔子思想之所以先进，正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然而，孔子生长在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到春秋晚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矣”的名声。在鲁曲阜文化特别是周礼的感染下，在孔子幼小心灵深处，对当时由来已久的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制

度本身，没有感到一点抵触的地方，却以膜拜敬畏之心，由衷地顺从和接受了。“十有五而志于学”后，又“信而好古”。孔子还做过短时间大官，平生又多在公侯大夫之间进行政治活动。因之，尽管他从小贫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以至阳虎的侮慢，即使对现实社会有不满处，却没有抱怨贵族宗法等级制度本身。孔子一生认为挽救“礼崩礼坏”的局面，必须维护分封、世袭、等级制度，恢复周初文、武、周公之治，以实现仁政德治的“理想”。

春秋时期是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动乱时代，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西周王朝确定领主特别是贵族的利益主要是上述三个制度。分封制度产生了诸侯分国而治、大夫分邑而治的割据局面。世袭制度保障着贵族长远处于统治地位。等级制度维护着贵族有等级的特权。这三个制度相结合着贵族的荒淫腐朽，使他们把持特权、乱搞政治、任意压榨人民；使他们贪婪无厌，分脏不均而争夺权利，大动干戈。总之，这三个制度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这是必须而且必然改变的，当时也正在逐渐破坏和改变着。然而，孔子虽自称“信而好古”，却摈弃《周易》、《尚书·周书》、《诗经·大雅·周颂》所反复强调的天命不常、“革命”合理思想，对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纣王不满（《八佾》），称述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泰伯》），对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叔齐，说他们“求仁得仁”（《述而》），推崇备至。反而希望依靠统治阶级自身的“克己复礼”、忠君尊王，对被统治阶级“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办法去恢复仁政德治。无奈“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唐刘长卿《听弹琴》）结果到处碰壁、并不死心，乃修《春秋》以寓寄“道名分”、“拨乱世，反诸正”之忠君尊王理想。因之，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曾对这一点极为宣扬，欺骗愚弄人民，以图借助孔子的影响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注〕

- ① 匡亚明《孔子评传》。
- ②⑪ 参见方克《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
- ③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 ④ 参见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
- ⑤⑫ 参见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
- ⑥ 赵俪生《我对〈易〉的一些看法和体会》，《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 ⑦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
- ⑧ 参见高亨《文史述林·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 ⑨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
- ⑩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六、中国文化之源

根据上述，可知《周易》在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是：

（一）殷代敬事鬼神，迷信龟卜，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无事不卜，好象他们是依靠鬼神的指示而行动。不过这种虚幻的反应，终抵不住事实的驳斥。风雨不验、丰歉不时、祸福无灵、吉凶矛盾，卜事常有。这些矛盾人们应早有看破的；到殷代晚期帝王亲加龟卜以及“卜用三骨”、“习卜”，也或者能窥见其一二。因为，“取三来代表整体，运用三卜求吉的原则来体现人间的意愿，这已比单纯的‘卜以决疑’（《左传·桓公十一年》）的宗教思想进了一大步，在鬼神信仰方面渗入了人的理念意识。”^①故武乙敢于“作木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为革囊盛血，仰面射之，命曰射天。”（《殷本纪》）帝辛敢于“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威）。”（《尚书·微子》）殷民敢于“攘窃神祇之牺牲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同上）都是勘破迷信的端倪。到文王、武王、周公“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記》），利用龟卜，玩弄玄虚，以麻痹殷人，团结周人，统治人民；对卜兆吉凶的态度是如意则从，不如意则违。再到周公、召公指导史巫利用龟卜兆纹的一、--两种基本形式，在殷人“卜用三骨”、“习卜”的基础上，演变为“卜用三兆”、“重卜三兆”而成为八卦、六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画结构，配之以文、武、周、成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卦爻辞，作为教诲成王、康叔及其后嗣子孙“仪刑文王”敬天、德治、修身的典册。我们既看到在商灭周兴巨大历史变革的猛烈冲击下，使鬼神、龟卜的作用相对缩小；又发现

由殷代的残民事神、迷信龟卜,到文、武“事神保民”、利用龟卜,再到周、召指导史巫、编写《周易》,重人事、听天命思想开始萌芽。这既为“神道设教”(《易·观象》)的治民之道提供了先例,又为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奠定了前进的基础。

(二) 殷代甲骨文,虽也间或有少量与龟卜有关以及其他偶然的记事文字,绝大部分是卜辞,并不是什么历史记载。周初甲骨文虽有少量卜辞,绝大部分是与龟卜有关的记事刻辞,对不少重大事件都有记载,可以说是殷周之际历史活动的“大事记”。

《尚书·周书》中的“八诰”等十几篇周初文献是武王的牧野誓师之辞和周公、召公教诲成王、康叔等的讲话记录。西周青铜器铭文已被赋予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但三者均支离破碎、没有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周易》卦爻辞,则是文、武、周、成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是中国最初的史册,是春秋时期“百国《春秋》”(《墨子·明鬼》)的先河。

周公、召公所以指导史巫编写《周易》,是从专恃天命、虐用人民的殷纣王终于覆亡的事实,认识到要使警惕天命、德治保民的方针贯彻执行下去,永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把商天的教训和周兴的经验传授给成王、康叔及其后嗣子孙。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封建皇朝统治者以史为鉴知兴衰的优良传统,也引发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思想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记》主题。

(三) 周公、召公亲身经历牧野之战、前徒叛变、殷纣覆亡以及三年东征“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等巨大变革,切实领会了天命无常、休恤相依的道理。因之,《周易》卦爻辞的主题就是:天命不常,“革命”合理,常怀忧患意识;殷鉴不远,民心可畏,存亡事在人为;以德化民,谨用刑罚,“以小民受天永命”;修身、齐家,自纳于德,效法先祖榜样。这,就孕育了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孔子仁的观念和德政主张,以及《周易大传》

“君子自强不息”（《乾·彖》）和“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彖》）的思想。

（四）《周易》卦爻辞跟由前辞、占辞、验辞几个部分定制写成的篇幅短小、文词简略的卜辞，以及“佶屈聱牙”的《尚书》“八诰”等周初文献不同，是一部有组织、有系统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灵活的表现手法和相当完美的语言风格，取得了初步的艺术成就。章学诚不仅指出《周易》卦爻辞中的“人心营构之象”、“通于《诗》之比、兴”，而且指出：“《易》以天道而切人事……，其义例见于文辞，圣人有戒心焉。”（《文史通义·易教下》）指明《周易》卦爻辞之严谨，同于《春秋》。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们多年研究，又得出：《周易》卦爻辞中简短、古朴的诗歌，其产生年代之早和数量之多，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卦爻辞中的诗歌已经形成独特的、又与后代诗歌一脉相承的韵律，以富有特色的表现技巧，显示着我国古代诗歌萌芽阶段的艺术水准。它是《诗经》这样一部成熟的诗歌总集得以产生的艺术渊源。②

〔注〕

① 宋镇豪《殷代的“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参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

② 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高亨《文史述林·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张善文《周易卦爻辞诗歌辨析》，《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

一、“数字卦”说志疑

一九八〇年，古文字学家张政烺汇集了近年来在陕西张家坡和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初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陶文中的三十二个“奇字”，认为它们是一些数目字的重叠，“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写出《周易》的卦名”，三个数的是易卦的所谓“单卦”，六个数的谓之“重卦”。并提出“占卦实际使用的是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字并不重要。”紧接着一些古文字学者著文赞同此说，并加以引申发挥。^①后来，一些哲学家在谈到“这最初的易卦，是什么样子”时，也认为“张先生的解释，比较更令人相信。”“根据现有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可以肯定地回答：作为易卦卦画的基本爻象‘--’与‘—’是由原始筮法中的筮数演变而来的，它的原始形式是‘数’，而且是某个有具体数值的‘数’。”^②最近，黎子耀在《周易导读》中更明确指出：“八卦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从近年考古发掘的发现，殷代已有八卦，甚至有了六十四卦了。近年在河南省的殷墟遗址，以及陕西岐山的周原，相继发现甲骨上刻着数目字，常是六个字一行，不与他辞连接。考古学家张政烺断定为筮卦，这一结论，已为一般学者所承认。由此可知，筮法为商代所固有，周人在先周时期亦已采用。有的契数下面带有‘曰’字，见于安阳四盘磨，‘曰’字上为卦画，其下为卦名，现录之于下：

十
爻
十
爻
爻

曰魁

十
八
十
爻
十
爻

曰隗

数字译成今文，两卦则为：

七五七六六六 曰魁

七八七六七六 曰隗

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两卦当为：






䷋ 曰魁（否卦） ䷋ 曰隗（未济卦）


六爻成卦，重卦在商代已经出现。六十四卦皆有卦名，不过，所出的两个卦名，皆与今本《易经》不同。”^③

此说虽甚新奇，但疑点较多，现择其要者，列举于下：

（一）因材料不足，我们暂且对《易·系辞下》所叙筮法用六（少阴）、七（少阳）、八（老阴）、九（老阳）数目字；甲骨文中也亦有“九”字^④，何以张文所列三十二个“奇字”中都用一、五、六、七、八这五个数目字的问题不去讨论。可是，作者又根据什么断定商代筮人已知把一、五、六、七、八等具体数目字转换成奇数、偶数呢？因为，正如作者所说：“筮法是在人们对于数已经有了奇和偶这种分类的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数理方面的一种抽象概念的产生和应用的实录。承认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筮数中的一和六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⑤然而，通观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却不见奇、偶二字^⑥。同时，根据大量甲骨文材料，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卜辞中所表现的殷人的思惟水平是相当低下的。这是一大堆散漫而无系统的感性材料，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在卜辞中，我们看不到具有抽象意义的词汇，也看不到殷人当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事实上，殷人在观测天象、从事青铜工艺以及组织农业生产和国家生活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积累了不少具有客观确定性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却没有完整地反映到卜辞中。^⑦因之，殷人还不可能从具体数目字中抽象出奇、偶概念来。

（二）既然在“数字卦”的材料中，“还没有阴爻（--）、阳

爻（一）的符号”，又根据什么把一、五、六、七、八等数目字，按照奇、偶转换成一、一符号呢？对此，《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的作者竟根据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的、、刻纹指出：“从形状讲，它与八卦的卦画十分相近。所不同之点在于：（1）短划不是由两划组成，而是三划；（2）卦爻不是由三个或六个组成，而是由四个或五个爻组成，这使我们想起了西汉杨雄的《太玄经》。这是不同于《易经》的另一部筮书。”从而断定：“上述五个符号，是占筮的卦画符号，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卦画。……说明这种卦画的上限可以早到商代。”^①如果这种论证法可以成立，我们能否从甘肃马家窑文化陶器符号、临潼姜寨陶器符号、青海乐都柳湾陶器符号中都找到了“、”符号^②，因而得出与八卦同源的卦画的上限可以推到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的结论呢？

（三）该文进而根据山东平阴朱家桥 m9 中的随葬陶罐肩部刻纹，是由（一八八六一一）六个数目字组成的八卦符号；而该墓的时代是商代末期；因之指出：“在远离商都的边远地区村落遗址中，在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墓葬中，在一个普通的日用陶罐上出现八卦数字符号，这当然是商代已经盛行占筮活动的确切例证。”对此，必须加以辨析。

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发现了占卜用的羊、牛的胛骨，齐文化大河庄墓葬区里有四处“石圆圈”遗迹，附近有牛羊的骨架和卜骨，^③可能是为占卜举行的宗教仪式而遗留下来的。占卜是征询鬼神意志，预测人事命运的一种方法，它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专有一批替人决定吉凶的巫祝。随着阶级压迫的出现，宗教祭祀和占卜活动，由民办变为官办，人与神之间的交通逐渐为少数人所垄断，占卜成为少数奴隶主贵族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国语·楚语》所记载的传说里颛顼“绝地天通”，就是说，颛顼使重为南正负责整理天上诸神的等级，使黎为火正负责管理地

上的人民，断绝氏族成员任意与天神交接的道路，把宗教、祭祀、占卜等事务完全垄断起来^⑨，就包含着这样的历史真实性。

到了商代，占卜之风大为盛行。当时，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王室和贵族的私人生活小事，如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田猎、疾病、生子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决定吉凶祸福而行止。这实际上是商王把自己的意志神化，借助神权以加强奴隶主阶级的政权。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来掌管占卜事宜。占卜之后的刻辞甲骨，都当作国家的档案而由史官保存起来。甲骨出土地点多在殷墟的王宫和王陵区，有秩序地堆积在窖穴之中。

因此，即使承认该文所说：“商代和西周，不但有占筮的记载，而且卜筮同时进行，占筮的数字符号，与占卜的卜辞一样，都可以刻在甲骨上。”我们也难以想象商、周王朝的统治者能允许人们将神圣的占筮符号刻在青铜器、陶器上，甚至在远离商都的边远地区村落的社会地位较低之人之陶罐上出现。

（四）何况，这种说法也缺乏史征。因为，商代和周初大抵只有占卜而无占筮之兴，可以多方证之：

1. 从文字上论，甲骨文无卦字、筮字、蓍字；卦字从卜、圭，明是有了卜字，才有卦字的后起字。商代如有占筮，甲骨卜辞不应一次都没有占筮记载或卜筮连举的。《尚书·商书》也只有占卜而无占筮的记载：

《盘庚上》：“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周秉钧《白话尚书》译为：现在我们不能互相救助，以求生存，用龟卜考稽一下，将怎么样呢？

《盘庚下》：“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白话尚书》译为：所以我这个年轻人，不是敢于废弃你们的谋划，是要善于遵行上帝的谋度；不是敢于违背卜兆，是要发扬光大上帝这一美好的指示。

《西伯戡黎》：“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周秉钧译为：天子！天意恐怕要终止我们殷商的国运了！贤人和神龟都不能觉察出吉兆。

2. 殷墟卜辞所记范围，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王室和贵族的私人生活小事，几乎没有一件事不用占卜的。那时似是没有占筮，如有占筮，占卜的范围也许会缩小一些。

3. 关于先周和周初是使用占卜还是占筮，我们先从《诗·大雅》开始考证：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豳》，陈子展译为：于是开始，于是设计，于是占卜刻了我们的龟；说是定居，说是适宜，建筑宫室就在这里。）

“考卜维宅，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文王有声》，陈子展译为：求卜的是武王，定居在这镐京。是龟甲卜准了它，武王就筑成了它。）

再看《尚书·周书》：

“乃卜三龟，一习吉。”（《金縢》，周秉钧译为：于是卜问三龟，都重复出现吉兆。）

“予不敢闭天降威，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命）。”（周秉钧译为：在上天降下灾难的时刻，我不敢把它闭藏着，用文王留给我们的大宝龟，卜问天命。）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卜，以经营。”（《召诰》，《白话尚书》译为：到了第三天戊申，太保早晨到了洛地，卜问所选的地址。太保已经得了吉兆，就规划起来。）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洛诰》，《白话尚书》译为：我先占了黄河北方的黎水地区，我又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地区，仅有洛地吉利。我又占卜了瀍水以

东地区，也仅有洛地吉利。)

根据这些史料，我们知道在殷周之际和周初，周人营建周原、丰镐、洛邑等地，以及“王有疾”、东征等大事，都是通过占卜来决定的。而且，周原发现的甲骨有“其又大作……其”(H11:12)和“乍天立(位)”(H11:24)卜辞，据陈全方考释均为“建筑宫室而卜”，以及“征巢”(H11:10)、“伐蜀”(H11:68)等文字，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周原、齐家村发现八片所谓“数字卦”的“数字符号”甲骨的同时，还发现较为完整的有卜兆和卜辞的甲骨五片，归纳起来，其卜兆约有六种形态：≡、≡≡、≡≡、≡≡、≡≡、≡≡，确为八卦的原始。^⑩而且，周原、齐家村两处共有有字甲骨298片，计字1009个，除八个“奇字”外，均可归入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地名、官名、月象、杂卜等十类。^⑪

由此可见，这些“奇字”不是“数字卦”的“数字符号”，“窃疑此乃记氏族世系之特殊标识，为一种太古民族习惯之遗留。至其为用，究系所记数字相加或相乘，则不可知。如所引某‘曰隗’，某‘曰魁’者，乃谓某氏族之若干代其名为隗为魁也。”^⑫

〔注〕

①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徐锡台、楼宇栋：《周原卦画探原》，《中国哲学》第3辑；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于豪亮：《帛书〈周易〉》，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

管壁初：《商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6辑。

②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楼宇烈：《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 ③ 黎子耀：《周易导读》，《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
- ④ 赵诚编：《甲骨文简明辞典》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 ⑤ 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辞书社出版。
- ⑥ 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中国哲学》第7辑。
- ⑦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⑨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⑩ 详见拙文《从西周甲骨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演变》，《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 ⑪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⑫ 李孝定：《金文诂林·附录》。

二、“《尚书·康诰》篇首 四十八字错简”说考辨

——兼论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

“周的王业，是在周公东征和营建东都以后，才巩固起来的。”①《尚书·康诰》为研究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提供了直接史料。可是，自从宋苏轼明确提出：《康诰》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②四十八字“皆《洛诰》之文，当在‘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余民封康叔；七年而复辟，营洛邑在复辟之岁，则经文明甚，则封康叔之时，决未营洛。又此文终篇初不及营洛之事，知简策脱误也。”（《东坡书传》）虽然，宋林之奇指出：“某尝谓苏氏之说经多失之易，易则己意之有所不安者，必改易经文以就之。如此则经文之本文其存者几希，非慎言阙疑之义也。”并提出：“此书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然后继之以诰康叔之事，盖封康叔在于卜洛之前，而诰康叔在于营洛之际。”（《尚书全解》）宋金履祥更提出：“此叙《洛诰》亦未协，当是《梓材》之叙。”（《尚书表解》）但因林氏从表面上看以《康诰》作于“营洛之际”的说法，顺了经意；实际上与苏氏“七年而复辟，营洛在复辟之岁”的说法一致。金说乃兼取苏氏以《康诰》之叙为《洛诰》之叙，与宋吴棫以“《梓材》为营洛之书”（《书稗传》）两家之说，及朱熹之意

而成的；同样认为《康诰》篇首属于营洛之时。可见，宋代三说，不管是“易经文”以顺“己意”，还是改著作时间以顺“经意”，都是为了说明周公营建洛邑于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时。因此，从宋朱熹、蔡沈的《书经集注》、杨简的《五诂解》，到元陈栎的《尚书集解纂疏》、清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都同意苏说。影响所及，至今的《尚书》专著，如陈梦家《尚书通论》、张西堂《尚书引论》、王世舜《尚书译注》、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王宇信《西周史话》等历史著作，以及有关周公营建洛邑的论文^③均沿用苏说，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或他篇错简。因而，对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作出了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论述。为此，特对苏说加以考辨，并结合《尚书·召诰、洛诰》、《周易·益》卦爻辞和《何尊》铭文，对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作些探索，以资参考。

（一）

我们先根据《尔雅》、《说文》、两汉训诂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加以注释，以了解其本意。

（1）《尔雅·释诂》：“哉，始也。”月初生明为魄，马融曰：“魄，𩚑（音匪fèi）也，谓月三日始生兆𩚑，名曰魄。”《乡饮酒》、《白虎通》并谓月三日成魄也。（2）《说文》：“初，始也。”（3）《尔雅·释诂》：“基，谋也。”（4）作：兴建。《诗·大雅·绵》：“作庙翼翼”，《文王有声》：“作邑于丰”，《诗·鄘·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诸“作”字皆兴建之义。（5）结合文献和金文来看侯、甸、男、采、卫，九服之五也。侯甸男邦，侯服、甸服、男服之邦君。《孔疏》：“言邦，见其国君”，是也。（6）百工：百官。《尔雅·释诂》：“工，官也。”采卫百

工，采服、卫服之百官也。（7）播民：播迁之民，谓殷之遗民也。《汉书》注：“播，迁也。”（8）《说文》：“士，事也。”事于周，谓作洛邑也。（9）和，会也，见《周书·谥法》。（10）《尔雅·释诂》：“咸，皆也。勤，劳也。”（11）郑玄曰：“洪，代。言周公代成王诰。”此谓周公慰劳之余，乃代成王大诰康叔以治道。

可见，以上四十八字乃史官叙事之辞，记周公作诰之时、地、事与有关人物，意译为：三月初，周公在东方的洛邑开始谋划兴建新的大都邑，四方人民都到这里集合。侯服、甸服、男服之邦君，采服、卫服之百官，殷遗民会和，效事于周作洛邑。周公慰劳之余，乃代成王大诰康叔以治道。

再看两汉经师、晋唐儒臣对此篇首解说的异同，以探索苏说之渊源。

郑玄：“此时未作新邑。基，谋。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隆平已至。”（《尚书疏》）

伏胜：“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而封康叔。……周公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尚书大传》）

可见，两汉今古文经师一致认为：周公于摄政四年三月初，“建侯卫而封康叔”，并开始谋划兴建洛邑。

不料，晋梅颐却伪托汉孔安国一反旧说，提出：周公于“摄政七年始生魄、月十六日，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东国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悦而聚会，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悦并见，即事于周。周公皆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诰以治道。”唐孔颖达又进而发挥曰：“知周公摄政七年三月者，以《洛诰》即七年反政而言营新邑及献卜之事，与《召诰》参同，

俱为七年，此言作新邑，又同《召诰》，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书传》云：‘四年建侯卫而封康叔，五年营成洛邑，六年制礼作乐。’《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上，即云颁度量而天下大顺。’又云：‘六年制礼作乐。’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礼记》后儒所录，《书传》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尚书注疏》）

他们为什么要把周公建侯卫而封康叔、谋划兴建洛邑的时间从周公摄政四年三月初，改为周公摄政七年三月十六日？原来，

“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说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④当时，封建皇朝统治者及其儒臣，鉴于王莽托周公、曹操托文王以夺两汉政权，于是依据孔子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周公“宪章文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等言论，倡言文王不称王，周公未代王，以提倡“君臣之义”。所以，虽然造伪的破绽不少，在历代皇朝统治者的推动下，《伪孔传》却风行起来。后来，孔颖达又依唐太宗意，为《伪孔传》作疏；从此，《尚书注疏》“颁之国冑（国子），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⑤

可见，《尚书注疏》把周公建侯卫而封康叔、开始谋划兴建洛邑的时间，由“摄政四年”，改为“七年反政之时”，是为了避周公代王之疑；把“三月初”，改为“三月十六日”，是为了与《召诰》、《洛诰》中召公、周公“相宅”、“卜宅”的时间相一致。

自欧阳修倡言“《周易·系辞》非圣人作，《诗序》非子夏作，其序多失”后，宋朝的辨伪之风非常盛行，王安石、程颐、苏轼、朱熹等人，“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疑《春秋》”；^⑥而且，吴棫、朱熹已疑及《伪孔传》。但因受理学“道统”思想之束缚，却又往往

“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甚至“变易事实以就其说。”^⑦所以，不仅不能对《伪孔传》一疑到底，反而补苴，发挥了文王不称王，周公只摄政、未代王的说法。苏说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

因为，当年孔颖达对“周公既三年灭三监”，何以“七年始封康叔”之疑问，还能以“则于其间更遣人镇守，自不知其名号耳”来强解。但对两汉时今古文经师已公认的“哉生魄”为月二日或三日，改为“月十六日”，却没法说清，成为悬案。苏轼则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与全文不吻合，应归之《洛诰》之叙的说法，从形式上解决了问题。因而不仅得到赵简、朱熹、蔡沈等人的响应，就连表面上不同意苏说的林之奇、金履祥，也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了周公建侯卫而封康叔、开始谋划兴建洛邑于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时。

因之，至今多数学者还据此说明周公营建洛邑的时间。例如，史乐为就认为：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未即二十一日，成王为了营建洛邑，由镐京来到丰京向宗庙告祭，接着便派太保召公先去洛邑查看筑城的地点。三月戊申即初五日，召公到达洛邑，指挥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度城郭、郊庙、朝市的位置，到了寅卯即十一日规划成功。次日乙卯，周公也到达洛邑，普遍巡视了新邑的规划，并且进行了占卜。占卜的结果，在涧水东、瀍水西和瀍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邑都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成王，得到成王的批准后即正式动工兴建，当年年底洛邑建成。”从而引发了周公营建洛邑，“摄政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当年年底建成是否可能的新疑问。因为，据《逸周书·作雒》记载说：“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即所谓城方九里）、而郭则方七十里（疑十七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而城中之建筑有“五官、大（太）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楼台殿阁，具备

有“四阿、反玷、重亢、重郎、复格、藻税……”，道路则有“内阶、玄阶、应门、库台……”等等。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其富丽堂皇，虽不必尽为实录，但其工程肯定是够浩大的，绝对不是九个月可以完成的。^③

可见，苏说之失，在于无视周公东征后的严峻形势和营建洛邑的目的，完全按主观意图裁剪历史，因而歪曲了历史，造成了千年的混乱。为此，我们必须如实了解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和时间，恢复历史的真相。

(二)

营建洛邑，是周武王开始规划的。《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其意图很明显是以洛邑为周之新都。

《逸周书·度邑》有一段文字，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周本纪》，更明确地提到武王临终前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与周公讨论在洛邑建都的问题，甚至于睡不着觉。周由老根据地岐下而经文王迁丰（今陕西户县东）、武王迁镐（今陕西长安西南），步步东移，在当时显然是为了夺取政权的需要。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又进一步计划迁都洛邑，无疑是为了便于对新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1964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载武王告天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唐兰意译为：我建都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人民。^④正说明武王的决策。

不料，武王克商后，才两年就死了。他死之后，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传子诵，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内有管叔、蔡叔，心怀野心；外有王子禄父，不忘复辟，形势十分严峻。在这个关键时刻，周公旦不畏人言，“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荀子·儒效》）管叔、蔡叔等不满。禄父乘机串通

管叔、蔡叔，联合东方的徐、奄和一些部落、小国，一同起兵叛周。周公、召公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之后，由周公领兵东征，经过“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尚书大传》）的三个阶段，历时三年，最后取得完全胜利。周王朝的势力到达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

东征的胜利，使周人在更大的领域内以更巩固的方式建立政权，不仅成为必要，也具备了可能。周公在这方面适时而成功地采取了措施，那就是：“四年建侯卫”（《尚书大传》）。其主要内容是：“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宋微子世家》）同时，“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武王弟）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卫康叔世家》）还割取殷畿内地和新征服的奄国土地和人民封鲁公伯禽（周公之子）；并将新征服的薄姑氏土地和人民封给了齐太公之子吕伋。这样一来，既把姬周王族封在殷地，使周王朝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有了新的布局；又把殷余民分割在各个封国治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武王以来的殷贵族复辟的问题。

禄父串通管叔、蔡叔和东夷叛周，也使周公更加认识到加强中原地区统治的重要性。东征胜利以后，周公在“建侯卫”的同时，“如武王之意”（《周本纪》）兴建洛邑，以便对殷顽民和新拥有的东部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因为，正如清王夫之所说：“东部之民心尚摇摇而未定，西望而狐疑，曰：天子其边徼我乎？惟正天邑之名于洛邑，而惠此仇民，服在王廷者，无疏远之嫌，夫乃思媚而危疑允释。义以纠之，仁以联之，丕诫殷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周公之权也。”（《尚书引义·召诰》）所以，西周王朝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是：“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乃止。”（《尚书·多士》）即分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勉励他们努力治理，以利用他们，要他们顺从而服役。可见，周的王业，是在周公东征胜利，

建侯卫和营建洛邑以后，才巩固起来的。所以《尚书大传》所说：“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的记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仅如此，《周易》的《益》、《晋》卦爻辞，还为以上论述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请看《益》卦爻辞：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1) 大作：大兴土木。作同《康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之“作”。(2)《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元，大也。”

(3)《说文》：“咎，灾也。”爻辞意为：大兴土木，兴建洛邑，于我大吉，可免灾咎。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1) 中行：当为人名，疑即仲衍。仲衍乃微子启之弟。《史记·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国于宋。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高亨、唐兰说）(2) 公：周公。(3) 从：听命。《礼记·乐记》郑玄注：“从，顺也。”(4) 依：古通“殷”，即殷商也。《康诰》郑玄注：“衣读为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5)《周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集解》引荀爽：“开国，封诸侯。”爻辞意为：仲衍告公，听命于周，迁国于宋，以代殷后。再看《晋》卦卦辞：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1) 康侯：据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文中考证，指武王弟康叔封，封于康，所以称康侯。于省吾、唐兰、高亨、李镜池等均同此说。(2) 锡：古通“赐”，锡马指成王、周公赏赐给康侯的良马。(3) 蕃：古通“番”，古时对外族的通称。《周礼·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4) 庶：古指人民。《史记·秦始皇本纪》：“咸心咸服。”(5) 昼日：一天。(6) 接：交战。《说文》：“接，交也。”卦辞意为：身骑王赐马，率领殷士徒，康侯征东夷，一日三交战。

《益》卦爻辞并记周公谋划营建洛邑、封微子于宋两件事，说明两事同时。而据《管蔡世家》：“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继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则封宋与封康叔于卫确为同年，可证周公谋划营建洛邑与封康叔于卫均在东征胜利后的摄政四年。郑玄的解说：“此时未作新邑。基，谋。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政不均，故东行于洛邑，会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隆平已至。”也基本正确。由上可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所叙符合历史实际。

《晋》卦卦辞与《沫司徒迓簋》铭文（“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唐兰意译为：王来征伐商邑，命康叔在卫地防守边境。）证明《逸周书·作雒》（“俾康叔宇于卫”）是东征“三年克殷”后，让康叔在卫地防守边境，镇压殷“多士”。为了统治殷人的军事力量，还编成了以康叔、中旄父等周贵族为统帅的“殷八师”和“成周八师”，以安抚殷贵族，并以殷治殷。^⑨为此，西周王朝必须在洛邑兴建城郭、行宫、官署和宗庙，以作大军防守、安居周贵族和周王朝君王、重臣视察之用。所以，洛邑又有“洛师”之称（《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可知，周公“俾康叔宇于卫”和“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乃同时事。

与此同时，周公针对“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言今民不安，其心未定的严峻形势，还谆谆告诫康叔：“必求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亡，而务爱民。”（《卫康叔世家》）史官记之，谓之《康诰》，一段言文王、武王尚德慎刑，二段言尚德保民，三段言谨用刑罚，四段言用德化民，五段言听从教命。^⑩全篇记载既合情理，又符史实，决无辞意不达之处。《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与全文内容吻合，决非《洛诰》脱简；郑玄、伏胜之说确有依据，“伪孔”、苏说概不属实。

(三)

营建洛邑的时间，《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而《洛诰》记载则明明说是在周公还政成王之时，即所谓“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说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伪孔”、苏轼主此说，故谓《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之叙。那末，营建洛邑到底是始于何时呢？这个千年疑问，随着对苏说的考辨和周公营建洛邑目的之明确，特别是《何尊》的出土，才得以解决。请看《何尊》铭文：

“唯王初酈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

在四月丙戌，王诰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来速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唯王五祀。”

关于“唯王五祀”，多数学者均考证为成王五年，亦即周公摄政五年。至于“唯王初酈宅于成周”一语的句读，唐兰等人均将全句一气呵成读作“唯王初酈宅于成周。”但对“酈”字却提出了“迁都”（唐兰）、“相宅”（张政烺）、“筑城”（马承源）、“徙居”殷余民（李民）和“践祚”（杨宽）等五种解释。^⑩结合《康诰》周公摄政四年在“建侯卫”的同时，“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的记载，周公营建洛邑的目的，以及《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所叙来分析，我认为马承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书中的意译：王开始营造成周，对武王举行了丰福之祭。四月丙戌这一天，王在京室对宗小子诰诫说：从前你已故的父亲公氏辅协文王。文王得到上天赋予统治天下的伟大使命。后来武王攻克了商的都城大邑商，曾祭告于天说：我建都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治理人民……时在王五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而且，跟唐兰对《洛诰》首段的考辨若合符节。请看：

“《尚书大传·作雒》说：五年营成周。在《尚书·洛诰》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乃卜河溯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伋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伋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这里所说的是周公到洛师卜宅的情形，是营成周的开始。……但作《书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把《召诰》的太保相宅与《洛诰》的周公卜宅混淆了。因而在《洛诰》序中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实则《洛诰》的周公卜宅，是经营成周的开始，而是在摄政七年作《洛诰》时追溯的。这里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祇是为的卜宅，首先卜的是黄河北岸的黎水，大概没有得到吉兆。于是卜涧水、瀍水之间而又靠近洛水的地方，兆把画在龟上的墨痕吃了（由坼裂而墨痕不见），又卜瀍水东边的近洛处，卜兆也把墨痕吃了。于是周公把地图和卜兆送给成王，由他最后决定，这时成周还根本没有经营，是很清楚的。”^③

周公营建洛邑是在摄政五年，那末《洛诰》所说的“七年”又如何解释呢？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前所述，洛邑的规模很大，绝对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很可能开工于周公摄政五年，完成于七年。《尚书大传》和《何尊》铭文记的是“卜宅”营建的开始年代，而《召诰》、《洛诰》所记则是完工“相宅”之日，整个建筑群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这，既合乎情理，又澄清了“伪孔”、苏说造成的九个月完成浩大工程的混乱。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

《召诰》提供了可靠线索。请看：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吉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纳。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在《召诰》里，由召公先去“相宅”，戊申那天到了就卜宅，得到了吉卜就经营，接着就派殷庶来攻位，五天就造成了。第二天乙卯，周公来了就“达观于新邑营”，随着祭郊、祭社，最后还朝命庶殷等。从文中可以看到新邑已建成了。如果说召公卜宅是新邑未建成之前，那末，由戊申到乙卯，只过了七天，其间只攻了位，周公来了怎么看“新邑营”呢？怎么又有郊祭和社祭呢？可以看到，《洛诰》的乙卯是在周公摄政五年将营洛邑之前，而《召诰》的乙卯则是在周公摄政七年洛邑建成之后。^①

综合上述可知：摄政四年，周公在“建侯卫”的同时，“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并开始兴建城郭、宫室，以备防守；摄政五年，周公“卜宅”，并正式开工营建规模浩大的洛邑；整个建筑群大概用了两年时间，于摄政七年建成后，召公“相宅”、攻位，周公郊祭、社祭、朝命庶殷。

〔注〕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②③ 句读从周秉钧《尚书易解》。

③ 史为乐《西周营建成周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杨宽《西周初期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4期；

吴泽《洛诰史事年岁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何幼琦《周公东征概述》，《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

④⑦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

⑤ 皮锡瑞《经学历史》。

⑥ 宋王应麟《困学记闻》。

⑧ 参见王玉哲《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一《西周史研究》1984年4月。

⑨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参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

⑩ 参见李亚农《西周与东周》。

⑫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同上；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同上；

李民《何尊铭文补释》，《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

杨宽《释何尊铭文兼论周初开国年代》，《文物》1983年第6期。

⑬⑭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后 记

读高中时，我就听先父（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世繁）谈过“《周易》周史观”的看法并着手研究。1949年，我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学习后，因教学任务和学习专业的改变，特别是社会条件的制约，此项研究便置之高阁、不遑措意。八十年代初，在国内外研究《周易》热的鼓舞下，先父曾发愿重理旧业，但因专心修订《惠施、公孙龙和墨辩的逻辑思想》和《形式逻辑新编》，尚未深究，却不幸于1982年病逝。追忆先父平生治学之勤苦，俯念其一生岁月之蹉跎，触物兴怀，感慨系之，因发愿钻研《周易》，以竟前功。

通观当时诸作，我发现绝大多数均未跳出汉《易》象数、宋《易》义理之老路；胡朴安、高亨、李镜池诸学者，虽从训诂入手、史料着眼、寻求突破，也因未能摆脱“《易》本为卜筮而作”之说或《周易大传》之束缚，难合《周易》实际。于是，我决心充分运用近年来西周甲骨的发现、青铜器铭文大量出土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参以古代典籍，旁及诸家解说，对《周易》进行探本溯源、还其原貌的探索。

经过对《周易》进行宏观的、多学科的综合探索，我根据西周甲骨卜兆的六种排列形式，发现《周易》的卦画结构并不神秘，乃是周人利用龟卜兆纹的一、一两种基本形式，在殷人“卜用三骨”、“习卜”的基础上，演变为“卜用三兆”、“重卜三兆”而成为八卦、六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同时，我阅读了汉唐以来以至近现代诸家的解说，钻研《尚书》、《诗经》、《逸周书》和《左传》等先秦典籍、两汉文献，又参考了商代甲骨文、

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周初考古资料，对六十四卦卦爻辞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又发现《周易》卦爻辞是在东土既定、殷民未靖的情况下，周公、召公为了使其警惕天命、德治保民的方针贯彻执行下去，永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指导史巫根据历年存放于“金縢之匮”的命龟之辞和其他文献整理、编写而成的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以便成王、康叔及其后嗣子孙牢记商灭的教训和周兴的经验。因之，《周易》在中国文化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表现为：它破除迷信，注重人事，为“神道设教”的治民之道提供了先例，为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奠定了基础；它作为最初的史册，是“百国《春秋》”的先河，引发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和“原始察终、见盛知衰”的《史记》主题；它的天命不常、“革命”合理、常怀忧患意识，殷鉴不远、民心可畏、存亡事在人为，以德化民、慎用刑罚、“以小民受天永命”，修身齐家、自纳于德、效法先祖榜样的观点，孕育了孔子仁的观念和德治主张，以及《周易大传》“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想；又是《诗经》得以产生的艺术渊源。我先后写成：

(1)《从西周甲骨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演变》，(2)《从西周甲骨文探索周易卦爻辞的性质》，(3)《周易思想新探——兼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4)《从易经探索殷周关系》，(5)《从易经看周文王怎样“阴谋修德以倾商政”》，(6)《从周易看武王伐纣的真相》，(7)《从易经看武王克商后统治殷人的策略》，(8)《从周易探索周公东征的因果》，(9)《“龙”及〈易·乾〉卦爻辞考释》等文，发表在《孔子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和《人文》杂志上。其中(1)发表在《孔子研究》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特刊上，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

(2)也立即被《周易研究》摘要转载，(3)发表在《孔子研究》纪念孔子诞辰二五四〇周年专辑中，并发送参加“孔子诞辰2540

年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位学者，(4)、(5) 均被来年《中国史研究动态》中的《先秦史研究概况》所介绍。

1988 年初，国内大量出版、重版和翻印台湾多种《周易》专著，而这些著作仍未摆脱汉《易》、宋《易》模式，不合《周易》实际，加之，几篇论文虽已发表，但因受字数限制，均删减过半，仅存骨架。在师、友的鼓励下，乃开始撰写《周易新探》，并三易其稿，完成此书。

我的研究和写作，一直得到张岱年师、任继愈师的支持、鼓励，岱年师还几次审阅文稿，并为此书撰写序文；还得到默明哲、冯增诤、牟钟鉴诸学友的支持；特别是北大出版社总编辑苏志中同志和本书责任编辑苏学增同志的大力支持。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者限于学识或囿于己见，本书一定还有许多可以商榷以至谬误之处，恳切地希望学人和读者不吝赐教。

李大用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宿舍 42 公寓 502 号

1990 年 4 月 28 日